

研讨实录

第 146 期

146

黄奇帆：中国房地产的发展
冯绍雷：俄乌战争的观察与思考
俄乌冲突与国际金融变局研讨会
各国和地区疫情现状及防御措施座谈会



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
Shanghai Development Research Foundation

地址：上海市黄浦区龙华东路868号办公A楼802室 Address: Rm 802, Office Building A, 868 Longhua East Road, Shanghai, China
邮编：200023 ZipCode: 200023
电话：86-21-62188752 Tel: 86-21-62188752
传真：86-21-62188714 Fax: 86-21-62188714
网址：www.sdrf.org.cn WebSite: www.sdrf.org.cn



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编
二〇二二年六月

序 言

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成立于 1993 年，是一个围绕发展问题进行政策性研究的非赢利的公益组织，旨在推动改革开放、服务实体经济。基金会的一项重要工作是组织各种公开或闭门研讨会，为各方面的研究成果和政策见解提供交流的平台。

基金会每月举办一次“上海发展沙龙”，邀请国内外知名的学者、专家和实业界人士进行演讲，并与听众交流。沙龙已成为基金会有一个品牌。

基金会不定期地举办小范围的“中国经济的未来”系列座谈会，主要关注中国中长期发展的一些深层次问题，根据不同主题，鼓励不同观点的交流，提倡讨论和争辩。

基金会在每年的年中和年末举办两次“宏观经济论坛”，分析全球经济对中国的影响，判断我国当年的经济形势，展望来年的经济走势。

基金会每年与其他机构合办“户籍制度、土地制度和城市化”专题圆桌讨论会，针对城市化相关问题进行深入研讨。基金会每年还与其他机构合办

“上海货币论坛”，对货币问题进行研讨。

基金会每年举办“上海全球金融论坛”大型国际研讨会，邀请国内外著名专家学者对全球经济、金融进行研讨，这也已成为基金会有一个品牌。

我们把上述各类研讨活动的主要内容进行整理，编辑成册，称为“研讨实录”，不定期发行。在此过程中，我们尽量将研讨活动原汁原味地呈现出来，将有价值的见解与朋友们分享。希望各位朋友能够给我们提出更多更好的建议，以使基金会举办的研讨活动能够更上层楼！

是为序。

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荣誉会长

A handwritten signature in black ink, appearing to read '陈震' (Chen Zhen), written in a cursive style.

编者的话

本期《研讨实录》收录了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近来四次学术活动的实录。

基金会和上海市外商投资协会 2022 年 1 月 18 日合办了第 170 期上海发展沙龙。重庆市原市长、复旦大学特聘教授黄奇帆在沙龙上发表了题为“中国房地产的发展”的演讲。他指出，中国房地产最近两年已经有 10 个方面的指标，正在发生重大变化。第一，中国的人口拐点。第二，中国城市化率 65% 接近拐点。第三，城市人均住房大体达到 50 平方米，接近天花板。第四，老龄化加重。第五，房产商的库存和社会闲置的房产数量庞大。第六，中国房地产这 20 年形成的每五年房价翻一番的现象，未来不会延续。第七，这 20 年中国房地产的建设量每五年翻番，但近年徘徊在 17 亿平方米，以后会逐渐下降。第八，旧城改造进入拐点。第九，大规模基础设施、市政设施所造成的动迁减少。第十，学校、医院的建设基本饱和。今后五年在房地产形势逆转的背景下，房地产商的行为会出

现五种变化。第一，负债率下降。第二，盲目储备土地减少。第三，四处出击建大楼盘的状态会改变。第四，房地产跨界经营会减少。第五，房地产搞金融的行为会淡出。

基金会和上海市外商投资协会于 2022 年 3 月 3 日合办了第 171 期上海发展沙龙。华东师范大学终身教授、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俄罗斯研究中心主任冯绍雷先生在沙龙上发表了题为“俄乌战争的观察与思考”的演讲。他指出，这场战争打下去结果非常可怕。现在俄罗斯面临巨大的国际压力，必须考虑这个现实的情况，如果乌克兰方面做出一些俄罗斯能够接受的让步，俄罗斯也降低自己的条件，和谈成功还不能说一点都没有希望。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军备做了大规模的摧毁之后，选择适当的时机，做一个撤退，这个可能性还是存在的，就像 2008 年的格鲁吉亚战争那样。

中国国际金融 30 人论坛暨中国社科院国际研究学部 4 月 2 日主办了一次内部视频研讨会，集中讨论俄乌危机对全球金融格局带来哪些重大的变化？对于中国会产生什么影响？中国应该如何应

对？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学术委员会主席余永定先生在研讨会上作了题为“美国对俄罗斯的金融制裁及其警示作用”的主旨发言，他指出对中国的海外资产与外汇储备的安全性问题，各部方面要共同研究，找出具体的应对方案。在研讨会上发言的专家学者还有：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教授刘元春，国防大学战略研究所原所长、少将杨毅，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副院长、俄罗斯中亚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冯玉军，蚂蚁集团研究院院长李振华，中国驻乌克兰前大使高玉生，国防大学国家安全学院副院长、少将唐永胜，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国家全球战略智库理事长张宇燕等。

基金会4月12日举办了“各国和地区疫情现状及防御措施座谈会”。在座谈会上，金冬雁先生（香港大学生物医学学院教授、病毒学家）回顾了香港第五波疫情中的经验教训。他指出香港其实从来没有躺平，一直是奉行动态清零的。虽然香港政府一直都没有允许轻症者和无症状者居家隔离，但是事实上受了感染以后还是待在家里，70万人在家

里并没有影响后来疫情的受控。这个疫情有自己发展的规律。短期内迅速扩散，疫情升温，也在短期消退，下来得也很快。这段时间里，香港既没有封城，也没有禁足，也没有搞全员核酸的。绝大多数病例，99%以上是轻症无症状。没有打疫苗的小孩子受感染的人数也是相对多的，也出现了一些重症死亡，但总体来看，小孩子的死亡率还是非常低的。最惨痛的情况是在多家养老院发生了聚集性传播，大批不打疫苗的老人死亡。抗原检测发挥了关键性作用，对核酸检测形成了重要的补充。香港医疗资源面临了前所未有的压力，但是医疗资源基本没有崩溃，对于非新冠的其他疾病的服务还是能够维持正常的。接种疫苗很重要，可以大大降低重症率死亡。疫情中的医患关系和人文关怀也非常重要。陈茁先生（美国佐治亚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卫生政策与管理副教授、宁波诺丁汉大学健康经济学教授暨健康经济学中心学术主任）从新冠防控的角度介绍了美国公共卫生应急体系和相关法律。他指出美国公共卫生应急体系有一个大的局限，因为美国的联邦和地方的分工非常明确，有一些方面是联邦疾控中

心无法兼顾的。但美国在一些紧急情况，在医疗事故责任、异地行医、隐私保护、信息收集等方面的法律，我们可以有所借鉴。他建议要强调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首诊作用，推进分区诊疗和家庭医生制度，加强健康教育。

更为详细的精彩内容，请大家阅读本期《研讨实录》。

乔依德

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副会长兼秘书长

二〇二二年六月十日

目 录

黄奇帆：中国房地产的发展..... 1

冯绍雷：俄乌战争的观察与思考..... 45

俄乌冲突与国际金融变局研讨会..... 87

各国和地区疫情现状及防御措施座谈会.. 148

中国房地产的发展

黄奇帆

重庆市原市长、复旦大学特聘教授

上海发展沙龙第 170 期 2022 年 1 月 18 日

乔依德（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副会长兼秘书长）：今天我们十分荣幸地邀请到了原重庆市市长黄奇帆先生给我们做一次演讲。他将跟我们分享当前的经济形势，特别是关于重要的房地产部门的一些看法。下面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表现欢迎。

黄奇帆（重庆市原市长、复旦大学特聘教授）：岁末年初，马上要过阴历的新年了。两年前有一次类似的活动，当时我和戴相龙一起演讲过一次。所以这次基金会邀请我时，我就想大家都是老朋友，见见面也挺好，正好利用这个机会，我就演讲一个小时。今天要讲的内容不是浅尝辄止的什么都谈，今天重点就谈一个主题，就是大家关心的房地产。

关于当下中国经济发展的状态，一方面有去年

疫情的冲击，还有美国对中国采取对抗、竞争、脱钩等方面的打压策略以及世界通货膨胀，再加上以美国为主的通货膨胀造成全世界原材料涨价的一系列情况，都对中国的经济带来一定的冲击。在这些情况下，去年中国经济能够保持 8.1% 的增长，并且在现在公布的全世界 180 个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增长率中，我们是最高的，美国是 6% 左右。中国的经济增速是 8.1%，和去年前年加起来计算平均速率也达到 5% 点几，总体来说是非常好的。我国 GDP 的总量达到 114 万亿人民币，按照现在的汇率算一下就达到了 17.7 万亿美元。美国去年的总量预计达到 23 万亿美元，所以我们现在占美国 GDP 总量大体上是 77%，应该说有了更大的竞争力。另外，17.7 万亿美元的总量，在 14 亿人中平均下来，人均 GDP 用美元现在也达到了 1.2 万美元。世界的富人圈差不多有 11 亿人，富人圈标准是人均 GDP 是 1.25 万美元，1.2 万美元等于就进入了门槛，也就是说去年中国已经进入了世界富人圈的门槛，今年只要再涨 5%，中国就真正进入了世界的富人圈。这个富人圈进去不容易，因为从上世纪 70 年代一

直到 2020 年的 50 年里，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从中等收入进入到富人圈，或者说是高收入圈。有一种说法叫中等收入陷阱，因为过去 50 年间没有一个国家进入高收入圈，即使人均 GDP 到了 9 千或 1 万美元，过不了一段时间自己就会掉下来，又变成 6 千、7 千了，总之进不了 12000 以上。所以应该说，中国去年在疫情这么困难的情况下，走出这一步很不容易，为十四五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的圆满实现奠定了一个好的开头。

光看到好的一面，看不到困难的一面也有问题。当下中国的经济，正像中央说的面临着三大压力，第一个是市场需求萎缩产生的压力，第二个是供给冲击造成的压力，第三个是预期下降形成的压力。这三大压力是在国内的经济结构里产生的，跟国外对我们的冲击是两种情况，所以我们要高度重视三大压力。中央也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包括今后若干年以经济为中心，明确了各种有利于发展、有利于增长、有利于解除困难的措施要加紧出来、提前出来等一些要求，以及从货币政策到财政政策和其他各种调控政策，最近也都出台了。

今天就不去展开这些内容，我就讲一件事，就是房地产。因为房地产，现在表现为需求萎缩很明显的一个方面，也表现为供给冲击的一个方面，也表现为预期下降一个方面，这三个方面压力，在房地产市场是非常聚焦的。首先，在中国经济中，如果经济有 5% 的增长，其中就有一个点跟房地产有关，如果我们经济有 10% 的增长，其中就会有两个点和房地产有关。也就是说，如果房地产往上涨一涨，能拉动一个点，往下掉一掉，就能负拉动一个点，所以这个一进一出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很大。另外，关于中国的财政收入，其次，地方政府加中央政府所有的收入中，预算内的税收和预算外的基金算在一起，房地产这一块差不多占 40%。如果对整个地方加中央的全部财力来说，要有 40% 涉及到房地产，那么对地方政府来说，房地产收入可能就占到 60-70%。第三，对于中国老百姓的资产来说，中国全社会总的资产差不多有 1000 多万亿人民币，其中与老百姓相关的，和家庭有关的资产有 500 万亿左右，这 5 百万亿里有 300 多亿就是房地产，其余的包括股票、存款等多样资产，当然也

存在有的家庭多，有的家庭少的情况。对全社会来说，中国家庭财富的 60% 的确和房地产有关，所以对房地产这件事，任何国家、任何政府都不掉以轻心，所以对房地产的分析十分重要。

在这里我要说一个什么样观点？就是中国房地产的各种指标现在进入到一个拐点，也就是跨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这个阶段和过去 30 年、40 年房地产发展的走势是完全不同的。我们说的最近这一年，许多房地产商出现了困境。有的说是因为各地政府的过度打压造成了房地产市场萎缩，我认为这个观点是不正确的，是有偏颇的，且不符合事实。当然，政府如果进行过度的打压，或者采取一些不当措施，会对房地产带来冲击，但是目前中国房地产整体上的需求下降或结构方面出现的问题，比如许多企业爆仓等问题，和中国地方政府的房地产调控措施并没什么太大的关系。也有人说，现在房地产行业面临困难，这么多房产商爆仓是企业自己一根筋过分盲目扩张带来的困境，是房地产自己搞坏的结果。这种观点，可以说它对，也可以说它不对。说它对，是因为的确每个爆仓的企业都有自己

的问题；说它不对，是因为这些房地产商的行为方式，不管错误或不错误，实际上过去十年到二十年，他们一直是这么干的，为什么过去没有崩，这会儿崩掉了？实际上，中国房地产最近两年已经有 10 个方面的指标，或者说 10 个方面的边界条件，正在发生重大变化或者说拐点性的变化。今天，我着重把这 10 个边界条件的变化给大家描述一下。

第一个，中国的人口拐点。1980 年中国总人口是 10 亿人，这些年增长了 4 亿人，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人口是在往上走。随着城市人口增加，房地产需求当然会扩大。但是，从现在或者从 2019-2020 年开始，直到今后的 10 年 20 年间，中国的人口绝不会像以往再涨 4 亿。印度人口现在是 13 亿，过 40 年变成 17-18 亿倒真可能，但是中国不会。可能今后 15 年，中国人口不再往上走，而是下降变成 13 亿或者 12.5 亿，到了 2050-2060 年，中国人口可能变成了 12 亿，出现人口下行这个拐点，中国人口的比重有可能到 2060 年以后占全世界 10% 左右。就是再过 40 年，全世界人口可能从现在 70-80 亿变成 100 亿，而中国人口可能回到 10

亿，也就是占全世界人口的 10%，这是一个可能性的拐点，但是具体哪一年是多少，这个测不准，但是趋势性的概念是如此。

大家要明白一个概念，中国人口在过去三百年里占世界人口的比重是往下降的。大家有时候会觉得，从解放以后的几十年里中国人口从 6 亿变成 14 亿，从而觉得中国人口涨的很多，占世界人口的比重肯定增加。但其实在康熙乾隆那一段时期，全球的 16 亿人里中国占 4 亿人，也就是占世界人口的 25%。工业革命使得全世界经济条件改善，人口迅速开始扩张，越穷越落后的地方，原来活不下来的人现在活得下来了，那些穷的地方生小孩更快。改革开放的时候，中国人口达到了 10 亿，改革开放 40 年以后，人口达到了 14 亿，而全世界的人口已经涨到了 70 多亿，在 70 多亿人口里，中国人口占全世界人口是 20% 左右。这段时间，生活得到改善以后，人口当然涨得很快，但是全世界人口同样涨得很快。但是，一旦进入富人圈，人口就开始涨得慢，中国现在要进入富人圈了，中国人口的增长率今后也会像欧美一样涨得很慢，或者基本不增

长，甚至还会萎缩。日本进了富人圈以后，人口也开始减少。这是人类生活发展的一个规律性的现象，倒也不是计划生育政策或者现代人生育观念改变导致的结果。其实生活条件一好，想生小孩的意愿就少了，说什么穷了就不生小孩了或者养不起小孩，都是毫无依据的。因为 60 年代 70 年代，也就是我们的父母这一代，不知道多穷，但是小孩能生 5 个、6 个，这里面有社会学的概念，今天不去谈论。总的意思是什么呢？发达圈的社会人口增长不快，但是非洲、拉丁美洲以及其他不发达的地方，人口会涨得飞快，总的世界人口增长包括印度人的增长，都不会慢的。但是，如果世界人口在今后几十年变成 100 亿，而中国跟欧美一样进入了富人圈以后，小孩的数量不会那么增长，最后如果我们下降到 10 亿，占世界人口的比重就变成 10%，这是一个拐点。当然，这个拐点和房地产无关，是一个大趋势，并且会影响房地产。

第二个，就是中国城市化率和房地产有关。我们不讲农村的房地产，只谈城里的房地产。1980 年中国城市化率是 18%，也就是说，在 10 亿总人口

里城市人口是 1.8 亿，而解决中国城市人口需要的住房面积，实际上就是满足 1.8 亿人的需要。现在，我们城市化率达到了 65%，总人口也增加了 4 亿，城市人口从原来的 1.8 亿到现在的 9 亿多，增加了 7 亿多的城市人口，每个城市人口当然要有住房，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房地产需求是巨大的。但是，中国城市化率到了 65%，已经接近拐点，称为“刘易斯拐点”，按照刘易斯规则，城市化率达到 75%，大体上就是拐点，意思是说这个社会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的趋势到达拐点，实现了基本平衡。那么，中国城市化率现在是 65%，逻辑上还有 10 个百分点就到 75%，如果一年一个点，还有 10 年，如果一年 0.5% 的话，还有 20 年。但是有一点，中国 65% 的城市化率几乎等于美国欧洲 75% 的城市化率，原因是什么呢？因为中国的城市化转移，是农民工向城市转移，是农村的生产力或者说农村劳动力的转移，所以农村里从 18 岁到 30-40 岁可以转移的人应转尽转，已经转移的很充分了。也就是说现在 14 亿人，35% 的人是农村的，而留在农村里的人大概有 5 亿左右，这 5 亿人的老龄化程度达

到 35%。整个中国老龄化程度是 18%，农村老龄化程度比整个社会的老龄化程度还要高，因为农村年轻一点的人都出来了，留在农村的基本上都是老人。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农村人口向城市进一步转移的作用力、能力、拉力都下降了，所以说中国的 65% 城市化率几乎等同于发达国家的 75%。并且由于我们户籍制度的原因，把不在城市就业的老人拉到城市来落户的概念几乎不存在，所以中国的城市化率到 65%，几乎就到了天花板了。当然，今后十年统计城市化率也可能达到 70%，但是这样的城市化率速度就跟以前不同了，以前 40 年里城市化率从 18% 进步到 65%，每年一个多点，甚至最初那些年每年两三个点，现在动力开始小了。农村里的人进城动力小，对城市房地产的需求也是会下降的，就是进入拐点了。

第三个，关于中国的人均住房面积。1980 年中国 1.8 亿城市人口，18% 的城市化率的情况下，人均住房是 5 平方米。1990 年上海的人均住房是 7 平方米。1990 年我在上海政府工作讨论困难户时，如果你是困难户，上海各种企事业单位有房子可以优

先分配，困难户的标准是人均两平方米。总而言之，1980 年城市人均住房是 5 平方米，从 1980 到 1990 年这 10 年，由于全国住房没有市场化，没有房地产，城市人均住房就变成了 7 平方米，几乎没有变化。现在，中国房地产在两年前统计，城市人均住房已经达到 48 平方米，再叠加这两年新增的房屋面积大体就到了 50 平方米。50 平方米的人均住房面积在全世界就是一个天花板了，即使是欧洲美国，他们住宅面积的人均就是 50 平方米左右，不考虑贫富差距的情况，这里讲的是大数平均，是一个总量，一个社会总的结构。总之，1980 年代人均 5 平方米，现在达到 50 平方米，面积扩大了 10 倍，还要再扩大 3 倍、5 倍，从人均 50 平方米到达人均 100 平方米甚至是人均 200 平方米，这是不可能的。

第四个，就是老龄化。根据统计，中国去年 60 岁以上的人口已经达到了 19% 多。到 2035 年，预计中国 60 岁以上的总人口比重会达到 30%，到 2050 年或 2060 年 60 岁以上人口的占比有可能到 40%。年纪大的人买房需求很小，他们所占用的房

屋在去世后会闲置，或留给下一代。所以在进入老龄化以后，最终这个社会的房屋就会多余或极大的宽敞起来。

第五个，目前中国房产商的库存和社会闲置的房产数量。2015 年，在中央提出供给结构性改革、去产能去库存的时候统计过，存在房地产能过剩，住宅建设过量等。根据 2020 年的数据，计算中国房地产商一年未销售出去的库存，有 6 亿平方米。房产商一年造 17 亿平方米的房子，闲置的库存有 6 亿，占比 30% 多，这其实是一个很大的压力，会面临资金周转的压力。

不算农村的房子，中国老百姓在城市里这几十年买的房子有 350 亿平方米。1980 年人均住房面积只有 5 平方米，实际上就是说，1980 年中国整个城市地区所有居民家里的房屋面积，不管是棚户区，是烂房子还是好房子，建筑面积统统算在一起不超过 50 亿平方米。所以现在的 350 亿平方米房子，有 300 亿平方米是这几十年以后造了以后卖掉形成的。这些房子有多少闲置呢？所谓闲置就是空关没有人住，有 20%，300 亿平方米的 20% 也就是

60 亿平方米。所以就叫做一手房有 6 亿平方米，二手房有 60 亿平方米。二手房闲置其实不是房产商的压力，也不是社会的压力，不是政府的压力，这是老百姓已经花钱买了，但是买了以后空关着，再去采取投资式购买的方式，再去买几十亿闲置在那里，那么这个需求会起到压缩作用。如果这 60 亿平方米都出租了或者都转让掉了，老百姓当然有钱可能再投资，但是他们买房不是为了居住而是为了投资，为了炒房产。如果有 60 亿房产积压在手中闲置着，这会对老百姓再买房产生一个负的动力。

第六个，中国房地产在这 20 年形成了一个思维惯性，或者说形成了一根筋操作的温床，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 20 年时间里，中国的房地产从房价到地价都出现了一个现象，即 5 年翻一番、10 年翻两番、15 年翻三番、20 年翻了四番的现象。如果仅仅出现了五年翻一番的现象，大家哪怕看到了这个现象，也不一定相信后面的五年还能翻番。但是五年翻一番以后，后面五年又翻一番，再来五年又翻一番，就像马克思说的，当有暴利的时候，就把人贪婪的心态全都吊起来，变成全民炒房的概

念，房产商的行为方式都会走样，会异化。在这种情况下，地价不断地涨，房价不断地涨。比如上海房价，衡山路房子 1980 年就是 6 千块钱一平方米，但是现在那边房价涨成十几万一平方米，涨了 16 倍。再看上海松江的房子，2000 年的时候是 2000 多块一平方，现在涨了 16 倍，3 万 4 万很正常。李嘉诚在浦东中央公园旁边投资建造的世纪雅园，2000 年刚造好时的市场价格就是 1 万一平方，现在是 15-16 万一平方。也就是说，上海就出现新世纪以来的 20 年翻四番的现象，当然重庆、成都也一样。大家有时候说重庆房价低，跟上海比当然低，但是如果跟自己比，2000 年同样一个地段，市区的就 1000 多每平方，现在变成 16000-20000 多每平方米，还是涨十几倍。也就是说整个中国进入到了土地地价 20 年翻三番四番、房价 20 年翻三番四番的现象。在这样的情况下，房地产在这个惯性里会产生一种行为方式，就是哪怕土地冒了天价变成地王，我也可以把它买下来，因为再过五年，在整个地价翻番的时候，我这个价格就居中了，就又赚钱了。这 15-16 年培训出来的房地产思维，就是

拿到地就是拿到钱，就敢高额贷款，对于一百万、三百万、五百万甚至一千万平方米的大楼盘都敢开工。反正资金是跟银行借钱，贷 70%、80%、90% 的银行贷款；90% 的银行贷款不行，他们就在 90% 的借款里有 70% 是高利贷，20% 是银行贷款，银行贷款贷不到的话，他们就借高利贷。比如像恒大，18000 亿的贷款，其中银行贷款 4000 多亿，非银行机构贷款都是 12%-18% 利息的，比银行利息高一倍，他就敢借 14000 亿，这 14000 亿比跟银行借 3 万多亿的一年利息还要高。为什么有这个魄力？就是因为看到中国房地产的势头，这种三五年翻一番、十年翻两番的这种势头不停下来，这种疯狂的举动都似乎合理了。结果没学过经济学原理的人一根筋往前冲，发大财变成凭胆量而不是凭知识。从这个意义上，20 年来的这个指标现在就要结束了。那现在房价是不是会涨？我相信上海一些特殊的地段，现在 20 万一平方的地段十年以后变成 30 多万是可能的，但是像原来那种五年翻一番，认为现在 20 万一平方米的房子，五年以后会涨到 40 万，十年以后变成 80 万的观点都是胡说八道。这是

大趋势、大逻辑，20 年都有的这种惯性状态结束了。房价当然以后可能还会涨，但是它会跟 GDP 增长大体差不多，也就是说如果 GDP 涨 5%，它 5、6 年涨 20% 到 30% 也有可能，但是不会出现一年涨 20%，五年翻一番的现象。

第七个，在过去 20 年里中国房地产的建设量，也是呈现五年翻番、十年翻两番、20 年翻 4 番，涨了 16 倍的状态，这种状态也将结束了。中国房地产开发量，1990 年全国的建设量是 1000 万平方米。大家要注意的是，这不是房地产商搞的，而是全国的企事业单位、政府机关为自己职工解困而造的一点房子。当时全国一年造 1000 万平方米，上海那时候一年也就能够造 70-80 万平方米。我印象很深，那时候我在市委工作，吴邦国作为市委书记开了个会，建议要帮上海职工解决困难，因此就定下来一个概念，要让上海一年建 70 多万平方米，1991 年定下来了，吴邦国的文集里有这一段描述。现在想，70 万平方米算什么事啊，一个房地产的开发量都大得多。

但是当年中国全年只有 1000 万，到了 2000 年

中国一年的开发量是 1 亿平方米，因为 1990 年到 2000 年，中国的房地产出现了几个机制的变化。第一，中国的房地产私有化。中国政府已经开始卖房，老百姓可以有私人产权房了，中国所有公房都是 200 块、300 块一平方进行售卖。政府国有的房子，就变成你家里的产权房了。老百姓可以在市场上跟房产商买产权房，产权房概念是从 90 年代改革起的。第二，既然有私人产权房，就有按揭贷款，所以中国的各大银行的按揭贷款是 1994-1995 年推出来的。在 1990 年以前，没有按揭贷款，那时候自己要想拿工资去买房子，怎么可能呢？所以房地产的第二个配套，形成势头的是按揭贷款。第三，中国真正的房产商，一个个法人出来，搞土地批租，也是 1990 年开始的。浦东开发，上海搞了土地批租，就由房产商来批租。所以真正批租土地、开发房产的房产商，也是 90 年代从上海开始的。正是这三点推动了房地产。以至于到了 2000 年有了一亿平方米。到了 2010 年，中国一年新建设的房地产总量为 10 亿平方米，到 2017 年达到了一年 17 亿平方米，就到头了。实际上，从 1990 年

开始算到 2017 年，一共 27 年时间，从 1000 万变成 17 亿，涨 170 倍。从 2000 年开始算，因为真正的房地产市场化，全国房改是从 2000 年开始算，经过 17 年市场化运动，从 1 亿变成 17 亿。我曾经预测过，17 亿将是中国房地产的顶峰，以后每年都徘徊在 17 亿，然后逐渐会下降。现在我仍然持这个观点。

中国房地产商每年建设量到了 17 亿以后，就进入一个边界调节的拐点。事实上，从 2018、2019、2020，到 2021，已经四年了，中国房地产的建设总量没有突破 17 亿，2021 年为 16.4 亿，2020 年为 16.65 亿，在 16 到 17 亿之间徘徊。那么今后 10 年，是不是会出现 17 亿变成 27 亿呢？不可能了，已经是世界的天量。全世界 70-80 亿人，每年建的房子没有超过 20 亿平方米，凭什么中国是全世界 20% 的人口，每年都要造全世界一半的房子呢？所以说已经到头了。前面说的 6 个拐点，总人口开始减少，老龄化在增加，城市化率到了天花板，平衡点和库存量也上了天花板。在这个情况下，中国的住房已经达到了人均 50 平方米，以前

只有 5 平方，现在 50 平方米也是一个天花板。在这种情况下，住房需求就会下降。我认为 10 年或 20 年以后，我们从一年 17 亿降到 10 亿会是平衡，到了 10 亿以后不会又降到 4-5 亿。为什么 10 亿是平衡点呢？今后 10 来年，每年如果不去造 20 亿，造 17 亿，16 亿，15 亿，这么造十几年下来，又会增加一百几十亿平方米的房子。现在的 350 亿，加 200 亿，就变成 550 亿的总量，人口又逐渐下降。如果在 550 亿的时候，城市人口不是 9 亿变 10 亿，变 11 亿，而是就在 8 亿左右。那么人均 60 或 70 平方米。总而言之，房子足够多。足够多了以后，就会下降，下降到每年 10 亿就平衡了。因为房子一般来说，50 到 60 年折旧，按长点时间算 60 年折旧，550 亿平方米，大体上一年折旧差不多就是 10 个亿，拆 10 亿，造 10 亿，基本就是良性循环，一直平衡下去的状态。

以上讲了七个，一个叫总人口 14 亿，开始少的问题；一个是城市化率差不多到拐点的事情；一个是老龄化；一个人均住房到了 50 平方米；一个库存，6 亿和 60 亿的关系；一个是地价和房价，20 年

翻四番的惯性到头的问题。这六个以后，第七个就是建设量，建设量最后到了 17 亿是天花板，几年以后逐渐往下降，降到 15 亿，14 亿，13 亿，降十几年，直到降到 10 亿将是一个新的平衡点。按照逻辑，折旧循环，市场本身形成平衡，10 亿平方米够多了，也还是拉动经济的重要增长力。这就是七个指标。

第八第九第十，我大概提一下。

首先是旧城改造，1980 年，当时上海市区才 300 平方公里，上面所有的居民住宅和各种城区里的房子，棚户区，烂尾楼，各式各样的危旧房占建筑量的 40%，占地面积的 50% 都是要拆迁的。现在大规模的拆迁，不管是上海，还是沿海地区，内陆地区，该拆的都拆的差不多了。以后还会拆迁，但那是局部性的，结构性的，补短板性质的，不是铺天盖地排浪式的拆迁，拆迁一平方要补偿三平方，这种需求会进入拐点。

其次，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市政设施也会造成动迁，这时候市政所需，哪怕是好房子也要拆了，这类的拆迁少了。

再有就是学校、医院。中国的大学造得够多了。20年前中国大学在校生1000万，现在在校生成3200万，已经扩得太多了。现在小学生毕业的人，比高中毕业的人还少。今天高中生如果毕业了30万，这个城市的初中生能够进高中的可能到不了30万，这就倒过来了。比如重庆，2000年的重庆，初中毕业生48万人，2015年已经变成38万，现在是32万，人口在下来。大学生招不满。但是初中生还有50%要分流，读中专，所以大学以后招不到人。在这个意义上，不会再为造大学城征地动迁。教育设施、文化设施这些年造得够多了，也基本饱和了。

以上的前面七条和老百姓直接相关，后面三条和教育卫生文化基础设施、公共设施、城市旧城改造有关，一共10个方面。大家要在这十方面的基础上想，房地产是进入到了一个新阶段，一个拐点。这个拐点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就是客观趋势，也不是经济周期，它绝不是周期性的，而就是一个长周期，一直下去。在这个意义上就应该想到，房地产商的行为规则是会变化的。他如果主动

变，就主动走出困境；如果被动变，要么被淘汰，要么千辛万苦才能浴火重生。在这个意义上，房地产商过去的三个惯性——每年造的建设量，房价五年翻番，地价五年翻番——都结束了。同样的是房价，房子在手里，今天是库存，造成资金链紧张，明天房价一涨，跟银行一抵押，又变成现金流，而且变成利润，越库存多，越利润高。在这种思维惯性下，房地产五个高——高负债率，高利贷，高地价，高的大楼盘开发，大规模的高周转——都是疯狂的模式。从全球房地产商的角度看，是发疯的模式，但是中国过去 20 年不这么做反而吃亏。从这个意义上讲，当新的阶段、新的形势、新的拐点到来以后，形势比人强，比一切制度规则都要强。当破产崩盘案例出现在大家面前的时候，房地产商的脑子才会转弯。否则那么多专家直接跟房地产商说，说了也白说，在他脑子里，他们用最笨的办法发财最多，而觉得专家在经济实力上比不上他们。

今后五年在房地产形势逆转的背景下，房地产商的五种行为会出现变化。

第一，负债率下降。高负债率，80%-90% 的

负债率会逐渐下降，下降到 50% 以内。现在国家给房产商的红线是 70%，那是因为面对房地产普遍的 80%-90% 的负债，无法跟它说 50%，能够 70% 就算好了。但是全世界房地产商都是 50% 以下的负债率，不管欧洲美国还是香港，30 年来香港所有房地产商基本都在 40% 以内。他在香港是 40% 以内，跑到中国搞房地产，是不是跟着中国的风气转，也变成 50%-80% 呢？只要是香港的楼盘，不管是和记黄埔，还是九龙仓，还是其他的房地产商，都在 40% 以内，30% 左右。就是说房地产正常的应该是 50% 以内的负债，30% 到 50% 的负债以后会变成常态。那时候即使中国政府给他们 70%，他们也会自发降到 50% 以下了。这是形势比人强，基础温床变了，整个发展的土壤变了，自然会调整。

第二，不惜代价买地块，储备很多地块。恒大在 2015 年是 1 万亿资产，8000 多亿的债，现在变成差不多 2 万亿资产，新增的 1 万亿里 5000 亿买地，还是老思路，储备土地。今后盲目储备会减少。

第三，大规模开楼盘。不管东西南北中，只要有地在卖，它就去买，买了以后搞楼盘开发。一个公司一年几千万平方米同时在建设，像海南岛一个楼盘就一千几百万平方米。上海崇明岛旁边，南通那边，恒大的楼盘也是 1200 万平方米，认为上海人都会跑到那边买房子。这种到处建大楼盘，而且是四处出击建大楼盘的状态会改变。

第四，跨界。搞房地产搞多了，觉得可以搞商业，可以搞旅游，可以搞文娱，也可以搞高科技，搞汽车，搞工业，什么都能搞，实际上没有一个成功的。凡是房地产跨界搞这些东西，最后都赔掉几百亿。

第五，房地产去搞金融。这种行为也会淡出，因为房地产搞金融，没有一个把金融搞起来，反而把金融开出来就是为房产商拿钱服务。恒大在 1 万亿负债的时候，欠了银行有 4000 亿。现在变成 1.8 万亿负债，新增加的 1 万亿是不是银行借的？银行没有借，有几千亿是跟社会上的非银行金融机构借的。还有几千亿是恒大在 2015 年以后，自己搞了六七个金融机构，这些金融机构监守自盗，自己给

自己转钱，一转就转出几千亿，最后害死恒大的恰恰是这个。因为这里转出来的钱都是高利贷，他自己给自己发高利贷，不就把自己套死吗？大家可以去看，房产商去搞金融的，不是拿了金融牌照为全社会工商产业服务的金融，而是觉得这个金融工具在手上，首先为自己家里的公司服务，就变成监守自盗式的。世界上的法律，任何家族搞的金融机构，绝不能动用一分钱去救自己家族金融机构周转，不管新加坡还是东南亚，都有这条规则。在中国，别的金融机构不借钱给他，他自己的金融机构借给自己，是不是害了自己？

所以，这 20 年产生的房地产奇奇怪怪的行为方式，在今后 10 大拐点到来以后，血淋淋的事实或者说各式各样的教训，会使得这个土壤发生了变化，会使得他们过去的五大惯性发生纠正调整。中国的政府管控本来就是管他们这些行为的，但是卡不住，因为当土壤是这么一个惯性的时候，政府尽管起到一定的约束，但是总体上还是没有管住，也管不住。一旦土壤发生变化，出现了拐点，政府哪怕不管了，他们也会转弯了。这是第一个概念。

第二，由于这样的形势出现，中国对房地产的调控方式也会发生变化。过去因为它疯狂的增长，在这种情况下，政府一般意义上的法规管不住了，就用行政办法，叫限购、限卖、限价、限贷、限楼盘开发，这种行政化的“五限”以后就逐渐逐有了。因为现在房价不是怕涨价而要限价的问题，而是涨不上去，开始卖不掉了，所以政府也不会去限价。造好 10 万平方米，现在不许卖，只能卖 3 万平方米，剩下的 7 万明年后年再说，这叫限卖。你不能卖 18000 一平米，可以卖 15000，这叫限价。老百姓买房不能按揭贷款，这叫限贷，各式各样的措施。这以后会被经济手段的五个调控取代，就是土地的调控、投资的调控、税收的调控、法律制度的调控、各种经济手段调控，就是总书记说的要用五种经济的手段来调控房地产，房子是用来住的，这个目标最终得以实现。五限的办法是短期的、临时的，一旦拐点形势一到，政府不用限了，以后没有这样的事了，这个方法会变化，政府的调控状态会发生变化。

第三，政府会把农村的土地和城市的土地结合

在一起，城乡联动，提供土地开发指标，这又是一个概念。新的土地法去年开始实施，已经开始出现了地票这一类的概念。

第四，中国的城市，2000 多个县城，5000 个地市州，几十个中心城市、省会城市，铺天盖地排浪地同步发展，这个状态差不多到头了。以后更多集中在长三角、京津冀、粤港澳，或者成渝经济带，或者就是郑州、洛阳、西安等等，这样就在城市群、都市圈里发展。从这个角度，资源优化配置协调发展，大都市圈里的核心，超级大城市的中心地段，房价不见得 20-30 万就打住，可能 20 万变 30 万，30 万变 40 万，但是整体不会这么涨。它有一个资源配置，超级大都市带动都市圈，都市圈又带动城市群，城市群也有大中小，形成一个结构性资源配置。政府的管理体现在这种区域性的系统工程上。

第五，在房地产发展中，形成最终中国每年新建的建筑可能 20% 是政府行为的公租房保障房，30% 是商品房的租赁房，还有 50% 是产权商品房，这样就形成了“235”的一种结构。这种结构形

成，一半是租赁的，一半是产权房的。最终，形成房屋是用来住的，整体上协调的平衡状态。在这个模式下，房地产的金融资源也会发生变化，它用不着去搞 80%-90% 那么多的贷款，只要有一部分贷款，开发完房子，卖掉一半，就把房屋贷款的 50% 给平衡掉了。然后还剩下的一半是租赁房，租赁的租金可以发债券，这样就把它投资转化为社会股权投资、债权投资，但是房地产商已经不欠这笔债了。然后房地产商就用它的租金来付债券的利息。10-20 年后，如果房地产产权、股价涨了，涨价部分就是房地产商得利的部分。

客观地说，中国房地产商是不是真赚了那么多钱？30 多年来，中国土地批租了 50 万亿。政府批地，10 几万亿是征地动迁的成本，有 30 多万亿是政府拿到的钱后，铺天盖地的城市建设、基础设施改造、各种地铁建设、政府的负债，靠这笔钱来平衡掉了，土地财政的概念。房地产商拿了 50 万亿的土地，花 100 万亿造房子，这 100 万亿加上土地成本是 150 万亿，造完以后卖掉。房地产商一般在房子造好的前一年预售，房子造好以后的两年内

把房子卖掉，这时候一般房价是成本的 130%，赚 30%，形成了周转，收回 200 万亿。现在实际的价值，值 300 多万亿，千百万老百姓，包括你们在座买了房子，一套两套的，房价都在涨。所以这个房地产改革，还真是中国共同富裕最经典的案例。而且绝不是说这笔财富，200 万亿都聚焦在房地产商，房地产商在宏观上最终聚焦了 50 万亿，但这是它动用 150 万亿周转产生的，也是合理的正常利润。有 100 多万亿是千千万万老百姓、买了商品房的人共同富裕的。中国现在这个社会，总的是平衡的。这个房价如果跌三分之二，或者 30%，共同富裕了以后的老百姓们要叫起来了，在这个意义上，房地产的稳定十分重要。所以中国政府的房住不炒，要体现在房屋开发以后的利用模式上。最后一点，今后中国对房地产的规划管理很重要，怎么样把城市的住宅、城市建设变成绿色的、数字经济的房地产智能城市。

大体上讲完了整个概念，讲的比较宏观。政府的五条也是今后五年十年十五年，长周期的，房产商也是今后五年十年的长周期中适应性地调整自己

的行为模式。大家关心的是眼下的房产商，我对2022年房地产怎么软着陆有几点判断。第一，不管房地产的拐点怎么拐，并不会因为这个拐点，就使房地产不重要了。房地产作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中国如此，美国如此，欧洲如此，现在如此，一百年以后还是如此。一个产业占GDP总量5%以上的，就是支柱产业，房地产所产生的折旧、利润或收入，一般要占到6%到7%。即使欧洲美国也占6%到7%。中国一炒作，拼命投资，拼命扩张，甚至有时候会影响10%，刚刚提到的上10%下10%，一进一出，可以影响20%。以后对国民经济的影响不那么大，但是它也是支柱产业。第二，它是龙头产业，因为房地产确实和40-50个工业商业服务业关联在一起，所以房地产景气会带动40-50个行业。第三，它是民生，是老百姓安居乐业的一个基地。第四，它还和金融有关。因为房地产是重资产，不动产，它里面至少含有30%到50%的金融资源，涨落都会影响金融坏帐或盈利，也是金融系统十分重视的一个行业。所以任何国家都不支持房地产大起大落，如果一个时间大起了，

如果它要落下来，也希望它平稳落地，软着陆。

那么，现在怎么样让它软着陆？归结为两个字——“重组”。有五种重组，在今年到明年，今后三年里面，会在“重组”两个字上看到各种各样的案例，最后来化解房地产商爆雷崩盘的状态。

第一种，就是大的房地产商，房地产集团，自己壮士断腕，自己对自己下面的子系统进行重组。最经典的案例就是万达的王健林，他 2015 年实际上跟恒大同样的规模，也是 1 万亿资产，8 千多亿债务。万达这五年没有去拍卖什么土地，而是卖掉了很多非房地产的产业，包括电影公司，各种影院，各种各样的娱乐世界。卖掉以后就是还债，他现在 8 千多亿资产，债务 6 千多亿，资产当然也缩水，但是总的来说相对还好。

第二种，当一个大公司要崩了，自己救不了自己了。房地产一旦爆雷，自己崩掉是一回事，它一定有上下游的产业链，在崩雷之前这几年对帮它施工的单位，就欠很多的三角债，它如果崩掉了，施工单位一起倒霉。它如果崩掉了，那么借钱给它的银行会出现大量坏账。另外，非银行金融机构，还

有它高息蓝筹乱集资，买它发的债券的老百姓也会倒霉。最后，它如果崩盘，以预售款方式买了房子的老百姓也会倒霉。他们交了预付款，进行按揭贷款，但是最后房子却没有拿到。所以房地产商如果崩盘，不是孤立的一个法人资产毁灭的问题，它带出了社会的五个层面，买房子的老百姓、银行、非银行金融机构、借高利贷给他的老百姓、供应链上的企业，这样的一串。在这个意义上，从维护社会稳定的角度，让房地产商软着陆，避免崩盘，减少冲击，是个明智的做法。所以第二个办法就是外方，让社会优秀的民营房地产商，比如万科，你可以说万科是民营的，因为它国有股权占 15%，85% 是民营股份。万科的负债率现在只有 70%，各方面指标都是好的，它当然可以承担一两个任务，对某个房地产商进行收购兼并。资产经过打折收购兼并后，债务你也要承担下来。通过你的重组，最后让银行的债务、社会的债务、还有老百姓房屋的正常交付等达到平衡。

第三种重组，就是国有资产，国资委下的国有资本运营公司出资入股。这不是指中石化、中石

油，那个叫资本投资公司，是产业性的公司。如果五个国有资本运营公司拿出一万亿，可以入股到优秀的民营的房地产公司里，一起增加购买力，重组房地产公司。

第四种重组，政府拿出一部分钱，对崩盘的房地产商已经造好的楼盘，可以酌情购买。购买后，中低端的房子拿来做公租房、廉租房、保障房，中高端的房子能够做城市的人才房、长租公寓。房子买了不会产生坏账，放在那里总是保值的。比如说你购买了 300 亿，这 300 亿到房地产商的手上，房地产商只能拿来还款、周转，不能拿来分红，也不能给股东钱。因为一旦到了债务冻结的时候，一切现金流首先还债权人，其中老百姓的债权人是第一的，还有就是产业链上各种供应商的债权人，然后是金融机构债权人。

第五种，地方政府还可以折价收回地块。你在过去五年里卖了很多高价的地给房地产商，房地产商现在背不动了，崩盘了，那你把地收回，把拍卖土地的钱还给人家。但是也不是直接还它，而是给了债权的清算委员会，这个土地其实已经不是房

地产股东们的了，而是债权人的土地。政府可以回购，这几年土地地价也没有怎么涨，打8折回购，人家也愿意卖掉，债权人也愿意清盘。这时候绝对不能没收土地。没收土地是在房地产很景气的时候，国家为了防止炒地皮制定的规则。市场很景气的时候，由着房地产公司炒地皮不管，这次它要崩盘了，你来没收，这个政府很笨。这时候政府没收地皮不是没收房地产商的，是在没收债权委员会的地皮。房地产商到了要崩溃的时候，它的一切资产归债权委员会。债权委员会是谁？是银行，是老百姓，是社会各种债权人。所以地方政府不能突然抢钱一样地来抢这块地。看上去是在跟房地产商打架，其实是在跟债权人打架，要依法办事。

我讲的这五种重组方式，一定会在今后三年中，贡献出各种各样的经典案例。三年以后，MBA课堂上就会出现5个10个精彩的代表整个中国房地产重组软着陆的经典案例。

以上就是我要讲的全部。最后说一句，经过重组以后，中国的房地产在整个国民经济中，是不是就会从此对中国经济的作用力下降呢？结论是有几

个不变。

第一，支柱产业地位不变。房地产业至少影响 GDP5%-7% 的比重不会变。

第二，财政收入不会变。大家有时候说，以后过了拐点往下走，卖地卖得少了，靠土地的财政收入就少了。以往每年 7-8 万亿，10 年有 70-80 万亿这样的卖地方式，甚至像过去，今年 7-8 万亿，明年变 10-12 万亿，这种概念没有了，可能以后每年土地批租量就只有 3-4 万亿了。但是不要着急，房产税、物业税会出来。500 万亿的房产资产，哪怕有一半，因为是老百姓的，是豁免的，剩下 250 万亿，哪怕 1% 的房产税，一年也有 2.5 万亿。总而言之，堤内损失堤外补，在这个意义上，税务会平衡的。

第三，关于房地产业占 GDP 的总量。房地产商不再那么大规模地建设，但是整个房地产变成租赁房了，租赁本身算 GDP 了。老百姓如果买了房子住着，不算 GDP，如果有一半房子是租赁性质的，那么你这个 GDP 就多了。香港没有房产税，没有物业税，但是任何香港人买了房子，不管

是私人产权房还是国有产权房，还是其他性质的房产，假设这套房子 2000 万一套是你自己的，它就把你视同 2000 万这么一套房子在租赁。假设租金是房价的 3% 左右，2000 万就有 60 万的租金，政府认为你有 60 万租金的收入，收你 60 万租金 3% 的利得税，差不多 1.8 万。由于有了这个概念，这 60 万租金就是 GDP，所以香港的 GDP 里就有房产的 GDP。美国人也是这么算的。整个中国几百亿平方米的房子，只要是自己产权的，是不算 GDP 的。所以在这个意义上，美国人有 20 多万亿 GDP，如果中国也这么算，现在中国 17 万亿，说不定也变 20 万亿了。我讲这一块呢，其实是想说，一旦法规变化了，这里面都会变。所以，最终房地产在中国的经济影响进入到了常态化的良性循环。那么从这个意义上，这一次中国房地产出现拐点是客观的趋势，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最终对中国带来一次长治久安的调整。我就讲这些。

乔依德：非常感谢黄市长的精彩演讲。对这样一个比较枯燥的题目，能讲这么出神入化，确实是非常不简单。下虽然时间不早了，但是我想还留一

点点时间，提一两个问题。

谢荣兴：非常感谢乔秘书长把黄市长叫来。我就问一下热点的话题。前年讲了三个代表人物，民营企业任正非，央企刘志军，江湖马云。黄市长对任正非非常赞同，对刘志军的功过也很清楚。请问黄市长，我就追问一下，评论一下当下的热点，联想和柳传志。

黄奇帆：任正非是大家的楷模，80多岁还兢兢业业。那么说到柳传志呢，我从来对他是比较尊敬的，他也差不多是近80岁的人，一直在干，把PC机干到世界第一，差不多连续20年，不在第一就是在第二，都是在比较好的一个发展过程。如果我站在远距离，对柳传志或联想有什么判断的话，以我的智商或我的角度，我只觉得他们有一件事做得不成功，或者说不那么睿智。就是2005-2006年收购IBM公司，如果我是柳传志的角色，我绝不干这个活。我当然不是这个角色，我是在旁边，但是我2005-2006开始谋划在重庆无中生有，建立一个中国或世界最大的电脑基地。就是说从那时候，重庆就形成了世界笔记本的电脑三分之一，全世界

一年 1.8 亿，重庆有那么六七千万，这十几年始终保持这个地位。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我当然对笔记本电脑世界的情况，或者说对 IBM 公司、惠普公司这些终端产业的整体概念有所了解。我自己觉得他们在购买 IBM 公司这件事上，其实不那么聪明，不那么睿智，不那么划算。联想花很大的钱买了它，IBM 公司当时甩掉了一个包袱，他们那时候从硬件转化为做服务，做系统，做另外的高科技。这时候花大价钱买了它，好象是中国扩张，其实背了一个包袱。对联想来说，因为买了 IBM 公司这个系统，使联想的电脑升格了吗？不见得。但是成本很高。法人治理结构外部化，IBM 高管占它的三分之一，全是拿高工资。很多的逻辑性的、结构性的水土不服，其实是由这件事开始的。如果没有这件事，它现在可能会是另一种结构，另一种场面。就讲这一点。

赵广彬：我的问题很简单，你说的房地产对中国未来经济的影响，我们是不是正式进入到一个新的时代？未来 15 年，碳达峰、碳中和、数字经济是不是能保证经济的持续发展？谢谢。

黄奇帆：关于房地产，我刚才已经讲到很多了。尽管出现了拐点，并不是说它是一个夕阳产业，以后在中国无足轻重，不是这么回事。经过这样的调理，最终房地产 100 年都是中国的支柱产业，而且是稳稳当当的支柱产业，还照样是带动中国几十个产业的龙头性产业，是老百姓的民生产业，也是一个泛金融的产业，所以它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调整以后呢，中国房地产业的良性循环会进入一个新的常态，可能三五年以后房地产的负债率基本就在 40-50% 了，跟全世界一样就是 40-50%。因为你是重资产，轻资产可以高负债，重资产不能高负债，这个规律必须遵循。这个我刚才都讲过了，没有必要再讲了。

至于你说的双碳，这个肯定是一个逼上梁山事情。不光中国政府要这么做，是全世界要求中国政府必须这么做。中国政府也将为全世界做贡献，并且对全世界的双碳发挥引领作用、推动作用，而且在双碳目标实现过程中，中国要做能源革命的领头羊，意思是什么呢？中国今后 15 年，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国是必然的事，不用动脑筋，也都可

以知道的。但是经济规模最大，不等于世界竞争力第一强国。世界第一强国有三个条件，第一，你经济规模最大；第二，你是世界工业革命的领导者、引领者、推动者，这样你的科技和工业技术就成为世界第一。有了这两条以后，你实力强了，再过 20-30 年，你的货币成为世界第一大货币，你就成为了世界第一强国。

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在今后 40 年里通过引领双碳，确实可以成为世界新的工业革命的引领者。这里面有三个原因。

第一，中国现在是世界所有清洁能源装备 60% 到 70% 的提供者。这个装备不是两头在外，来料加工。我现在说的，全世界清洁能源的装备，它的设计、品牌、生产线、原材料、加工，都在中国，搞完以后卖出去，是真正的中国制造，中国技术。原因是中国的清洁能源，比美国、欧洲清洁能源的每度电要便宜 20%，对所有的发电厂来说，买你的装备，成本能够低 20%，当然买你的。

第二，进行清洁能源供应以后，电力的储能系统这一方面，现在中国也占 60% 到 70%。所有的

储能电池 73% 是中国造的。电动车，各式各样中国制造，占了 50% 到 60%。现在的电动车，也不是美国的车，欧洲的车到中国组装，现在都是中国自主品牌。

第三，中国是清洁能源最重要的基地。但凡是清洁能源，供给源都不是小农经济的农庄，比如家里面的屋顶铺点太阳板，院子里弄点风车之类。这种田园风光，都是文人写的东西。一天多少亿度电，这种大电力一定是巨大的电力基地提供的。而巨大的电力基地，绝不是在大城市旁边。火电厂是分布的，上海周围有六个电厂，大致是 10 到 20 公里分布在上海郊区，通过一般的高压电就转过来了。但是光伏电，一定是离开城市 3000-5000 公里的沙漠地带，水电也在 5 千公里外的长江上游，西藏和云南这些地方。全世界的清洁能源都在沙漠里面，从沙漠到城市 5 千公里。现在全世界的高压线，3.5 万伏，11 万伏，22 万伏的，全世界用的高压线有个问题，一度电每 1000 公里传输就损耗 20%，1 亿度就少掉了两千万度，5 千公里呢，就没有了。如果没有中国的超高压，全世界 2050-

2060 年，绝对不会实现碳中和。可以讲这么一句话，全世界达到碳中和，清洁能源革命，建立在中国的超高压输电技术上。这十几年中国发明了超高压 300 多个专利，绝对是世界级的发明。他们要用清洁能源，就得使用我们的输电技术，现在世界上美国欧洲都买中国的。沙漠到城市之间的传输，最重要难度在哪里呢？清洁能源最大的难度，白天有电，晚上没有电。假设这个基地有 1 百平方公里、1 万平方公里的广阔天地，白天有几亿度电出来，到晚上没有了。白天要把几十亿度电储存起来，世界没有这个技术，而且这个转换过程是要成本的，按现在的技术水平去做绝对是赔本的。一是安全，二是技术，三是成本，全世界都无法做供给端的储能。我们现在搞的储能是消费端的，家里的手机、电视机，包括汽车等，供给端无法储能。

那么怎么解决呢？地球绕着太阳 24 小时，分成三个时区，美洲时间、中国北京时间、伦敦时间，像股票市场那样 24 小时轮转，电力也是 24 小时的太阳能轮转。跟着这个思路，在中国，如果有 50 万平方公里发电，有 10 万平方公里发的电够中

国和亚洲用了，还有十几万平方公里给欧洲，十几万平方公里给北美，世界五大州用掉 50 万平方公里的发电。到了晚上，撒哈拉沙漠那边也是 50 万平方公里发的电供应全球。再到后半夜，美国东部沙漠、墨西哥也供应美洲和、亚洲、欧洲。这时候靠什么连接呢？直流超高压技术，中国的超高压将是全球能源互联网。有一个词叫全球能源互联网，大家一般读这个词，把它当做是大数据云计算的互联网，应用到电力系统就是能源互联网，应用到工业系统就是工业互联网，应用到消费系统就是消费互联网，大家都这么理解。其实总书记连续三年在联合国的会上都说，支持全球能源互联网建设，其实讲的是中国超高压将构成全世界能源运输的互联网。联合国现在有一个机构，就是全球能源互联网机构，主席就是中国电力公司的董事长，有五个副主席，美洲有个副主席，俄罗斯有个副总统，欧洲某个国家的副总理，亚洲、欧洲、美洲的都有。为什么中国企业老总就能做主席？因为整个系统就是中国造的。从这个意义上，大家一定要想清楚，双碳这件事，一是中国所必须的，因为全世界碳排放

中国占 30%，所以我们的压力最大，我们只有全世界 17% 的 GDP，却占有 30% 的排放量，这个就有点问题了。但是，因为我们现在的技术使得中国将为全世界双碳目标做贡献，不仅仅把自己的问题解决，还帮全世界把问题解决。所以中国成为世界之最，再过一些年 GDP 就是世界之最了，又引领了能源革命，再加上如果货币逐渐放大，成为世界老大是肯定的。

乔依德：时间不早了，我们再次以热烈的掌声，对黄市长今天演讲表示感谢。

（以上内容根据录音整理，未经本人审阅）

俄乌战争的观察与思考

冯绍雷

华东师范大学终身教授

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 – 俄罗斯研究中心主任

上海发展沙龙第 171 期 2022 年 3 月 3 日

乔依德（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各位来宾，各位朋友，我们的演讲马上开始了。今天是我们春节以后的第一次活动，大家可能记得，我们春节以前的最后一次活动是邀请了黄奇帆先生，他对国内经济形势做了非常精彩的分析。其实那个时候，关于乌克兰的一些事情已经开始显露。在那次活动上，我和冯绍雷先生也交谈过关于乌克兰的一些情况，我们认为以后恐怕还要再讨论。因为时间紧，春节前我们没有举办活动，所以春节后我就跟冯老师约了。今天有好几位朋友说，你怎么那么巧想到了这个话题？我说，我们没有那么大的预测能力，美国总统开始说是 16 号打、20

号打，最后是 24 号开始打起来，战争哪一天打起来，我们也不知道。但是，这是一件重大的事情，现在全球，包括我们自己都非常关注。所以，我们很高兴能邀请到冯绍雷老师给我们今天做演讲。冯老师现在是华东师范大学周边合作与发展协同创新中心主任，他以前也担任过华师大的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院长、俄罗斯研究中心主任，是我们国家非常著名的研究俄罗斯问题的专家。下面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冯绍雷老师给我们做演讲。

冯绍雷（华东师范大学终身教授、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俄罗斯研究中心主任）：感谢乔秘书长的致词，感谢上海发展基金会的邀请，也谢谢各位新老朋友的莅临，看来大家都有关注这个话题。像老乔刚才所说，俄乌战争现在刚刚处于进程中，不光是海外，国内舆论也是意见相左，争论非常激烈。在这个背景之下，许多问题至今没有搞清楚。现在谈论俄乌问题，我只能尽量介绍我了解的一些情况，仅供大家参考，我会讲得简短一点。最后我们可以通过问答再来讨论。

首先是关于战争的进程。说实话，信息是错综

复杂的，里面有真也有假，因为是战争，各种东西都会有。我从战争过程中，梳理了几个看法，提供给大家看看是不是符合实际。

首先是关于传说中的“闪电战”。我不知道普京是不是一开始决心要打这场“闪电战”，但是从第一天和第二天的推进来看，特别是从第一天的推进来看，的确是进展神速，而且是从各个方向向基辅推进。俄国人打这一仗到底有没有把握？有两方面的判断，一方面说，对于俄罗斯来说，乌克兰绝对是一家的兄弟，我们认识的许多朋友本身是乌克兰人，乌克兰人在莫斯科工作，或者莫斯科人在乌克兰有亲戚，又或者反过来。泽连斯基在莫斯科演了多少戏，所以他们真是一家人，这个话是不错的。在知根知底的情况下，你说俄罗斯发起这场战争完全是处于一种莽撞、一种战略误判，这倒未必。但是，又有一个判断，就是说俄罗斯到底有没有“闪电战”的考虑？有没有确切理解到当前乌克兰人民对于俄国施加压力的急剧反弹？我觉得就这一点来说，看来俄罗斯的准备可能不够。这是第一个情况。在俄乌战争的推进过程当中，我们可以看

到进程开始很快，但后面有所停顿。停顿的原因有两种分析，特别是东部地区的卢甘斯克、顿涅茨克地区的进程停顿，因为这片地区的乌克兰军队是从西部，也就是民族主义最强烈、爱国主义最强烈的地区过来的生力军，他们挡住了卢甘斯克、顿涅茨克的地方武装，因此推进的速度很慢，每天几公里，10多公里以上已经是非常了不起的战绩了，这是一个情况。关于推进缓慢以后出现的变化，到底是由于当地爱国主义武装的坚决抵抗，还是由于俄罗斯本身在做调整，包括是不是由于要开展谈判，所以不得不放缓脚步？谈判的同时，实际上战争没有停止，炮火还是继续。这是第一个阶段。

第二个阶段的情况，逐步清晰了一点。俄军从北方直指基辅，从东北方向苏梅大举进攻，从当时的目标来看很清楚，是要形成对城市的合围。南方，特别是对克里米亚旁边的城市赫尔松，现在已经基本控制了。赫尔松旁边有一个非常漂亮的城市，就是敖德萨，赫尔松如果拿下来，敖德萨基本上也控制住了，因为两个城市相距很近。在黑海上的一个岛屿是蛇岛，蛇岛一旦占领，就表明俄军从

南方，不光对城市，而且从海上就要切断对乌克兰的支援了。在东方，好像形成了对乌克兰几个大中城市合围的趋势。但是合围之后怎么办？事情就来了，合围之后就是巷战，巷战当中到底会有多少死伤？这完全是不可计数的。从俄国国防部发布的军事态势地图，看上去的确有“多点合围”的部署。我只想讲一点，就是对基辅这个地方，北方已经形成对基辅的控制了。空降兵已经把基辅通往西部的路切断了，这个很重要，因为这就意味着俄罗斯现



图 1：俄乌战争形势

在已经把握住了制空权。也就是说，西方只有通过波兰进行军事援助，因为北方是白俄罗斯，西方要进入，只有通过一块地方，那就是波兰。如果在这里形成合围，来自西方的军事援助就进不来，而且空中也降不下来，这个情况对乌克兰造成了非常大的压力。

我比较认同有一些军事分析家的看法，就是说俄乌战争可能既不是“闪电战”，或者说打不成“闪电战”，也未必是分兵合围，主要集中在几个大中城市，因为北边的部队下来必定要经过基辅。但是大家还会以为，俄军就是把基辅作为目标，实际上不是的。这种想法主要的依据是什么？俄军的想法是从北南下，南方的军队自南而上，因为这两支力量的确非常强劲，同时东部地区紧紧咬住乌克兰最有杀伤力的生力军，据说有 15 万，乌克兰军队不过 25 万左右。但是瞄准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的这支乌克兰部队是最精锐部队，当北方的俄军南下，克里米亚的俄军挥师北上，很可能就沿着第聂伯河。第聂伯河是一个天然屏障，2 月下旬以后逐渐开始化冻，今年春天来的比较早，它已经开始

化冻了，因此第聂伯河很有可能就形成一道天然屏障。如果左右两岸的俄军能够守住，这一块乌克兰的军队就成问题了。这个到底是一开始就有这样的预案，还是俄方根据形势做的调整，还要继续观察。但是我个人觉得，这可能是到现在为止，比较能够说明问题的解释。

今天下午不知能否开始谈判，因为乌克兰人对这个谈判地点有意见，地点是白俄罗斯布列斯特州的别洛韦日森林。我们老一辈的朋友肯定会记得布列斯特，这是历史上很著名的地方，也是普京批评列宁的地方。普京批评列宁说，“你明明知道德国即将垮台，你居然还去跟他签订 1918 年的布列斯特合约。”因为签订布列斯特合约，就是要把乌克兰、白俄罗斯的大片土地让给德国，而德国马上就要垮台了。布列斯特的别洛韦日国家森林公园，苏联解体的协议就是在这个地方签署的。所以，乌克兰的朋友可能觉得那里风水不利，他们不知道俄罗斯葫芦里卖什么药，对于重新到别洛韦日和谈他们心里有点发怵，所以说这个地点不行。但是地点的选择象征着谁会带着谈判的整个方向，如果两次会

谈都在白俄罗斯境内，而俄罗斯是俄国的盟友，大家就可以感觉到上下风之分。俄乌战争一下子肯定停不下来，但是我认为开始降温、停战也不是一点都没有可能。俄罗斯面临如此巨大的国际压力，我觉得他必须考虑这个现实的情况。如果乌克兰方面作出一些俄罗斯人能够接受的让步，也降低自己的条件，我觉得降温停战还不能说是一点都没有希望。因为这场战争打下去，是不得了的。这是第一个判断。

我个人认为，到现在为止，局势一点都不乐观。俄国下了那么大的赌注，几十万大军已经派过去了，这个时候他就能停手？按照我们理解的俄国人的脾性，恐怕做不到，这是第一。第二，那就是非常可怕了，如果俄军以城市为目标，而乌克兰人坚决抵抗，那将是一场血肉搏杀，会非常可怕。兄弟阅墙也会闹到这一步，我觉得这是一次非常严重的教训。我们大家知道，不光是基辅北方的切尔诺贝利，在东部的扎波罗热也有一个核电站，据说这两个核电站已经被控制住了，东部的被俄军控制，北方那个很有戏剧性，是俄乌军队共同控制的。在

1986年4月份切尔诺贝利事件之后，我大概是8月份去学习的，所以我非常知道离这块地方不到几百公里就是白俄罗斯。如果再这样打下去，大城市巷战，多少人要死亡？核电站、难民危机，说不清楚到底会爆发什么恐怖主义活动，因为俄方完全有可能以乌方为幌子，或者乌方以俄方为幌子，到时候谁都说不清楚。这个局面完全可能出现，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可怕的结果。

俄罗斯出兵的目的，我认为最关键的就是非军事化。你要加入北约，我就打断你手脚，废你武功，这个能不能做到呢？至少到现在为止，1600多处军事设施已经被炸毁了。在第一阶段，俄方远程制导武器就过去把那些东西都炸毁了，接下来还会继续打。还有城市里面的设施，包括电视塔都已经炸了，这个动作还会继续。我认为，部分废除乌军的武备，俄方可能是做得到的。做到之后，对普京来说，是不是就达到了一部分目的呢？至少去军事化，我觉得已经部分实现了。非纳粹化，这个比较复杂，我下面再讲。到这个时候，如果普京觉得，我已经把干得差不多了，可以撤军，未尝不失为一

个台阶。

以前有过一个先例，就是 2008 年北京奥运会时，俄罗斯和格鲁吉亚的冲突。2008 年 8 月 8 号晚上，欧洲时间是 8 月 7 号半夜，格鲁吉亚方面先对俄罗斯阿布哈兹和南奥塞梯两个合法的军事基地发起进攻。因为小国要弄点事，就希望美国人能够支持。但是，美国在这个问题上，我觉得倒是很冷静，当年美国极力劝阻格鲁吉亚不能动。后来俄罗斯知道开打了，先不动手，就看着，等了整整 12 个小时之后，58 集团军从边界长驱直入，一下子打进去，差不多打到第比利斯，就是斯大林的故乡。但打到第比利斯时，他不动了，而且把那些重要设施摧毁之后，就马上撤回，这是当年对格鲁吉亚的做法。当然，这次战争不可能是以前的重复，但是过去的案例是不是对今天有点参考？我觉得还是可以借鉴的。所以我觉得，如果他对军备做了大规模的摧毁之后，选择一个适当的时机撤退，这个可能性还是存在的，就像格鲁吉亚战争。

下面讲一个问题，可能是最麻烦的一个问题，就是现在关于这场战争怎么去理解？这几天，我上

经常去的理发店，理发师们手里拿着剃刀，已经分成两派了。一派说，中国人坚决支持俄罗斯，因为他们是在帮我们和美国对着干，另一派人认为俄国就是希特勒的做法，怎么能这样打进乌克兰？舆论的尖锐程度使我弄到一半，头也不剃了。

到底怎样理解这个问题，我讲三个方面，当然我也拿不准，我们都处于一个思考过程当中。第一条，北约的确在违背承诺，坚持推进北约东扩。为什么我坚持说北约违背承诺，这个话是有依据的。如果从文字的文本来看，没有任何对北约东扩的承诺，也没有文件或国际法中讲的文本。但是，大家可以看看基辛格写的《世界秩序》这本书。大家知道基辛格是个战略大家，也是一个理论家，也是教书匠。他提出一个问题，就是国际秩序何以形成？就这个问题，他提出一个命题，这个命题很简单，一句话，就是合法性和实力的均衡。也就是说，你要有实力，但不光要有实力，还必须和你的合法性形成均衡，要关联起来。如果你有实力，但是没有合法性，那你就是胆大妄为；如果你讲公道与合法性，但是你手无缚鸡之力，那也办不成。基辛格

不光是现实主义者，而且也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他一辈子总结出来的这个结论，我认为他核心的思想。什么叫合法性？我看了他几乎所有的重要著作，看不出他对合法性有一个明确的定义。是不是成文的国际法就是合法性？当然是。但是基辛格认为，这远远不够，其中还包括领导人之间的信任，所谓信任，就是领导人之间的承诺。所以我要讲的就是这句话，北约有没有过承诺呢？从当年美国国务卿科尔，一直到德国外交部长等都说过北约不向东推进一寸，最近三两个月，西方的大报上、德国镜报上面等已经推出来好几篇这样有根有据的大文章。

所以关于北约东扩这个事，我们怎么看？实际上冷战结束之后，美国人倒不太想扩，甚至北约都不太想要，因为战争结束了。大家知道美国有孤立主义的倾向，当时美国降低了国防预算，驻欧军队返回美国。但后来，中东欧的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等国家，因为旁边是强邻俄罗斯，想要有安全保障，所以有这个诉求。在波黑战争中，欧洲人自己摆不平欧洲的安全事务，就请“老大哥”

回来。因此，1996 年是北欧东扩的一个焦点，到 1997 年之后不可遏止。这个事情美国看得清楚，也想得明白，就是北欧必须东扩，这样不仅能留在这边影响欧洲，而且能分化欧、俄。当然，西方说的也不是没有道理，你拿不出成文法，为什么戈尔巴乔夫当时不跟我签下文本？当时戈尔巴乔夫同志确实有点问题，他要的是德国人 600 亿的财政援助，最大的目标是前苏联经济能够稳定，只要能够拿到这个援助，经济就能稳定下来，在这个问题上他绕不过美欧联手对它的压力。下面解读俄乌战争的几个争议。

第一，这次战争为什么发生？俄罗斯方面是有一些理由的。比如说乌克兰激进势力对明斯克协议的否定，是不是呢？我觉得大体属实。2014 年克里米亚危机之后，由于法国、德国极力斡旋，我认为美国还是支持的。大家知道美国有点要收缩的意思，所以，美国让法、德处理明斯克协议。关于明斯克协议，除了停火休战，关键的问题就是对于乌克兰东部地区的两个州以及克里米亚怎么处理。克里米亚俄国人已经拿过去了，卢甘斯克和顿涅茨

克两个州宣布独立，也已经成立共和国，怎么处理这个事？这是对乌克兰非常大的挑战。在这个背景下，八年前，欧洲代表法国、德国和乌克兰、俄罗斯这四方好不容易坐下来谈，达成了明斯克协议，其中有个关键的条款，就是罗甘斯克和顿涅茨科地区不光是停战，而且当地居民有权自由选举决定今后在乌克兰的法律地位。这一条很关键，但是很抱歉，由于情况的变化，并且乌克兰内部的激进势力不同意这样做。

乌克兰这个国家的确是比较困难的国家。有一个俄国独立知识分子的代表，他经常和普京对话，2014年到我们机构来做一次内部演讲，他讲到俄罗斯和乌克兰，谈到今天乌克兰内部为什么出现完全达不成协议的这样一种局面？他说，关键是因为乌克兰是寡头当政，国内分崩离析，而且腐败严重。腐败严重到什么程度？他开玩笑说，如果你想办成什么事，你到莫斯科去，你给钱能办事；但是到乌克兰去，给钱以后，人就没有了。当然这是俄罗斯人对乌克兰的看法。到今天为止，对乌克兰的形势，各方争论非常激烈。有的人认为乌克兰已经很

不错了，有人则认为乌克兰能力不行。我比较倾向乌克兰还是问题很严重的这方，否则北约和欧盟，特别是欧盟，为什么迟迟不愿意把他接受成为成员国？因为欧洲人太清楚乌克兰了。所以俄方的理由有一点根据。但是如果是因为泽连斯基最后那几天说乌克兰也要准备拥有核武器，而俄方称这是他们发动战争的理由，我个人认为有点牵强，因为这个仗俄国早就准备了。但是无论如何，这个战争的发生，是因为北约的确有所承诺，虽然不是以文本的方式承诺。所以，在北约持续东扩并且在乌克兰激进势力抛弃明斯克协议的背景下，普京下定决心对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发起军事进攻。

第二，这场战争改变了历史。不光是冷战结束，甚至是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国际社会普遍是希望通过谈判，而且尽一切可能进行谈判。举一个例子，冷战以这种方式结束，我们这代人都是受惠者，我们得到冷战结束的和平恩惠。冷战结束之后，大家基本维持这个思路，谈不成也要尽可能地谈，希望能够维持和平的局面。但是这场战争，我觉得改变了这个传统，很遗憾。

第三，我觉得这场战争不只是军事战场上的博弈，而且这里有大量的政治抱负，包括要成立独立国家、要建立中立区等各式各样的想法，里面有大量的政治观念和政治制度设计的考量。它是政治的、军事的、经济的，包括经济制裁，甚至还有信息的、科技的、心理的，包括文化的。大家可以看到普京在出兵之前两三天，洋洋洒洒地发表了一大篇讲话，讲的就是俄罗斯文明。当然这个问题比较复杂。这场战争是这么一个复杂的综合体，换句话说，我们要解决这场战争，走出战争，就必须在这些问题上都下工夫，单单靠战场上解决问题是不行的。如果把乌克兰军备全铲除干净，然后美国又会补充军备进来，这样忙都忙死了。

我说这是一场信息战。现在网上到处传播一句话，就是“没有俄罗斯，还要这个世界干什么？”你们听说过这句话吗？这句话是有点俄国人脾气的。有个领导问我，普京说过这个话吗？我印象中，他有过类似的表达，于是我请我们机构的同事一起找资料，最后至少找出两三条东西可以证明我的结论。普京原话是这样说，“至于这个话题（核

武)本身,当然是一个非常重要和敏感的话题。但我想让你知道、我想让我们的人民知道、我想让国外知道我们使用核武器的计划——我希望它永远不会发生——但理论上讲,这就是所谓的‘受攻击时的发射’。这是什么意思?这代表,只有在我们的预警系统不只记录到有导弹的发射,而且准确预测弹道和弹头会落在俄罗斯领土上时,才会做出使用核武器的决定。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受到攻击时的发射’。也就是说,如果有人决定摧毁俄罗斯,我们将有合法的报复权力。是的,这将是一场全球性的灾难,整个世界的灾难,但身为俄罗斯公民、俄罗斯国家的领导人,我问自己:‘我们需要一个没有俄罗斯的世界吗?’”原话的意思和我们网上传的并不一样。但是,问题又出在哪里呢?我拿出了2018年3月31号俄文报纸,报纸的头号标题跟中文的表述居然是一样的,说“没有俄罗斯的世界我们还需要吗?”这显然是俄罗斯的标题党,从普京还算是比较正面的一段话里,挑出这么一句不三不四的话作为标题。后来领导问我,俄罗斯有没有做过澄清和说明?我说那抱歉,没有时间去查了,我

估计还就马马虎虎这样过了。所以，现在网络上的东西，大家真的还是要谨慎对待，而且特别是对于我们干这个工作的人，尤其要好好验证，有些话到底有过有。当然，这句话我是查有实据，可以非常确切地跟大家说是这么回事。

对这场战争到底怎么看？为什么俄国人突然发起对乌克兰的军事进攻？就在2月24号开战那天，我们也是阴差阳错地约好要跟莫斯科大学一位非常资深的专家对话，这位专家是非常接近俄罗斯政府的，两个礼拜之前我们就约定了，而且这位老先生也很认真，按时西装笔挺地坐在视频面前，并发过来两个提纲。我们以为他就讲几句官话，就是关于北约东扩，乌克兰内部民族主义挑动等等。但是几句话讲过之后，他提出了自己的核心的观点，他说，“我认为，经过五个阶段的详细分析，我可以告诉大家，战争的发动是由于我们的领导人在美国发起的信息战中被引入歧途，掉入陷阱。”我听了以后，真的有点惊讶，在我们这个场合，至少是半正式的场合，一个非常接近俄国官方的专家，在战争第一天刚刚开打的时候，居然说了这样一段话。

所以，我们事后都在分析，而且根据我的阅读，我发现开头几天，我们熟悉的那些普京身边最接近的朋友没有吭声，这个现象值得我们注意。问题就是在这里，普京是不是被引诱掉入陷阱？这种可能性我觉得不能排除，这些事情有待于以后的历史学家来察看，我们是远程通过各种信息来判断。说到最后，我问教授对中方的建议，这位教授说，“我们希望中方的朋友，你们能够冷静、谨慎，不要再出现被西方挑动掉入陷阱的这种悲剧出现。”所以问题在哪里呢？这个事情怎么判断？说实话，到现在我还在观察这个过程。

这里头普京的心里一点都不波动？不是的，他是有个逻辑的。有一个“瓦尔代俱乐部”，这是普京亲自发动的一个高端论坛，而且主要是面对西方，论坛里有大量的西方高官、前高官、大学者，不是一般的学者。俱乐部是2004年发起的，到2006年中国人才出现，当然我还算幸运，我是第一个参与的。10多年来，我听到普京好几次有这样的表述，记得在2015年叙利亚战争时，普京决心出兵了，他解释为什么出兵。他认为客观的情况是，

叙利亚正在发生混乱，一个非常现实的威胁是，在那里大量的恐怖主义分子利用战乱，不光在当地，而且会返回中亚，返回前苏联，会对俄国的生活形成很大的扰动。他说，“根据我小时候在彼得堡大街上打架的经验，当我碰到对方一帮小子存心要来干我了，那毫无疑问，先下手为强，先发制人。”这是普京的哲学。如果我们对目前的情况做一个分析，北约东扩了，虽然还没有打到俄罗斯的领土之内，但是这个逻辑就暗示着，有一天乌克兰可以毫不在乎莫斯科是否反对就加入北约，加入北约之后武装部队就会进来，到那时候俄罗斯再说武装部队不能进来，就晚了。所以有的时候，当面的交往和接触，就有这个好处，把这件事的处理和普京在彼得堡大街上打架的经验联系起来看，是一致的。

但是事情还没有那么简单，作为一个大国的总统，有人说普京最后的决定就是三四个人。那天国家安全会议那个视频大家都看到了，都是他的老部下，老幕僚，老朋友，普京把他们说的是体无完肤。普京是一个好皇帝，老百姓的印象就是这样，高官当中一旦他发现谁处事不公，执行不利，他是

会公开骂的，这种镜头不是第一次，当然也不是经常的，但是一直有这种东西。我要说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不要低估俄罗斯作为大国的决策过程，不是说普京一个人随性就能决策的，反正我个人不大相信，这里面一定有它的机理。

如果回顾冷战结束之后 30 年、新世纪 20 多年的过程，联合国的国际法专家说，他反对两个事情。一个是预防性自卫，第二就是可容忍的先例。预防性自卫，非常典型就是伊拉克战争，伊拉克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所以美国和英国必须先出手把它打下去。这位非常权威的联合国的国际法专家，他不认为这是合理的。然后，他认为国际法有一个非常错误的判断，就是可容忍性的模仿或可容忍性的先例。因为伊拉克危机到现在，还没有任何人对小布什有任何处理，那么俄罗斯也能干这个事了。当然我们不认为这样是对的，但《国际法》本身是存在一些问题的。

我有一个非常好的朋友是爱沙尼亚的国际法大家。在 2014 年克里米亚战争后，这个国际法大学者写了一篇文章，基本意思是说俄国人做的不对，

用这种方式拿下克里米亚绝对违背了 2014 年布达佩斯协议。在布达佩斯协议中，乌克兰交出核武器，英国、美国、俄罗斯就必须保障这个国家的安全，保障它的主权领土统一，这是基本条件。他说，俄罗斯拿下克里米亚，从国际法的具体规制来看，绝对是错了。但是，俄国人犯这个错误的前提，是因为西方违背了一个更重要的问题，就是我才说的国际法当中蕴含着的，就是由于你不公正的推进，用战略空间挤压俄国，所以导致俄国人不得不冒险出轨。爱沙尼亚这个大法学家，也是西方公认的大法学家，这篇文章居然堂而皇之地在普京支持的杂志公开发表了。

2018 年之后，我观察到俄国人做了尖锐的自我批评，真的能看出学者自我批评的犀利。一派人说，俄国做的都对，一派人说，我们做的都错了。其中的一个代表人物，他最讨厌的就是回到前苏联，去结交老朋友。他说现在国际形势已经完全不同这种氛围了，靠交老朋友去维持和乌克兰关系的思维是不对的，因此他认为外交出问题了。所以 2018 年以后，俄国对于外交总体的反思是，不准备

再跟乌克兰在具体的克里米亚和顿巴斯这些问题上纠缠，要谈就谈整个欧洲安全结构，要谈就谈北约东扩，兜底翻。看来这就是他们反思的结果。至于对不对，我们都可以做评论。现在正在发酵的，它不是一个简单的战术处理或者一个战争是否发动，而是对于一个大的构架的看法。

我觉得当前的危机的确很难处理。俄国人对这个问题的反思也不是一点没有道理，俄乌战争涉及的是整个安全结构，并且欧洲安全结构一定会影响未来国际秩序的走向。换句话说，这个事情绝对和我们有关。这是一个连环套，后面的问题不想好，前面的结是解不开的，至少现在是这个情况。3月1日的纽约时报上，托马斯·弗里德曼有一篇文章，他是一个很有影响力的专栏作家，他大体上讲了一些比较要紧的问题。

第一个前景，这将是俄罗斯世界和整个西方秩序的持续较量。我们国内也看到一些争论，就是俄罗斯世界是以东斯拉夫文明为基础，特别是以三四百年的沙俄帝国、俄罗斯文明为核心的这样一个群体，既是文化，又是人种，又是具体的政治

建构。

有一次我跟一个俄国朋友讲，“我现在很关注你们的思想，你们最近的一大堆丛书，我都买下了。”我只是客观陈述，哪知道他在旁边就说，“这些丛书完全是胡说八道。”我吃了一惊，这是总统先生亲自推动的概念，你们这些骨干核心说这全是胡说八道。但是，当我仔细了解这个概念，我才发现当时的反弹很厉害：你说你是俄罗斯世界，你是老大，那么现在的阿塞拜疆、乌克兰、白俄罗斯，包括哈萨克斯坦，既有俄罗斯人，但是又有非俄罗斯人，俄罗斯是不是打算重新把我们聚集在一起？你们老大，我们都听你的，跟你走？

我看到很多公开地对这个概念本身的批评。这个事情也不是凭空而来，新世纪以来，国际竞争特别是大国之间的竞争，实际上都已经捎带上文明的色彩。上世纪 90 年代讲文明的冲突，我们批评它。但是，新世纪以来，大国竞争显然都以文明为背景。所以我们强调这些概念的时候，分寸的拿捏就非常重要。总之，俄国的观念形态和西方规制社会的较量是非常长期的，因为俄国人是具有文化的民

族，俄罗斯是有文化的。

第二个前景就是肮脏交易。大家想象得到，现在谈判也开条件，你承诺我占有克里米亚，我放弃东部地区等诸有此类的肮脏交易。当然，估计连这个也很难谈，但是这些肮脏的交易始终会伴随着整个危机过程。对于这一点，如果想了解的，可以看看网上我以前的文章，我对这个事情有过比较详细的阐述，到底有多少方案，我这里不展开讲了。

第三个前景，就是西方所说的，他们最希望的，但是也是最不可能的就是普京下台。这两句话同时存在，非常值得我们玩味，连托马斯都认为不太可能。我刚才说了俄国精英对这个事情有点反弹，有点冷淡，已经不像 2014 年克里米亚收归的时候。2014 年 3 月 18 号，普京做了慷慨激昂的演讲，这个演讲的中文版在我们国内也流传很广。那天有一两百个精英汇聚在一起，听普京演讲，大家听了以后热血沸腾，觉得俄国人又重新站起来了。我的好朋友，西伯利亚历史研究所所长，当时有飞机专门把他带到莫斯科，他听了普京的演讲以后，说自己顿时感到心胸开阔，从此有了方向。俄罗斯

90年代自由派的精神教父，照理说是普京的对头。但是他跟我说了一句话，“我们尽管许多事情不同意普京，但是普京拯救了俄罗斯。”这句话讲了两遍。但回到今天，我感觉目前好象不再是这个局面。当然这几天舆论又开始回升，我们这些老朋友重新出现，写了大批非常犀利的批判文章。大概10天之前，根据俄罗斯主要报刊上的民调，俄罗斯人认为要跟西方保持友好关系的占60%以上。但是开战以后支持普京的，至少是50%到60%，甚至更高。所以在这个局面之下，要普京下台可能也不容易。

我想到了100多年前，1920年有一场波苏战争。苏联刚刚建立，立足未稳，当时波兰是新生共和国，当然也是西方策动，波兰做马前卒，要打苏联。列宁同志说，波兰这个小鬼在帝国主义支持下，要把我们苏联的工人阶级和德国的工人阶级分离开来，我们就是要反其道而行之，越过鸿沟，我们把它打回去，使得苏联无产阶级和德国无产阶级连成一片，推进欧洲革命，雄心壮志可嘉。波兰人打过来了，俄罗斯人也是民族情绪、爱国情绪高

昂，骑兵日行百里，打到华沙城下。但是此时华沙的反弹出现了，波兰民族主义情绪高涨起来，重新开始集结，而且在法国给的大炮支援之下，一下子把红军又打回去，打过西乌克兰，打过明斯克。两国后来签了协议，给波兰的土地跟布列斯特协议相比也不算少。咱们的列宁同志，在这场战败之后，在中央全会上不下十多次，公开地一次一次向大家检讨：我们犯了错误。犯了什么错误呢？第一是战略上的错误，单兵孤军深入；第二是政治上的错误，我们错误地以为能够干掉波兰，推进欧洲革命，这是我们的空想。后来就有了 1921 年的苏联新经济政策，就是调整，要搞贸易自由，让农民有自留地。关于那场战争，我专门写过一篇文章，30 年前公开发表。今天想想普京同志的处境，如果这场仗真的打败的话，历史的前科在，我觉得是非常遗憾的。

我就不多讲了，我稍微提几个问题，大家可以讨论。

第一，意识形态和地缘政治。实际上，我们国家现在对于国际战略的需求最紧迫，但是我个人觉

得，我们大学对国际研究、国际问题的教学水平远远跟不上。比如基本的意识形态，乌克兰作为一个自由民主国家，完全可以自主地选择任何外交方向，很清楚吧？但是大家知道，西方哲学中有一句话，自由选择必须在一般法则的背景之下。外交方向选择的一般法则是什么呢？就是地缘政治，就是普京说的，我们不能忍受打开窗户就是敌人。今天美国著名的民主党参议员桑德斯，说我们美国人不是有著名的门罗主义吗？我们有多少次案例，比如古巴，我们身边那些国家，一旦出现外国人策动，或者外国兵器出现在我们邻居家，我们肯定干预。所以这两者之间，在目前这个理论态势之下，到底是自由选择更重要，还是地缘政治的现实更重要？我个人觉得很困难。倒是有一位在特朗普时期红极一时的所谓超现实主义理论家，他的结论是，地缘政治、爱国主义历来压倒自由主义，自由主义一碰到民族主义就分崩离析。他完全是特朗普思维的路子，不要搞什么意识形态。大家知道，特朗普和普京是很好的。而且奇怪在哪里，瓦尔代论坛就是请他大讲那套理论，当中他有一句关键的话

“现在，要抛弃意识形态，在地缘政治上进行合作，美、俄联手遏制中国的关键时刻到了。”两种理论到底谁对？

第二，缓冲区中立国的问题。前几天参加网上会议，我问欧洲朋友，你有没有考虑过中立概念在处理目前危机情况下的可行性？哪里知道，对方说我们欧洲那么多民主政体的国家，我们怎么可能再回到中立，回到缓冲区，这就是势力范围啊。我想，这是不是就是老牌帝国划分势力范围？有点像，但是到底不是这回事？这又是一个关键问题。我发现布热津斯基这个老头，尽管他马列主义学得不好，但是他的思想有变化。2001年，我跟他有过一次很深入的交谈，我们在一个楼里面，他的办公室在7楼，他上午把罗马尼亚军队代表团带到大会，大讲罗马尼亚要加入北约等事情。那次我有点跟他开玩笑，我说布热津斯基先生，你推动北约还是很起劲的。他说，不不不，是东南欧这些国家自己要求加入北约。2008年我再碰到他，当时他主张G2，但是我们并不接受G2。当时梅德韦杰夫执政俄国，好象是有点自由色彩的总统。布热津斯基提

出了一个什么号召呢？有点吓人的，说今天北半球民主共同体建立的时候到来了，美国、加拿大、俄罗斯等应当联合起来，成立一个民主共同体。他讲完了，开始晚餐了，这个老先生自己问我说，“你怎么看今天我讲的话？”我说，“你最后一句话有点复杂，你们要搞一个民族共同体，那么我们中国呢？我们至少在学习民主吧，你要我们这些国家怎么办呢？”他说，“我不是说 G2 吗？你们不干嘛。那么你们就跟印度、巴基斯坦、土耳其另外搞一个团体嘛。”我说，“老先生啊，这不是要搞对抗吗？”他说，“今天是我们私下谈话，媒体上不要说啊。”到 2014 年，克里米亚危机之后，老先生观点改变了。他第一个跳出来讲，乌克兰应该芬兰化。基辛格也是差不多，基辛格比较圆滑，布热津斯基比较冲。但是实际上，我觉得两个人大体的思路是比较接近的。我看现在芬兰的朋友也不乐意，为什么我们芬兰只能中立化，为什么不能加入北约？年轻人都这样讲。但是你说大国之间硬碰硬，打开窗就是敌人，这个日子也蛮难过的。是不是有一些缓冲区，大家将就将就？我们中国有句话叫相互照顾舒

适度。

其他不多说了，就说一个事，我心里最惦记的是 2024 年，普京当然可能不干了。但是你要注意，普京的确是所有俄国人当中，我觉得比较之下对中国还算是不错的一个角色。至少 10 多年来我从没有看到过他在这些场合中，对中国人出言不逊，其他高官就难免了。甚至有一次，一个法国教授问他，俄国的远东西伯利亚去了那么多中国人，搞投机倒把那些事，难道你们不害怕，那就是黄祸。那天的会快要结束了，普京坐在椅子上，他有点蹦起来的感觉，他讲“我不希望你们提出类似的问题，我认为我们和中国有约在先，我们以和平方式解决了我们的领土问题，大家各做各的事，处理得很好。我希望你们以后不要再提这个问题。”类似这种表现有过好几次。

我就不多讲了，可能我讲的时间太长了。

乔依德：尽管这两天大家天天在看微信，看很多媒体，但刚才听了冯老师讲的，还是很有味道。下面我们还有一些时间，大家有什么问题尽管提。

赵苏婷：冯老师你好。我想问一个与中国有关

的问题。现在美国越来越把中俄放到一起，俄乌战争会不会导致我们最不愿意看到的局面，就是美欧对中国的格局会加剧？以及俄乌战争对中国会造成哪些外溢的风险？

冯绍雷：谢谢你的问题。大家对普京 2 月 4 号访华很关注，我当然不知道两位元首之间是怎么交流的，但是大家仔细看中俄联合声明，当然对双边合作有多大推进，有许多具体的表述原则上以前都有。但是有一个情况值得大家看一下，俄方坚决支持中国统一祖国、处理两岸问题的立场，这是一个非常明确的有具体指向的一个政策宣示。但是中俄联合声明中，没有一句话是讲我们对乌克兰东部地区，对克里米亚持什么立场，一句都没有。我们只是说到反对北约东扩。这里出现一个反差，他对两岸问题说得那么明白，我们对他一个具体的重大外交问题未置一词。我觉得，留下这个口子对我们是有利的。后来我在电视台做访谈，我公开讲这个观点，我觉得不光要看写着的，还要看没有写着的，没有写着的说明什么？我们中国人不趟这个浑水。从大局来说，是不是因为俄乌战争，重新回到两极

世界？我觉得不可能，而且也不需要，而且我觉得支持这种格局的人并不多。

我顺便谈谈我阅读的印象，因为我们这些人还是在研究嘛。乔治华盛顿大学是很不错的学校，这个学校有一个专门研究俄罗斯的老牌机构，这个机构有一个信息库，每两三天就会有一大批来自俄国的，也来自美国、欧洲大量关于俄国的信息被翻译成英文。以前的舆论立场大概是一半对一半，为俄国说好话的也有，但是西方立场的更多一点。但是最近这三个月，就是开战前三个月，我觉得西方学者同情俄国人的好象超过一半，甚至更多。但是到开战以后，马上立场转换过来，这是我亲身观察到的现象。就是说舆情波动很大，我们千万不能让战争左右了我们的定力。

当年我刚刚参加工作还在学校里，我记得胡耀邦同志有一段话很精彩，他说“我们现在决定要推进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而且我们不发红头文件，我们会通过一个一个的 CASE 来表达中国的立场，为什么这样做呢？以防被那些大国干的坏事所左右。”大体上是这个意思。我觉得解释今天的现

象，至少一半还是受用的，我们要保持定力，不要淌混水。

现在的问题是让你表态，你必须要选边。对这个事情我有两条意见，第一，咱们也向美国学习，美国人在两岸问题上不是一直战略模糊吗？那么我们现在能不能也搞点战略模糊的事情呢？美国也混到现在了。当然，我们一定会有中国特色的战略模糊。我们该怎么说，说得恰到好处，大家想办法。我觉得中国作为一个经济大国，躲在旁边是不行的，但是又不能冲上前线黑白分明，这也不行。弄得不好还是多掏腰包，但是也不是乱洒钱。最近我们有一个讨论，我就提出一个想法，这个想法也不是我的，在座从事欧洲的朋友大家知道，法国经济学家吉普鲁 80 年代曾经到我们这边来过，他写过一本书《亚洲的地中海》。地中海周边成为欧洲四五百年文明和经济社会发展的源泉，他说亚洲从白令海峡以下，西太平洋，包括韩国、日本、东南亚，当然是包括中国，包括俄国的远东，这一片难道不是亚洲的地中海吗？我觉得 RCEP 建立之后，俄国人落差很大，亚洲这边蓬蓬勃勃跟他完全

无关，作为一个大国他是很难看的。我们在这个情况下，怎么办呢？我们现在躲是躲不掉的。我觉得我们还是要采取更积极的一些政策。现在美国人一直压过来。我们要发挥中国之所长，我们之所长还是经济嘛，最主要的两个朋友，一个是韩国，一个是东盟，要拉住。澳大利亚看大选结果怎么样，还不知道。日本更是难说了。我们如果有一些新的设计，把这一块地方能够圈住，成为我们的一道屏障。我的意思是通过多边方式来减轻我们的压力，当然具体的操作会很多很多。

秦勇：我有两个问题问冯老师。第一个问题很小，普京今天在戈尔巴乔夫生日的时候去问候了。这个新闻出来以后，有人说，是不是因为俄罗斯战争打到现在，觉得没有办法收场，他是不是想要传递一个信号，想给自己找个台阶？第二个问题，你刚才讲到，西方制裁以后，俄罗斯内部支持率反而上升了。但是我们看到，乌克兰民族主义的反弹更大，导致它的抵抗更坚决。西方，像瑞典也宣布放弃中立地位。我想讲的是，是否普京的支持率，其实没有这么高，再加上长期制裁以后，经济能够支

持多长时间？

冯绍雷：第一个问题，你提到了戈尔巴乔夫和普京之间的相互关系。这两位领导，我都接触过，我觉得是满有趣的，戈尔巴乔夫对普京是有看法的，而是根深蒂固的。那天别人拉着我一起拍照，我太太也在旁边，戈尔巴乔夫就把我太太拉到当中，他讲一个笑话：女士一定要站在中间，就像当年列宁同志一定要站在中间一样。他跟我说，你们中国多好，经济搞得好，领导一轮一轮下来，政治上都有安排。意思是普京这个样子，他很受不了。所以他对普京的意见是很根深蒂固的。但是我发现，最近这几年普京在戈尔巴乔夫生日发贺电，我觉得这个大国的胸怀出来了。俄国人对老政治家、老艺术家的尊敬，我觉得还是做得不错的。大家是比较习惯的，不管政见如何，这种安排大家都能接受。关键是他如何重新安抚好这批精英。我们所谓的那些老朋友们，有这么几天不吭声了，这几天才重新出现。所以精英内部有想法是肯定的，2019年秋天我离开莫斯科，俄方的朋友跟我聊了很多，说了两句话。第一句话是说，我们担心的是 2024 以

后，因为 2024 肯定是一场国内的较量。第二句话是，请你们千万不要低估俄罗斯战斗民族的勇气。2019 年那时候和乌克兰处理危机已经没有希望了。我听到这个话，当时没有太注意，从长期来看现在这个话应验了。

第二个问题是我们到底怎么应对，包括西方中立国都是有立场的，是吧？我反过来讲，你看这个世界上，为什么还没有彻底闹翻，什么道理呢？除了我们多少对冷战以来三四十年和平生活的眷恋，同时有一些力量还在，什么力量呢？比如 2008 年的时候，俄罗斯和格鲁吉亚打起来之后，普京把我们请到车臣，车臣刚刚太平，我们都心有余悸，普京不管，当时他已经不是总统了，小梅哥当总统了。我们人不多，大概就是一桌人，有一个小型座谈会，他正好坐在我对面，中国和俄国总归要对好的嘛。普京说，“这场战争以后，我们非常希望得到朋友们的支持，但是非常遗憾，我们没有能够得到这种支持。当然，我们也理解，我们的朋友也要处理类似的一些问题。如果我们得不到这种支持，我们也不会抱怨。”这段话是什么意思，都很清楚

了，我们对格鲁吉亚和俄罗斯这场战争没有明确表态，而且整个上合组织国家不表态，就是几句官话，希望稳定、劝和促谈这样一些话。普京当然不高兴，而且他讲完这句话，眼睛就扫过来。我刚在记笔记，他讲完，我头抬起来，他的眼睛扫过来，中俄两个目光碰在一起，这种分量我印象非常深。我觉得他这个人呢，战略上有一套，这个人城府非常深，但是有些话他是会讲的。2008 年时，中国保持稳健，金砖国家，包括上合组织那些穷兄弟，都不吭声。2014 年克里米亚危机之后，我甚至专门写过一篇文章，题目就是“金砖中立”，印度、巴西都不说话。现在这个局面又出现了，瑞士已经公开宣布了，他是持有西方价值观的，所以要选边了。但是我们那些穷兄弟，中国、印度、巴西，包括阿根廷、墨西哥，公开宣布中立。这说明什么？我觉得多多少少是这股定力还在，希望不搅合到两边。我希望这样一种定力能够持续下去。

徐明棋：冯老师，这次冲突使欧洲方面发生了非常重要的改变，尤其是德国。德国原来和俄罗斯的关系是维持得比较好的，德国的精英们对俄罗斯

当初让德国统一，还是抱有感激之情。但这次追加 1 千亿欧元的军事开支，如果这个趋势这样下去，从中长期来看对俄欧关系会有什么样的影响？还有，德国这样的大国重新武装一定对北约的军事实力有所增强，你觉得对中国未来又有什么样的影响？

冯绍雷：对于欧俄关系，我当下的反应是几个方面。第一，我记得 2014 年大概是四五月份，我到德国去访问。2014 年 2 月，德国的议会，包括各个党团，几乎同时出现一个口径，所谓德国的 LEADER，德国人不仅要当欧洲的领袖，而且好象在世界上要发挥全球领导。当时我想，怎么突然出现这个事？我也问那些俄国老朋友，我说德国人在克里米亚问题上怎么表现得这么强硬，虽然做一点斡旋，但是态度很坚定，是什么道理？他就跟我讲了他的感受：冷战时期不用说，德国人是被压着的；冷战结束以后，相当长时期内也是听话的；但是现在不对了，德国人要跟我们拍桌子了。第二，默克下台之后，德国的政治方向如何选择可能是他们的大问题。一个外部的因素是法德的较量还

在。在欧洲战略上，德法两家既是朋友，也要一争高下，德国人一定要拿点干货出来，这次他抓住机会，希望有所动作。这是我当下的感受。

对中国的影响肯定是有。前两三年我们一直有一个想法，中国一带一路能够穿过俄罗斯和欧洲，中、俄、欧三大块至少可以互动吧。现在这个局面一来，这个正事就会受到极大的挑战，哪一天能够重新回到这个局面？得有一段时间，没有那么容易。

姚为群：我问一个问题，大家今天问的都是俄罗斯方面的问题，但是我们怎么来处理中国和乌克兰的问题？2013年，中乌签订了友好合作条约，而且中国也是布达佩斯协议的成员，保证乌克兰领土完整。整个舆论在讲乌克兰的寡头，那俄罗斯没有寡头吗？这些问题我们要怎么处理，我们不能忘记我们的航空母舰是谁给的，我们导弹是谁给的，我们发动机是谁给的。

冯绍雷：乌克兰的事情我们还是要保持官方立场。但是现在的确手段不多，这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我们有没有可能拉一个三边的场子，劝和促

谈，乌克兰和俄罗斯既然都是斯拉夫，你们都是兄弟，我们中国人做个东。2015年，法国前外长和总理曾经跟我透露过一件事，因为在瓦尔代会议上都是欧洲高官。他跟我说，我们在2014年克里米亚事件之后有一个动议，而且有相当一批欧洲政治家有这个动议，就是希望中国派出维和部队解决乌东问题。这不是我说的，是这样老资格对外交家政治家说的，当然我觉得完全不现实，他高估了这种可能性，今天都未必有这样的机会。我主张还是拉拉场子，劝和促谈。最近我又重新学习习主席的人类命运共同体，重新学习之后我发现一句非常关键的话，我们平时媒体上的宣传中都看不到，什么话呢？习主席强调说，今天已经不是一种制度推翻一种制度，一种文明取代另一种文明的时代了，这个话说得多好。

乔依德：你刚才讲的，我非常同意。这次和2014年克里米亚事件不一样，因为俄罗斯大举进攻了。中国要加大促使谈劝和的力度。我有个建议：如果俄军打不下来，普京日子也会难过，那个时候，中国能不能利用金砖国家出面做一个调解，给

普京有台阶下，他不愿意跟美国和西欧认输，但可能会给金砖国家面子。另外，我看到报纸上说现在要成立对乌克兰的人道主义基金，我觉得我们红十字会要给乌克兰捐钱。我们今天到此结束，大家再次以热烈的掌声感谢冯老师，谢谢大家的参与。

（以上内容根据录音整理，未经本人审阅）

俄乌冲突与国际金融变局研讨会

主办方

中国国际金融 30 人论坛

中国社科院国际研究学部

2022 年 4 月 2 日

王玉荣（主持人，中国国际金融 30 人论坛秘书长、清华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副主任）：俄罗斯这次的特别军事行动，将对世界产生重大影响。因此我们联合中国社科院国际研究学部，举办这次线上的中国国际 30 人论坛，一起来探讨俄乌冲突与国际金融变局。下面有请中国社科院国际研究学部的主任周弘研究员致辞，掌声有请。

周弘（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中国社科院国际研究学部主任）：大家好，很高兴能够在网上见面。当前我们进入一个越来越动荡的时期，一个是因为疫情，一个是因为这场战争，两方面的因素都给社会和世界带来了各式各样的不确定性。现在看来，

这场战争就像预测的那样，开始不断向各个领域溢出，大家在评估战争前景的时候，就不得不提到所有这些问题，从军事牵扯到能源，牵扯到金融，牵扯到各个领域，各种态势不仅没有削弱下来，而且加剧了。对关心国际事务的同行、同事来说，我们不仅关心战争与和平的问题，我们也关心战争与其他各个领域的相关性。有的时候，没有硝烟的真正的战争是在各个战线展开的，特别重要的就是在金融领域。最近，金融领域里的这些冲突越发明显，越发激烈了。从西方把俄罗斯踢出 SWIFT 以后，俄罗斯便开始利用它的能源作为硬通货进行反击。这里面外行看热闹，内行还是看门道。

我记得每一次世界发生重大变化或重大问题的时候，我们的余永定老师都能够就重大问题提出他的真知灼见，上一次我听了他的关于次贷危机的讲座深受启发。今天老余能够拨冗，为我们分享他对于战争中金融问题的真知灼见，我感到非常荣幸，我也不多讲了，就把时间交给老余。大家欢迎。

余永定（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学术委员会主席）：谢谢周弘。特别高兴能

够有机会和大家在网上见面，分享我自己最近一段研究的体会。跟大家交流之前，我想小小抱怨一声，希望有渠道的诸位能够转达一下。我们想了解外部世界，结果没有渠道了解外部世界，我拼命想找渠道，费尽心思，每天工作很长时间，但是网络问题让我感觉非常头疼，这个问题差不多提了 20 年了，希望有关部门至少给我们社会科学院研究外国政治经济的研究人员提供某种方便。否则我们很难了解世界，这是我想说的题外话。

前天，我在财经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比较长的文章，比较全面地谈了美国对俄罗斯实行金融制裁的具体内容和后果，以及我们中国从中可以吸收什么样的教训。我希望这篇文章已经转给大家了，我就不去重复文章的内容了。今天，我不揣冒昧，想谈几个细节性的东西，可能对大家能够有所帮助。

首先，我想谈一下“美国对俄罗斯的金融制裁及其警示作用”。关于制裁，我觉得可以分为三大类。

第一类就是把俄罗斯的主要金融机构特别是主要银行列入 SDN 名单（特别指定国民名单

Specially Designated National List)。列入 SDN 名单，意味着美国的公民和实体银行不得与列入名单的个人和实体有任何金融来往，即美国人持有的 SDN 名单上的个人和实体的资产被冻结。并且，如果我是俄罗斯人，我在美国的某个银行有存款，由于我已经被列入 SDN 名单，我就不能从美国银行中把我的存款提取出来，即我的资产被冻结了。

美国的制裁名单实际上分很多等级，还有一个等级叫做 CAPTA，也可以把它叫做“561”名单，列入“561”名单意味着什么？意味着美国金融机构不得为这些银行，就是俄罗斯的银行金融机构和个人开立代理行帐户，不得与之有任何业务往来。这个“561”名单不包括冻结资产的内容，制裁力度略低于 SDN 名单。

SDN 名单里有非常重要的内容，就是所谓的二级制裁，对中国来讲，应该非常警惕这个。它禁止非居民同 SDN 名单上的金融机构有任何往来，违反者将被限制或移出美国金融体系，并且也可能被列入到 SDN 名单，这美国的长臂管辖有关。这个问题中国实际上已经面对过，过去咱们的昆仑银

行还有农行，也一度遭受过这样一种威胁，由于时间关系，我不细说了。总而言之，制裁的第一大类，就是把俄罗斯主要的金融机构列入 SDN 名单、“561” 名单。

第二类，这点非常重要，是美国及其盟友把 7 家俄罗斯银行从 SWIFT 体系中移除。

第三类，是美国及其盟友宣布冻结俄罗斯央行外汇储备。俄罗斯央行拥有 6300 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它在西方国家中央银行或托管银行存放的是 3000 亿美元，这 3000 亿美元都被冻结了。至于以后怎么办，还要看。这里面需要注意的是什么？俄罗斯联邦储备银行和为能源贸易服务的大银行 Gazprombank，这两家银行并没有被移出 SWIFT，也并没有被列入 SDN 名单。这样，西方国家留了一个非常大的制裁缺口，使欧洲国家可以继续和俄罗斯进行石油和天然气交易，这两家金融机构可以为这些交易提供金融服务。这是美国制裁的一个非常大的漏洞，这个漏洞会引出很多其他问题。美国对俄罗斯的制裁是否能在较短时间内发挥重大效应，这是值得怀疑的。但是不管怎么说，这些制裁

给俄罗斯的金融活动造成了非常大的不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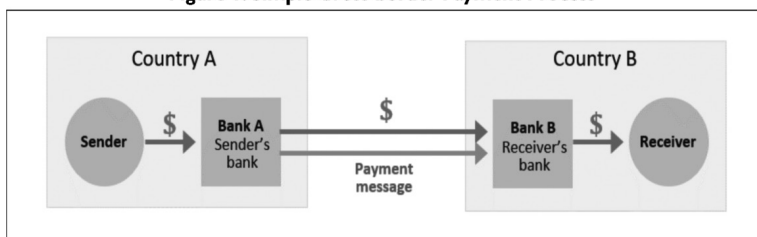
1. Specially Designated Nationals and Blocked Persons (SDN) List
2. Consolidated Sanctions List
3. Sectoral Sanctions Identifications List
4. Foreign Sanctions Evaders List
5. Non-SDN Palestinian Legislative Council List
6. Non-SDN Iranian Sanctions List
7. The List of Foreign Financial Institutions Subject to Part 561 (the "Part 561 List")

图 1：制裁名单类型

我简单列了一下制裁名单的类型（图 1），一共有 7 项，由于时间关系，我们不去讲了，但是对于每一类型名单的具体内容以及应该如何应对，我觉得研究工作者都应该进行研究。

第二个重要的做法，就是把 7 家俄罗斯银行从 SWIFT 体系中移除。于这个问题其实是非常专业的。前不久，王永利行长写过一篇文章介绍 SWIFT 的具体内容。我们所过去几年也长期跟踪这个问题。大致来看，要想在现有国际货币体系下进行金融活动，就不可避免地要进入到国际结算体系之中。这个国际结算要想能够进行，需要有一个报文体系。

Figure 1. Simple Cross-border Payment Process



Source: Figure created by CRS.

Note: This is a simplified depiction of the cross-border payment process.

图 2：跨境支付过程

美国国会的一个研究组画了一个简图（图 2）。如果汇款人在 A 国，从 A 国想汇款到 B 国，比如要汇到美国去，第一个圆圈就是汇款人，这人要到 A 国的银行中，请求该银行把 10 万美元汇到美国某个地方的银行，然后再给美国的收款人。这样一种信息需要通过报文系统，由银行 A 传到美国的银行 B，取款人把款取走后，银行 B 还要返回一个消息，告诉银行 A 这笔生意结束了。这是报文活动的大致内容。报文的具体内容是相当复杂的，银行 A 要告诉银行 B 这个钱要汇到哪里，在汇的过程中要经过哪些银行，因为钱不是直接转的，要经过很多中间环节，包括汇款有些什么需要交代的细节也要说清楚。就像我们过去打电话或打电报，要把汇款

的数量、目的、收款人，汇款等交代清楚。这些是通过非常标准化的模式，通过电传的方式实现的，就是利用这个 SWIFT 系统把从 A 银行转到 B 银行的信息讲清楚的。

我前几天得到一本材料，是介绍报文的具体内容，是相当复杂的、内容非常丰富的一个电报，都是标准化处理的。报文系统和金融往来结算还是不太一样的，图 3 就能说明通过这个系统转账结算的过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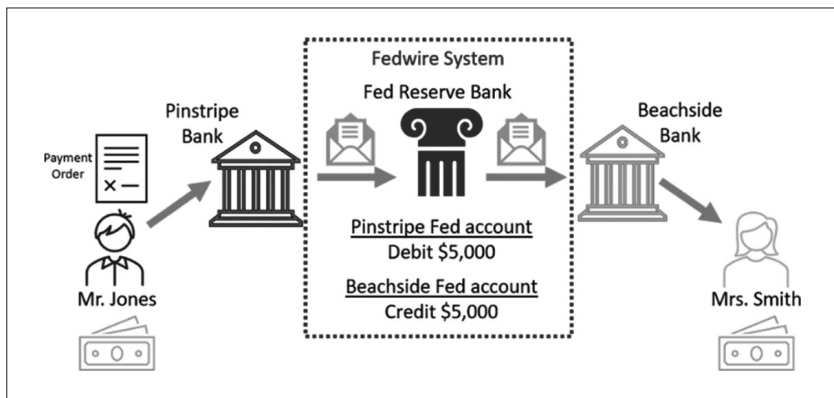


图 3：通过 Fedwire 的转账、结算过程

比如 Jones 先生想把钱汇给 Smith 小姐，那么 Jones 要到他的银行，把钱汇到这个银行里，并且请求银行款汇到另外一个银行，即史密斯小姐的银

行。这里面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美国联邦储备系统有 Pinstripe 银行的一个帐户，Beachside 银行在联储系统里也有一个账户，这样在大系统中就实现了转帐，就是画点的框子里的两个帐户在联储系统里通过联储帐户实现了转帐，Beachside 银行再把钱给 Smith 小姐。并不是这个银行直接把钱送到那个银行，而是要经过联储的结算系统把钱结清，然后才能到 Smith 小姐手里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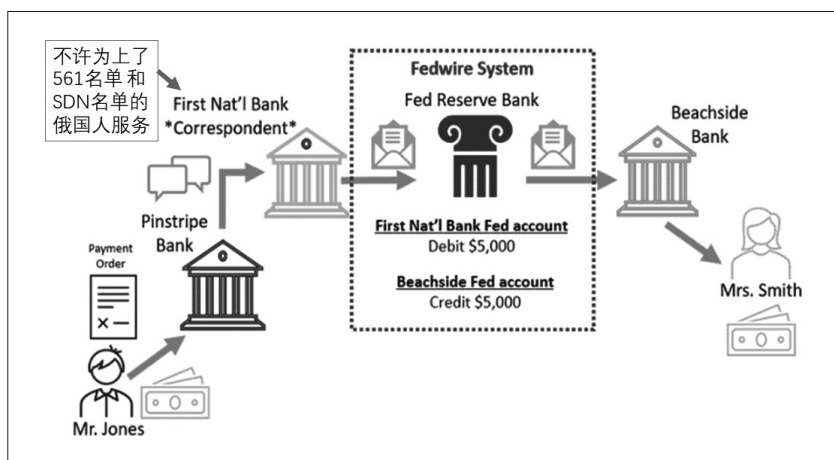


图 4：代理银行的作用

假设 Pinstripe 银行在美联储里没有帐户，Jones 先生就需要找一个在美联储有帐户的 First Nat'l Bank 做代理行。所谓上了“561”名单、SDN 名

单意味着什么？这个银行拒绝给你服务，你根本就没有办法进入到这个系统里，也没有办法把钱汇给 Smith 小姐，这是一个关键点。外国银行要通过一个在美联储的代理银行，才能实现资金在美联储系统中的转移。这个代理行在美联储有一个 Master Account，由它把钱转到 Beachside 银行，银行再把钱给 Smith 小姐，这里面多了一个环节，就是代理银行，所谓上名单就是不允许你用代理银行为你服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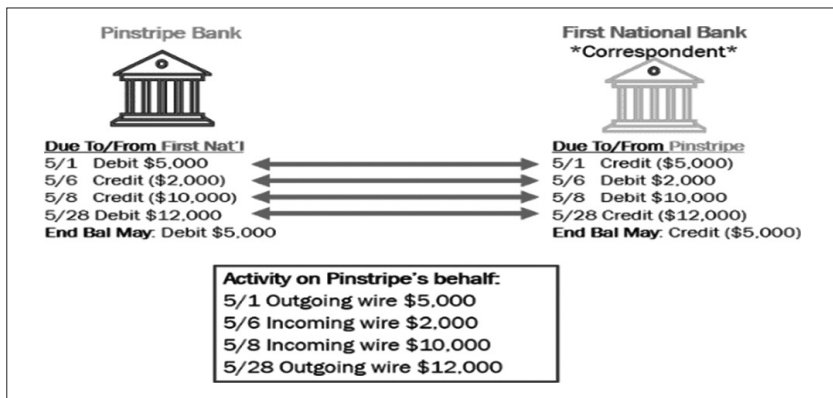


图 5：银行与代理银行之间的结算

刚才讲转帐是在美联储的 Master Account 之间的转移，那 Jones 去的 Pinstripe 银行跟代理银行有什么关系？Pinstripe 银行和代理银行最后怎么清算

呢？是这样的：Pinstripe 银行和代理银行有多笔业务往来，最后，比如到晚上，Pinstripe 银行跟代理银行进行一个轧差结算，整个这一天的交易就完成了。所以，完成一个交易有这么几个环节，第一个环节，要有报文系统，发出指令，这个交易到底是怎么回事；第二个环节，要做结算，资金要从不同的银行转来转去，最后清算，余额放在这里了。有的银行不做清算，算的是总帐。总之，帐目是非常清楚的。

SWIFT 系统是作为国家之间资金往来结算的一个报文系统，是一个国际结算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没有 SWIFT，这些资金的往来就很难进行，但也不是绝对不能进行。不用报文，通过电话的方式，通过其他方式，也不是不能实现资金的转移，但是成本是非常高的，是非常困难的。所以说，把俄罗斯银行从 SWIFT 中踢出去，使俄罗斯银行很难在国际金融往来中参与国际金融交易，这确实确实是对俄罗斯金融体系的一个非常沉重的打击，但是把它说成是一个核弹，这个谈不上。

第三个做法，我觉得对我们来讲可能是意义更

为重要的，就是冻结俄罗斯央行的外汇储备，这对国际金融体系造成了极为严重的冲击。任何国际货币体系，都必须回答三个基本问题。第一，选择什么货币作为本位，就是咱们讲的“锚”，什么东西都要盯住它，这是货币本位。第二，如何决定汇率。第三，如何管理资本的跨境流动。对于这三个问题的不同解决方案，就定义了不同的国际货币体系。

布雷顿森林体系之所以崩溃，是由于美国无法信守“一盎司黄金等于 35 美元”这样一个承诺。这个承诺一旦无法信守，整个布雷顿森林体系就坍塌了。我过去研究布雷顿森林体系时有一个困惑，在该体系有黄金作为支持的时候，由于大家不太相信美国能信守这样一个承诺，整个体系就乱了。但是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美元不再有任何黄金的支持了，怎么美元反倒稳定了？这是怎么回事呢？后来我意识到，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主要是大家不相信“一盎司黄金可以换 35 美元”这么一个承诺，但是对于美元的信任并没有崩溃。所以，后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基础是对美元的信任，所以也叫美元本

位。布雷顿森林体系是美元汇率本位，不是美元本位。在后布雷顿森林体系，大家对于美国作为债务人偿还债务的承诺是有信心的，有了这个，后布雷顿森林体系就可以运转了。

现在把俄罗斯中央银行的外汇储备冻结了，它的冲击力度就相当于 1971 年的尼克松冲击，它对于国际货币体系的冲击是极为巨大的。可以说，美国及其盟友冻结俄罗斯中央银行的措施，是继 1971 年尼克松冲击之后，国际金融体系最重要的标志性事件。国际货币体系是建立在国家信用基础上的，美国的行为彻底破坏了国际货币体系的国家信用基础。举个非常有意思的例子，19 世纪，俄罗斯曾经和英国、法国、土耳其打过一场克里米亚战争。在这场战争中，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情况是什么呢？交战双方互相买了国债，一边在打仗，一边该还钱还钱，该付息付息，因为他们认为金融上的信守承诺是更为重要的。两国交兵，不斩来使，有许多基本的国际准则是不可以破坏的。

如果外国中央银行的资产可以冻结，而且现在是冻结，以后可以是没收的。比如美国政府已经表

示了，要把扣押的阿富汗中央银行的外储用于赔偿 911 受难者家庭。现在美国也有人讲，要把扣押的俄罗斯中央银行的资产用于乌克兰重建。如果你这么做的话，那么在国际上就没有任何契约不可撕毁了。这应该说是国际货币体系非常严重的冲击，从观念上，冲击力度大于尼克松冲击。对于这点，我们国家的学者似乎看的比较淡，但是印度的学者反倒比较紧张，前印度中央银行行长拉詹在最近一篇文章中写到“在冻结了俄罗斯中央银行外汇储备之后，中国、印度和许多其他国家会为他们的外汇储备感觉担忧。如果有些国家决定冻结他们的资产，外汇储备就可能变得无法使用。”他还进一步指出，由于像欧洲和美元那样有流动性的储备货币屈指可数，许多政府将不得不对诸如公司跨境借贷之类的活动加以限制。一些国家将不得不考虑一起建设自己的报文系统，以替代 SWIFT。而这可能意味着全球支付体系的碎片化。实际上也是国际货币体系的一个非常根本性的变化。

在 2008-2009 年，由于次贷危机，周小川行长提出用 SDR 作为国际储备货币。联合国成立了国

际货币体系改革小组，我也参加了这个小组，当时大家讨论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避免由于美元大幅度贬值给国际货币体系造成的冲击。一个方案是 SDR 作为国际储备货币，另一种方案是货币多样化，比如美元、欧元、人民币作为国际储备货币，通过这种方法来稳定国际货币体系。

在美国及其盟国冻结了俄罗斯中央银行资产之后，刚才我说的这些解决方案可能都不能解决问题，大家可能会重新考虑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方向。印度前中央银行行长拉詹说：我们印度是民主国家，我们不会遭到美国的金融制裁，但是由于俄罗斯这种事情的发生，我们不得不考虑这些问题了。对于中国，到底有什么影响也不用多说了。

刚才我讲的是对国际货币体系的冲击问题。我现在讲一下外汇储备问题。我们为什么要外汇储备？在布雷顿森林体系，外汇储备是干什么用的？就是为了便利贸易，我要进行国际贸易，需要有流动性，这个流动性指的是每个国家都要手持一定数量的美元或流动性很强的美元资产。有了这样的资产，就可以保证贸易活动不会因为某种冲击而中

断。我在 1970 年代末期进入社科院，当时大家讨论的是外汇储备的规模要有多大。我记得当时讲的是三个月的进口，手中持有的流动性可以覆盖三个月，有人说是半年。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下，实际上并不太提外汇储备的概念。在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之初，美国通过资本项目逆差，像马歇尔计划这样一些操作，为国际货币体系提供流动性。但是几年之后，随着欧洲和日本经济的恢复，美国经常项目由顺差变成了逆差，这个时候美国就开始通过增加债务的方式来提供流动性。这时候你把美元理解成一个借条就行了，我从你这里进口了实物，但是我并没有相应的实物还给你，你也不跟我要实物，那好，你给我写个借条，这个借条就是具有流动性的外汇储备了。

法国一个著名经济学家鲁夫，是戴高乐的顾问，做了这么一个比喻：像我们这种国家，就好像是一个裁缝，美国就好像是我的顾客。我这个裁缝做了衣服，美国给我付了美元，把衣服拿走了。我马上又跟美国说，我会把你给我的这个钱再贷回给你，好从我这里再买衣服。如果我是这个顾客的

话，我当然不会反对那么做了，对不对？我把实物给你，你给我开个借条，再把借条还给你，作为一个贷款还给你，你再拿这个钱跟我买实物，这样就形成了“其他国家输出实际资源，美国输出借条”这样一种循环。

我在 1980 年代开始研究这个问题，看了一些书。我觉得直到 1990 年代初期，在国际金融领域中，大家都相信在后布雷顿森林体系下对于外汇的需求是减少的。为什么呢？因为布雷顿森林体系是固定汇率，还是需要动用一些外汇储备来维持汇率的稳定。在后布雷顿森林体系，根本就不需要一个固定的汇率，不需要干预外汇市场了，所以对外汇储备的需求是减少的，而且只要你国家有好的资信，你随时可以从国际货币市场上借到美元，不需要积累外汇储备。当时大家都信奉这一点。

这种理念到东南亚金融危机的时候，就彻底被颠覆了。对于东南亚金融危机，大家总结了一个经验教训：没有外汇储备，就不能维持汇率的稳定。如果我们不能维持汇率的稳定，汇率急剧贬值，这个国家的金融体系就会受到严重冲击，就会产生金

融危机，最后会产生实体经济的危机。所以东南亚国家，还有中国，接受了这样一个“经验教训”：我们必须要有尽可能多的外汇储备，使我们的汇率保持稳定，以避免金融危机，避免经济危机。但我认为这是错误的总结了经验教训。我们应该做的是：第一，练好内功，降低金融体系的脆弱性，例如，杠杆率不能太高、外债不能太多、不良债权要维持在低水平。第二，要让汇率具有尽可能大的灵活性，在浮动汇率制度下，原则上是不需要外汇储备的。第三，利用各种宏观经济政策工具，降低国际投机资金流动的规模。第四，在必要时实行严厉程度不等的资本管制。第五，加强区域货币合作。第六，发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全球金融安全网络”建设中的作用。总之，各个国家为了维护国际金融体系稳定而各自增加外汇储备的政策是一个方向性错误。

图 6 的第二列，讲的是在 2007 年大家认为一个国家应该有多少外汇储备，这个标准已经比过去提高很多了，比如外汇储备要覆盖 6 个多月的进口，国家的短期债务要覆盖 200% 等。当然这不是

正式的标准，但大家尽可能往这个方向去靠，这样的话，你的资信就提高了，就比较容易引入外资，同时你的中央银行稳定汇率的能力就加强了。从那之后，外汇储备就急剧增加了。到现在为止，各国的外汇储备总额大约是 12 万亿美元。

与这样一种情况相对应的，就是美国的净债务已经达到了 15 万亿美元。美国是世界上最富的国家，但是它也是世界上欠债最多的国家。美国之所以有 15 万亿美元的净债务而不发生金融危机，是因为其他国家要持有美元的借条，光是外汇储备就是 12 万亿左右。你对于外汇储备的需求越多，就

Reserve coverage of:	2007 as benchmark (2004-07)	Additional reserves needed over 5 years 1/	Additional reserves needed over 10 years 1/
Imports	6.1 months (5.5 months)	US\$709 billion (US\$482 billion)	US\$1.76 trillion (US\$1.42 trillion)
Short-term external debt	200 percent (165 percent)	US\$800 billion (US\$396 billion)	US\$1.88 trillion (US\$1.28 trillion)
Broad money	28.3 percent (26.6 percent)	US\$892 billion (US\$745 billion)	US\$2.05 trillion (US\$1.83 trillion)
Summary		US\$700 b - US\$900 b (US\$400 b - US\$750 b)	US\$1.8 tr - US\$2 tr (US\$1.3 tr - US\$1.8 tr)

图 6：亚洲金融危机后积累外储已非为了流动性



图 7：发展中国家成为鲁夫所说的裁缝

意味着你越愿意提供实体资源给美国。所以，尽管美国有 15 万亿美元的外债，但是美国能够维持美元的稳定，很多情况下甚至升值，保证美国经济不会受到冲击。一个月以前，在一次电视研讨会上，我问伯南克，你们有这么多的外债，担心不担心？他说我们不担心，因为我们根本就不需要给大家付多少利息，相反呢，我们是有投资收入的，所以我根本不愁我的外债还不起。之所以能够这样，就是因为美国利用国际储备货币的地位，利用这么一种

债权和债务的关系，使得大家自愿把钱送给美国，充分享受了美元霸权的好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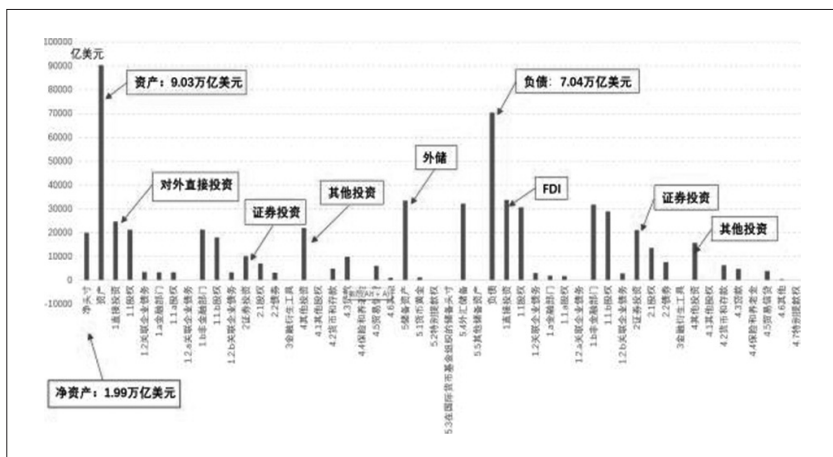


图 8：中国的海外资产与负债存量
（截至 2021 年 6 月底）

我们需要担心什么呢？我们所的一个小组，对这个问题已经研究了快 10 年了。第一，我们是有 2 万亿净债权的国家，但是我们的投资收入十几年来一直是负的（图 8）。我们最近查了一下，全球主要国家只有 3 个国家有这种情况，中国、俄罗斯、阿根廷。我们是净债权人，别人欠我 2 万亿美元，可是我们不收息，反而要给别人付息，当然主要是给美国付息。在我们目力所及的全球范围之内，只有

三个国家是这样的，其他两个国家为什么这样我们可以进一步研究，但是像中国这种状况，世界上可以说是绝无仅有的，这个问题技术性比较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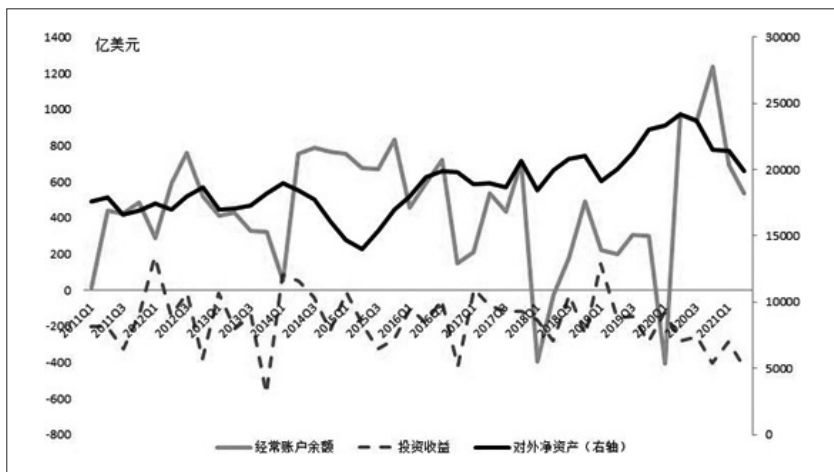


图 9：中国的经常项目顺差、海外净资产和投资收入

还有非常重要的一点，也谈论了五六年了（见图 9）。按照定义，一个国家的经常项顺差的累计，比如 10 年中每年都是经常项目顺差，把每年的经常项目顺差加在一起，就是这个时期的海外净资产。好比天天往银行存钱，存了一年，其中的本金是我这一年每天到银行存钱的钱数，当然这并不完全是相等，因为它存在价值重估，存在汇率变化等等情况。中国的问题是什么呢？我们每年都是有

三四千亿的经常项目顺差，累积了十几年，总额却没什么太大的变化。刚才提到的中国海外净资产，不包括外汇储备，海外净资产是2万亿，从2014年到今天都差不多是这个数。大家看图9中的黑线，前几年稍微涨了一点，后来又降下来，有段时间黑线没什么大的变化。但是按照正常情况，这条黑线应该是上去的，因为每年都几千亿的经常项目顺差。所以钱去哪里了？我们说不清楚，可能涉及国家机密。我们没有得到解释，不外乎是误差遗漏、价值重估、汇率变动，这些原因肯定是有影响的，但是这么大的缺口，我觉得是无法用那样一些白噪音加以解释。我们到目前为止还没有面临美国的金融制裁，还没有面临美国要扣押中国央行资产的威胁，在这个情况下自己的钱已经数不清楚了。我觉得这是我们必须要考虑的问题，先把家底摸清楚，这钱都去哪里了。

我们先回过头来，把家底摸清，然后根据俄罗斯的经验教训考虑我们海外资产的安全性问题。外汇储备是一种流动性，是为贸易顺利服务的。东南亚金融危机之后，它是为了中央银行能够干预外汇

市场，保持汇率稳定等等。现在情况已经发生了变化，在正常情况下，我们要担心什么呢？一般要担心我们的美元借条会贬值。换句话说，我现在手里拿了 3 万多亿美元外汇储备，这是美国给我们开的借条，这个借条会不会贬值？我认为在正常情况下，是需要担心的，因为美国现在的国债是 28 万亿美元，外债 15.4 万亿美元。在 2008 年到 2019 年之间，美国的广义货币由 8.2 万亿美元增加到目前的 18 万亿美元，增加了 114%，而它的 GDP 仅仅增加了 45%，两者的缺口为 67 个百分点。一般情况下，货币供应量增速应该等于名义 GDP 的增速，这就意味着通货膨胀会有 67 个百分点。我们担心美元由于种种原因会贬值，从而使我们遭到损失。

现在情况发生了变化。如果中美发生冲突，那么中国在美国存放的海外资产可以瞬间灰飞烟灭，唯一能够遏制美国这一行为的，就是美国自身也会遭受严重损失。中国和俄罗斯还不太一样，所以美国肯定是不敢轻易这么做。美国这么做，肯定会遭受严重损失，但是中国损失更大。现在外汇储备在很大程度上是抵押品，或者是人质。在改革开放初

期，我们需要相当多的外汇储备，这种外汇储备不单是为了支付我们的进口，支付外国直接投资的利息，而且是给人家送的一个“人质”，就是让人家放心，如果我们不遵守契约了，你可以把我的人质扣掉。因为这个“人质”对我们来讲是这么宝贵，你可以相信我不会做违约的事情。在改革开放初期，我们积攒外汇储备还有这么一个性质。现在，美国已经扣押了俄罗斯中央银行的外汇储备，这个“人质”的性质就非常清楚了。有意思的是什么呢，美国一些学者批评美国政府一下子就宣布冻结俄罗斯的金融资产。学者说，应该把这个作为一个人质来威胁俄罗斯，让俄罗斯不敢进攻乌克兰，但是实际上俄罗斯已经进攻乌克兰了，再冻结俄罗斯的外汇储备，这只是一种惩罚措施，没有发挥预防的作用。实际上，我觉得外汇储备已经不能够从纯粹的经济和金融的角度来看了，必须从地缘政治的角度来看。美国到底敢不敢扣押中国的外汇储备？这个问题需要由国际政治学者，地缘政治专家来回答。如果我们面临这种危险，存在着这种可能性，那么怎么办？这又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技术性问题。谢谢大家。

王玉荣：感谢余老师的精彩演讲。下面的环节，我们就请乔依德秘书长来主持。

乔依德（主持人，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副会长兼秘书长，中国国际金融 30 人论坛执行理事）：首先非常感谢老余精彩的演讲，他的演讲延续他一贯的风格，非常全面，条理清楚，一些细节问题扣的比较到位，给了我们很多启发。正如他最后所说，这个问题不单单是一个纯粹的金融或经济问题，也涉及到地缘政治、国际关系等方面。接下来，我们安排了多位发言嘉宾，他们是来自国际关系、地缘政治、国际经济、金融等领域的专家。大家可以对余老师的发言做点评，也可以讲自己的想法，也可以提出问题。下面先由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刘延春老师发言。

刘延春（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教授）：谢谢乔老师。刚才聆听了余老师精彩的演讲，获益颇多。的确，如何从金融的技术环节去真正认识俄乌冲突对于格局的冲击，对于我们研究经济、金融的人来说，需要有一个整体的认识。关于俄乌冲突对于世界经济格局的冲击到底是一种什么性质，我觉

得我们先要有一个界定，然后才是对一些细节性问题进行重点的技术性的研讨，这样可能对于我们把握未来的走向以及对一些战略定位上的看法会有一些启示。

目前很多人都谈到俄乌冲突在开启一个新纪元，但是我总认为这样的一些判断到底有没有一些核心数据的支持，这可能需要我们进行深度研究的。我想先提供几个层面的数据。

第一个数据，就是从能源危机的角度来看，俄乌战争到底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作用。我们可以把俄乌冲突与 1973 年的中东战争、1978 年的伊朗革命以及 1990 年的海湾战争进行一些比较。我们就会看到，第一个变化就是油价，在 1973 年的中东战争中，全球石油价格从 3 美元飙升至 10.6 美元一桶，上涨幅度是 350%；1978 年伊朗革命，石油价格从 13 美元一桶飙升到 34 美元一桶，上涨幅度是 262%；1990 年海湾战争，油价差不多从 22 美元一桶上升到 41 美元一桶，上涨幅度是 188%。战争对于能源的确是会带来大幅度的变化。这一次俄乌冲突，从 2 月 24 日到现在，2 月 25 日的布伦特石油

油价是每桶 91 美元，中间最高曾经上涨到每桶 130 美元，然后就一直回落，刚刚我查的数据是每桶 99.3 美元。最高的涨幅也只到每桶 142.9 美元，如果按一个月期来算，上涨幅度只有 10%。从能源冲击来看，由于这些年全球进行了绿色革命和新能源革命，能源的地缘政治实际上已经发生革命性的变化。因此，俄乌战争带来的对世界整体能源的冲击与我们传统意义上战争所带来的这种冲击不是一个量级的。这是我们可以看到第一组数据。

第二组数据，是关于经济衰退幅度。我们可以看到，1973 年中东战争的确给发达国家的经济带来了致命的冲击，比如美国 GDP 增长率从 1973 年的 5.6% 下降到 1974、1975 年的 0.5%，下降了 5.1 个百分点；日本的 GDP 下降得更猛，在第一次能源危机期间，从 8.03% 下降到负增长 1.23%，下降了 9.26 个百分点。1978 年经济衰退幅度也是很明显的，比如美国 GDP 增长率从 5.5% 一直下降，1980 年曾经出现了罕见的负 0.3% 的增长；1979 年日本从 5.48% 的 GDP 增长率下降到 1980 的 2.82%。但是，1990 年战争所带来的冲击明显有所缓和。这

一次俄乌战争对于全球经济，特别是对于主要经济体的影响到底会怎么样？很多团队在做研究，率先公布研究成果的是联合国贸发会，另外是英国的几个团队。目前看来，全球受俄乌战争影响，经济增长整体上可能会有一个百分点的下降，也就是原来的预期从 3.6% 下调到 2.6%，美国从 3.0% 下调到 2.4%，中国从 5.7% 下调到 4.8%，印度从 6.7% 下调到 4.6%，欧元从 3.4% 下调到 1.7%，俄国从 2.3% 下调到负 7.3%。俄乌冲突对世界的冲击当然是一个大事件，但是与历史上的事件相比，是不是开创性的？很明显，结论不是。对世界格局冲击，是不是很明显？结论是肯定的，对于欧洲板块的冲击尤为明显，但是对于美国、日本以及中国，实际上并不能说非常明显。

从经济角度来看，俄乌战争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吗？世界发生了趋势性或拐点性的变化吗？或者说，传统的美、中、欧这样一个世界经济格局是不是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或者发生了拐点性的趋势变化？我想结论是否定的。因为目前来看，受到俄乌战争影响最大的是欧洲板块。2010 年以来，中

国、欧洲和美国在经济版图上基本形成了三足鼎立，目前这三大块的比重越来越接近。美国目前占全球 GDP 的 25% 左右，中国占 18% 左右，2021 年中国的 GDP 为 17.73 万亿美元，已经超过了欧元区 GDP17 万亿美元的 水平。这里面加速变化的是 什么？是欧洲的持续衰落。欧洲从上世纪末构建欧元区，特别是 2000 年以后，整个欧洲占世界的比重呈现持续回落的趋势，俄乌战争使欧洲的经济加速衰退。这个加速衰退马上迎来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中美两个大的板块之间的冲突会上升到更加白热化的状况，也就是说，三强很可能向两强进行一些演变，这是我们可能看到的趋势。

另一个就是俄罗斯可能会加速衰败，这对于世界经济格局会有根本性的影响吗？没有。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俄罗斯特别是前苏联占世界经济比重最高曾经达到 20% 的水平，但是后来持续下降，到 1991 年苏联解体的时候，俄罗斯占世界经济的比重约为 4%，目前只有 1.8%-1.9% 的水平。我们可以认为，未来它的水平可能会持续回落，可能在 1.5% 左右的水平。它的衰败是不是意味着经济格

局的变化呢？我觉得没有，当然在政治和军事上的格局另当别论。

再一个很重要的考虑，就是大宗商品价格是不是在这一次冲击期间产生格局性的变化？我认为也没有。同样，国际收支体系是不是会面临一个新纪元？在俄罗斯去美元化的过程中，是不是会全面开启了去美元的进程，还是美元支付体系得到一个提升？这是我们要考虑的一个事情。现在美国智库界，对于未来的一些构想，我们学界研究的一些方向可能与不完全一致。美国对于俄罗斯的各种制裁是不是新的，是不是一种格局性的新变化？我认为美国这样的制裁在历史上已经使用过多次，特别是将俄罗斯的银行部分驱逐出 SWIFT、部分冻结其外汇储备，原来在伊朗身上已经全面上演过了。只是说，由于俄罗斯的这种战略地位，大家清醒认识到，我们可能要更加关注美国这种金融霸权体系带来的影响。我记得在 2018 年 -2019 年中美贸易冲突刚刚出现的时候，当时乔老师和余老师都讨论过美国会不会对中国实行金融制裁，特别是将中国驱逐出 SWIFT，冻结我们的资产。这个问题非常重

要，如果这样的情况真的发生了，我认为，这有可能是新纪元的到来。因为伊朗占整个世界经济的比重现在不足 1%，俄罗斯的比重是 1.8%，美国对它们实施的一些举措，实际上是其惯用的方法，没有对后布雷顿森林体系产生根本的变化。很多人也谈到，联合国这一个体系也出现了一些根本性的变化。我觉得这可能需要我们从经济数据、经济格局来进行更深入的研讨。

我得出的结论，很重要的一个就是，俄乌战争可能是百年未有的大变局的一个插曲，它可能加速未来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演变的趋势，但是它并没有产生新纪元的战略性意义。我们在分析俄乌冲突上，可能要首先把握它的性质，然后再在技术层面展开研讨，这就是我的观点，谢谢大家。

乔依德：非常感谢刘延春老师，他的观点非常清楚，就是说这场战争可能会导致欧元区以及俄罗斯经济地位的下降，可能会导致今后中美冲突加剧，但这只是全球百年大变局的一个插曲，未必构成拐点性或全球性的变化。他的观点非常鲜明，值得我们进一步去考虑。下面一位发言者是原国防大

学战略研究所原所长杨毅将军，下面我们欢迎杨将军发言。

杨毅（国防大学战略研究所原所长、少将）：谢谢乔老师，刚才听了永定同志和延春老师的发言，深受启发。永定老师跟我们普及了金融知识，让我这个金融小白慢慢从幼儿园进入了小学一年级，受益匪浅。刚才延春同志谈的观点，我基本同意。这次俄乌冲突应该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一个插曲，根本的方向不会变。我觉得，从地缘政治角度来讲，这次受冲击最大的是欧洲，但是不能低估这次俄乌冲突对全球范围的影响，无论是政治、经济、金融还是其他各个方面，我们都不可低估。

今天的嘉宾是来自各个领域的专家，永定同志和宇燕同志是社科院世经政所的前任所长和现任的所长，他们两个都是顶级的经济专家。政治和经济实际上是密不可分的，经济是基础，政治又反过来对经济产生作用。从某种意义上讲，俄乌冲突对国际政治影响是非常大的，而且我们需要考虑的不单单是俄美关系、俄乌关系，我们也需要特别关注一些中等大国，比如德国和日本的动向，包括土耳

其也值得我们关注，因为它们对我们国家安全影响很大。

刚才延春老师谈到经济上的变化，我同意他的观点。从全球来讲，我个人认为，国际政治或国际格局中的各种因素，包括政治和经济的二元化结构并没有发生结构性的变化，也就是说，经济全球化和政治安全的集团化趋势没有改变。当然，俄乌冲突对全球化产生了副作用，有很多国家在考虑自己搞小圈子，美国联合韩国、日本和我们国家的台湾地区，在搞半导体的小团体，想把中国排除在外。但是总的来讲，资本是随着利润走的，所以经济全球化的趋势不会变，可能会出现停顿，或者出现一些小的拐弯，但是整体大的趋势不会变。此外，这次俄乌冲突使得政治、安全、意识形态方面的集团化加强了。关于这次俄乌冲突对我们国家的金融会造成哪些影响？余永定老师谈得非常好，值得我们防患于未然。有一点我也感到比较担心，就是我们的钱到哪里去了？我觉得这个问题值得我们关注。

关于俄乌冲突对中国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我认为总的来说，我们既要有忧患意识，但也不要太

担忧。这次俄罗斯和美国的冲突根本点实际是在北约东扩，我认为中短期内俄罗斯是困难的，但是从长远来讲，俄罗斯是有收获的，最起码保住了自己的安全边界，北约不再东扩。所以从长远来讲，俄罗斯并不完全就是输家，这点我们要看到。对中国来讲，具有警示性，让我们提前知道未来可能面临哪些威胁、哪些挑战，我们会提前做功课。无论是在金融、经济还是科技上，我们可以防患于未然，包括从制造业大国转型到制造业强国，对我们加快解决科技短板、卡脖子的技术问题，对于促进金融安全、人民币国际化等方面，我觉得反而是一个好事。

实际上，将来真正对我们威胁最大的还是美国。最大的爆发点、引爆点还是台湾问题。东海问题不太大，中国和日本都是会把握住的。关于南海问题，现在美国想挑事，但是主要的争议国，比如越南和菲律宾，现在和中国的关系比较稳定，南海行为准则我们谈的也不错，南海方面现在比较稳定。作为军人来讲，台海问题我们一定要时刻准备。为什么我比较有信心，因为美国也不想因为台

海问题和中国全面开战。这对我们来讲是核心利益，我们没有任何退路，而且中美双方各自的红线都很清楚。总的来讲，我个人觉得，从这次俄乌冲突中得出来的启示是，我们要防患于未然，早做准备，这样我们将来才不会出大的问题，谢谢大家。

乔依德：非常感谢杨教授，发言虽然很简短，但是观点很清晰，强调俄乌战争对全球的冲击不可低估，提到了一些国家的动向，对台湾问题也提了自己的看法。非常感谢。

下面一位发言者是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副院长、俄罗斯中央研究中心主任冯玉军教授，请冯老师发言。

冯玉军（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副院长、俄罗斯中亚研究中心主任、教授）：谢谢乔老师，谢谢会议的邀请。刚刚听了几位专家的发言，很受启发，我把自己的想法和大家分享一下。

第一，俄乌战争的起源。

这场战争不是一个偶然的事件，更大程度上是俄罗斯从 2008 年以来一直推进的一个大战略，就是要借助国际上的乱局来恢复它在“后苏联空间”

的主导权，甚至是实现恢复小俄罗斯帝国的梦想。就战争的起因和性质而言，相关方有着迥然不同的叙事。俄罗斯强调，北约东扩和乌克兰谋求“入约”是迫使其对乌克兰实施“特别军事行动”的根本原因；而联合国大会特别会议上有 141 个国家视俄军事行动是对乌克兰的肆意侵略。但无论事件的起因如何，俄对乌开战违背了联合国宪章的基本原则、违背了俄乌两国曾经签署的所有双边关系条约，违背了为换取乌克兰在苏联解体后交出核武器成为无核国家并获得安全保障而签署的《布达佩斯协定》。

之所以发生这场战争，主要有两个层面的因素。

从历史上来看，俄罗斯与生俱来的不安全感，谋求缓冲地带的追求和普京上台以来为苏联解体复仇的冲动，是发动这场战争的历史上的根本性原因。

从现实角度来看，2007 年到 2008 年普京的国际战略观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他认为俄罗斯经过了几年的恢复性增长已经重新崛起，而美国遭遇了

全球金融危机、已经不可遏制地衰落。而近年全球疫情蔓延更让俄罗斯认为世界秩序加速碎片化，它可以利用“无规则游戏”加速在后苏联空间恢复主导权、重建小俄罗斯帝国。

正是在此背景之下，相继出现了 2008 年的俄格战争、2014 年的克里米亚危机和乌东地区冲突、2021 年俄白联盟国家的全方位推进、俄借美国撤军阿富汗在中亚安全影响力上升以及 2022 年 1 月的哈萨克斯坦事变。由此可以看到，俄对乌发动军事行动绝非孤立事件，而是俄罗斯谋求重建帝国战略的重要一环。

俄罗斯要达到什么样的目的？

第一，是以战争手段迫使乌克兰回到俄罗斯为其规定的战略轨道上来。

第二，通过去年秋天在俄乌边界陈兵近二十万，策应俄在后苏联空间的其他地缘政治活动，包括进一步夯实对白俄罗斯的控制以及今年 1 月份发生的哈萨克斯坦事变。

第三个目标，就是逼迫美国和欧洲改变冷战以后的欧洲安全秩序和安全格局。

第四，就是要通过不断制造地缘政治紧张局势，搅动国际大宗商品、控制和垄断原苏联地区的重要战略资源，对冲新能源革命、新工业革命和全球能源转型对俄罗斯所带来的全方位挑战。

第二，俄乌战争的前景。

现在战争已经打了一个多月，未来会向哪一个方向去？我个人认为，原来俄罗斯在乌克兰有高、中、低三个方案。

高案是全部拿下乌克兰，把乌克兰重新并入俄罗斯版图。

中案是隔江而治，沿着第聂伯河把整个东乌克兰吃到自己嘴里。

低案是夺取顿巴斯，包括扎波罗热和赫尔松这些与克里米亚半岛相近的乌克兰领土，以上保障克里米亚半岛的安全。

现在看来，它的这三个目标都难以完全实现。现在俄罗斯在乌克兰战争中的最终目标和现场手段选择，很大程度上是依据形势变化和对手反应，随时进行调整。

影响这场俄乌战争最终结局的有四个因素。

第一是乌克兰的抵抗。与 2014 年克里米亚危机迥然不同，这次乌克兰的抵抗是非常顽强的。

第二是俄罗斯的实力。就俄乌两国比较而言，俄罗斯对乌克兰有压倒性的优势。但这场战争绝对不是俄乌两国之间的战争，在乌克兰背后站着很多国家。在这种情况下，俄罗斯的综合国力就暴露出了很多短板。

第三是俄罗斯国内的民意。尽管普京政府施加了高压措施，但是俄罗斯国内很多城市还是爆发了反战游行，俄罗斯国内实际上也是暗流涌动。

第四是国际社会特别是西方的反应。他们一方面向乌克兰提供了政治、道义、经济和军事上的支持，另一方面也向俄罗斯施加了前所未有的制裁。

在这种情况下，这场战争边打边谈，俄乌之间已经进行了五轮直接磋商，但是短期内不可能达成最终成果。因为俄乌双方在关键性的领土问题上，立场是完全相悖的。未来的结局，有可能是在双方都打不下去的情况下，签署一个停火协议。但是就整个战场局势和俄乌之间的矛盾来看，很难在较短时间内签署最终的和平协议。

第三，俄乌战争的战略影响。

目前，俄罗斯开始收缩战线，力图在顿巴斯地区有所斩获。但无论最终战局如何，俄罗斯都已经遭遇到了始料未及的困难，其国际形象进一步受损，国际环境大幅恶化，经济发展困难重重，国内政治也存在诸多变数。

这场战争也体现了俄罗斯在四个方面与世界发展和时代变化的落差。

第一，在战争方式上，俄罗斯打的还是一场传统的机械化战争，而乌克兰打的是在高科技条件下的去中心化、扁平化的战争。俄罗斯不仅未能掌握压倒性优势，反而受到了不小的重创。

第二，在国家实力层面，如果借用苏珊·斯特兰奇结构性权力的概念，俄罗斯现在除了安全、特别是战略核力量之外，在生产、金融 and 知识方面都存在诸多短板。

第三，是俄罗斯战略文化底层逻辑方面存在的问题。至到今天，俄罗斯战略文化最关注的仍然是领土扩张和自然资源垄断。但是，今天的大国战略竞争，是集中于科技、金融、全球治理体系的塑造

能力和管理能力方面的。而俄罗斯在这些方面的能力基本上是相对薄弱的。

第四，这场战争体现了俄罗斯在思维方式上的落差。最近国内很多人特别关心所谓普京的“国师”杜金的思想。实际上，杜金并非国师，但他的思想还是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俄罗斯人的思维方式。杜金的思想，其实是俄国弥赛亚（救世）思想、欧亚主义思想、斯拉夫文明（种族）优越论、俄国例外论、帝国主义思想和德国豪斯霍弗地缘政治学中的“生存空间论”等各种陈腐学说的大杂烩。这种思想在整个俄罗斯社会的蔓延，其实导致了整个国家落后于时代的发展，最终导致了发动这场战争，让俄罗斯国家发展进入了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深水区”。

战争发生之后，美欧国家甚至新加坡、瑞士等国都对俄罗斯施加以前所未有的严厉制裁，主要体现在几个方面。

第一是政治上的孤立。无论是联合国大会特别会议上 141 个国家的齐声反对，还是把俄罗斯踢出欧洲委员会，都体现了俄罗斯在政治上遭受了很大

程度的孤立。与此同时，欧美对普京和俄罗斯的官员、寡头和个人进行重大的制裁。

第二是国家层面施加的经济制裁，包括限制融资、把俄罗斯多家银行踢出 SWIFT、在高科技领域的出口管制、取消俄罗斯最惠国待遇等。特别是能源禁运，我觉得完全出乎俄罗斯决策层在战前的预判，同时也会给俄罗斯带来重创。

第三是除了国家层面对俄罗斯的制裁之外，有 600 多家跨国公司也对俄施加了制裁，纷纷从俄罗斯撤资或者停止对俄罗斯市场提供服务。这些公司包括 BP、埃克森美孚等大型油气公司（BP 从俄撤资不惜损失 250 亿美元），微软、英特尔、FACEBOOK 等大型科技公司，VISA 卡、万世达卡、ApplePay 等金融服务公司，还包括可口可乐、百事可乐、肯德基、麦当劳这些提供日常服务的公司。这意味着，孤立一个国家的行动，第一次超越了民族国家，而将重要角色留给了大型私人资本。这些跨国公司对于俄罗斯的制裁，对俄罗斯带来的打击，一点不比西方世界从国家层面对其施加的制裁小。这是一个特别值得关注的现象。

这场俄乌战争带来了许多全球性的影响，某种程度上讲，其重要的意义超过了 911，可以说是冷战后世界发展的一道分水岭。冷战结束之后形成的国际秩序，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并且正在进行非常迅速而又深刻的重组。

对俄罗斯而言，这场战争将是其国家发展的一个历史性节点。回顾俄罗斯历史，每一场战争的失败都会导致其国家发展的重大转折。可以说大国雄心和实力不足之间的落差，一直是影响俄罗斯发展的关键性因素。从 1856 年的克里米亚战争，1905 年的日俄战争，包括第次世界大战和阿富汗战争，都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

当下，俄罗斯国内实际上也是暗流涌动。开战以来，已经有 20 万俄罗斯财富精英和知识精英离开祖国。如果加上从 2000 年到 2018 年已经流失的 160 万到 200 万精英，这将对俄罗斯形成重大的损失。如果不尽快结束战事，在受到政治孤立和经济制裁的情况下，未来相当长时段内俄罗斯在国际政治和世界经济体系中的地位会呈现下降趋势，会被进一步被边缘化。这场战争将把俄罗斯引向什么方

向，又会对国际社会的整个格局、世界秩序，包括中国的安全和发展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值得我们深入研究。

从乌克兰来看，乌克兰受到了沉重的打击，战火让很多城市沦为废墟，300多万乌克兰人跑到国外成为难民，战争最终可能会让上千万乌克兰人沦为难民。但是在这场战争之后，乌克兰会在国际社会的支持下，进入一个的战后重建阶段。曾经影响乌克兰政治构建的地区间、民族间裂痕将在战争之后在很大程度上得以弥合。乌克兰公民，无论是乌克兰族、俄罗斯族、犹太人、克里米亚鞑靼人，对乌克兰的国家认同都会迅速上升。可以说，经过这场战争，乌克兰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实现浴火重生。战后，乌克兰加入欧盟将成为一个大概率事件。尽管无法加入北约，但乌克兰将在政治、经济、文化领域融入欧洲一体化进程。

就俄乌关系而言，两国之间曾经拥有的剪不断、理还乱的复杂关系，在战后终于要终结了。正如赫鲁晓夫的孙女近期在接受采访时所说：“现在乌克兰绝对是乌克兰，而且乌克兰现在作为一个国

家，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强大。普京说西方正在让乌克兰反俄，但事实上，他在让乌克兰反俄方面所做的努力比美国的任何宣传都要多，因为你不可能用炸弹让一个国家爱上你。”

从欧洲层面看，欧洲在这场战争的警醒之下，变得更加团结。北约也摆脱了马克龙所说的“脑死亡”状态，美国在跨大西洋安全体系的地位进一步上升，整个西方联盟的团结度和协调性进一步增强。

在全球安全领域，很多国家认为，2014年克里米亚危机后俄罗斯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在安理会的表现，让安理会的效能大打折扣。安理会作为一个二战后对国际安全和地区安全负有重大责任的机构，引起了很多国家的质疑。俄乌战争之后，以雅尔塔协定为基础的二战后全球安全治理格局，有可能会经历一个非常重大的变化。联合国包括安理会的改革，都有可能会加速推进。

在全球经济领域，全球化进一步发生分裂。在世界经济领域，“去俄化”进程正在加紧推进。无论在制造业领域、金融领域，还是在能源领域，与

俄罗斯相关的供应链正在加紧断裂和重塑。在中美贸易战和俄乌战争的影响下，前几年就已经开始的一系列双边或小多边贸易和投资新规则和新机制，包括美加墨新自贸协定、美日自贸协定、日本欧洲自贸协定等，会进一步加速推进。未来，不排除出现以西方发达国家为主，相当一部分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共同参与，内部实现零关税、零壁垒、零补贴的高度自由化的大市场。在这个重大的历史关节点，中国将处于一个什么样的位置，值得我们深入思考。

我就说到这里，谢谢。

乔依德：谢谢。他提出了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对于俄罗斯发动这次战争的后果，我们不应该低估。在战争发生以前，很多学术界都估计不足，这个提醒是非常重要的。下面有请李振华院长发言，他是蚂蚁集团研究院院长，欢迎李院长。

李振华（蚂蚁集团研究院院长）：我简单补充一点金融市场的动静。余永定老师已经把俄乌战争中对俄罗斯的金融制裁概括得很全面了。我想补充以下几点，一个是，西方国家除了切断 SWIFT 报

文系统之外，还有一些做法超乎大家事前的设想。SWIFT 主要还是金融机构间的资金结算清算信息传递。现在还有 VISA、Master 和运通停止了对俄罗斯的零售银行卡的服务。Google Pay、Paypal 是在俄罗斯境内提供零售支付服务的，这一次也响应西方国家对俄罗斯的制裁，停止了在俄罗斯境内的零售支付，一些数字汇款公司也停止了俄罗斯的汇款业务。另外，美国财政部还向几家数字货币交易所发了指令，要求禁止使用数字货币和加密资产对俄罗斯人进行交易。BI 和 FTX 没有怎么搭理这事，他们只是说，在清算制裁名单上的人禁止提供服务，没有在这个名单上就不禁止。但是美国财政部对这个事非常认真，是要全面封锁对俄罗斯的资金服务。我想，他们会继续对这些数字货币交易所施压。可以看出，美国对俄罗斯的金融制裁是全方位的。美元的清算是走 CHIPS 系统，还有一个是跨境报文，这些都被禁了。在零售领域内，都是禁的。这也给我们一点启示，在这个情况下，中国是比较幸运的。我们整个结算系统做得比较好，银行间当然不用说了，跨境方面我们有人民币的清算系

统，零售清算有银联。零售支付主要是云闪付、支付宝、微信。相比俄罗斯，我们的央行在坚持对外开放的过程中，特别是在支付清算系统的开放当中，我们的部署是比较完整的。至少在遇到危机的时候，中国不像俄罗斯的支付清算系统那样脆弱。

这一次对于俄罗斯的零售支付系统的制裁，会给全球带来一些比较大的混乱，对于很多国家开放支付系统产生非常严重的影响。目前，在全球零售支付这个领域内，基本上就是中美公司在全球跑马圈地。对于这些事件，我思考了这么几点。第一点，中国过去清算系统有比较不错的做法。我们未来继续加强对外交往的时候，需要进一步摆脱对目前这种金融系统的依赖。对于跨境清算，要更多地使用人民币清算，这也是比较紧迫性的问题，因为目前的交易量还非常小。第二点，我们目前对境外银行卡组织是开放的，目前 Master 卡已经拿到了跨境银行卡清算的牌照，VISA 也在申请。现在银联可以做银行卡的跨境清算，目前也跟外边做了一些试点。我觉得可以加快开放，鼓励更多零售跨境的清算。最后，电子钱包是非常重要的领域，也是零

售支付清算的一个新的替代品，这，也需要进一步鼓励布局和发展。我就讲到这里。

乔依德：下面，有请高玉生大使发言，他原来是中国驻乌克兰大使。

高玉生（中国驻乌克兰前大使）：各位老师，各位朋友，中午好。我主要讲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俄乌战争，至少是冷战结束以来最重要的事件，它已经改变了我们现在的世界，一个新的世界秩序正向我们走来。

俄罗斯在这场战争中，可以说已经失败了。这个失败不是从战场的具体情况来定义的，现在对于俄乌双方来说，谁在战场上多占一点地盘，多消灭一点敌人，多打掉几架飞机，多击毁几辆坦克，已经没有大的意义，我们要从大的方面来看这个问题。我们说俄罗斯已经失败了，是从以下几个大的方面，甚至是趋势性的方面来看的。

第一，俄罗斯远没有达到自己预定的目标，也没有实现自己预定的计划。所谓的闪电战已经完全落空了。对俄罗斯来说，只要没有快速达到目标，使战争拖下去，本身就是失败了。因为这场战争，

对俄罗斯在政治上、军事上、经济上、财政上，都是一个奢侈品，承担不起。俄罗斯的目标是要全面掌控乌克兰，从北东南三面进兵，而且准备在基辅空降大量的空降兵这种安排来看，是想尽快拿下基辅，迅速掌控全局，在基辅扶持一个亲俄政权，这个目标现在完全落空了。

第二，这场战争开启了俄罗斯走向新的更大衰败的进程。现在已经开始了，在进展上还要观察。但是，这个进程的开始是毫无疑问的，而且可能会比较快。

第三，俄罗斯在经济、政治、外交、信息、情报等各方面都遭到了重大失败，西方空前严厉的制裁使它处于空前的困难之中，这使得俄罗斯正在开始离开国际舞台的中心，走向边缘化。同时，俄罗斯开始从一个世界级大国，向二流三流国家的方向演变，而且这个进程的发展还是比较快的。

第四，俄罗斯彻底失去了乌克兰。从 2000 年开始，乌克兰国内东西两派大体上势均力敌，通过选举轮流执政。从 2014 年乌克兰危机开始，70% 以上的乌克兰人反俄，不仅是西部的，也包括东部

的，情况开始转变。亲俄力量在萎缩，反俄力量在增加，亲西方的力量明显增加。

这次战争爆发后，乌克兰的情况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乌克兰国内不管哪一个政党执政，都会坚持脱离俄国，向西方发展，向西方靠进。就这点来说，在乌克兰国内，不分地区，不分党派，不分阶层，都是一致的。可以说俄罗斯已经彻底失去了乌克兰。问题是不止失去了乌克兰，俄罗斯想要重新收拢旧山河，把前苏联国家聚合起来，建立一个新的帝国或联盟，这个可能性已经没有了。如果硬要做的话，遇到的阻力和困难更大。从这一点来讲，这个礼拜发生的事对俄罗斯来讲是一个致命性的打击。

第五，这场战争把俄罗斯世界第二军事大国或军事超级大国的形象打破了，让我们看到了俄罗斯在军事上和其他方面的致命弱点。不要轻视这个结果，这个对俄罗斯后患很大，可以说是后患无穷。现在这种情况必然鼓励和刺激其他国家对俄罗斯的各种抵制、抗击，甚至是蔑视。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如果俄罗斯同周边的一个中等强国发生战争的

话，它都没有胜算。

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是，从这场战争来看，世界秩序和格局的转换。我想简单用一句话来概括：彻底结束了过去，开辟了未来。

结束了过去，主要就是结束了苏联解体的过程，结束了冷战的残余。这要从两个方面说，苏联解体是一个历史性的过程，1991年12月苏联解体后，苏联的影响、苏联的遗产、苏联的痕迹长期存在，无论是在俄罗斯，在前苏联国家，还是在其他国家，比如在我们中国，都长期存在。从俄罗斯的内外政策来看，明显有前苏联的痕迹和沙俄帝国的痕迹。普京执政初期，前苏联的痕迹更多一些，随着20年的发展，沙俄帝国的痕迹也慢慢凸显出来了。这次战争以后，我觉得苏联的痕迹在俄罗斯也好，在前苏联也好，都会大幅度明显减少。俄罗斯一直在重整旧山河，重新聚拢前苏联国家，想组建一个联盟或帝国。这构成了它和美国与西方的主要矛盾，这个矛盾是历史性的，也是结构性的，很难克服。这次战争以后，俄罗斯重整旧山河，重新聚拢前苏联国家建立一个帝国或者联盟国家的大战略

计划就破产了。因此，可以说作为冷战的一种残余，或者是后冷战，这个问题就不存在了。

乔依德：下面我们有请国防大学国家安全学院院长唐教授。

唐永胜（国防大学国家安全学院副院长、少将）：感谢乔老师。怎么在世界变局中观察俄乌冲突，怎么评价俄乌冲突或俄乌战争的影响，确实有不同的意见，不同的观点。有的观点比较轻描淡写，有的认为非常重要，甚至认为是二战结束以来全球政治的重大事件。福山从美国人的角度作出一个预言，俄罗斯将彻底的失败，自由世界将取得彻底的胜利，似乎是历史的终结。

在我看来，说拐点确实是有些夸张了，历史不会终结。但是如果要把这场冲突和冷战结束以来的一些重大事变比较的话，比较类似于对整个国际体系的冲击，对国际秩序的冲击，类似于 911 恐怖袭击和 2007 年 -2008 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它超过科索沃战争，超过伊拉克战争，超过阿富汗战争，因为这几场战争都是美国主导的北约打的战争。而这次俄乌战争，总体上是它的对手俄罗斯向西方世界

的附属地段，也是欧洲的心脏地区，进行了一个军事反击。

尽管背景非常复杂，俄罗斯有其自身多重的考虑，前面几位老师已经提到了，美国也有它的纵容，坐收渔利的各种打算，但背后俄罗斯反击美国围剿的成分，仍然是这场冲突的底色。正因为如此，俄乌冲突是当前世界变局中一个重大的历史事变，是用一种比较传统的方式——战争的方式，推动局势向深度演变。而这场世界变局的实质，是国际体系的节奏之变，性质之变，是资本主义占主导的国际体系从顶峰向下滑落过程中的一个重大事变。俄罗斯用军事手段打出了这一拳，美国极力想利用这场战争为自己的霸权续命。至少到目前为止，美国很能收割一拨利益，但是要想使得美国霸权满血复活，很难做到。我的观点是，战争最终将损耗美国的霸权信誉。目前美国用的各种极端手段已经显现出来了，最后其霸权信誉受到影响和冲击也是必然的。

考察这场战争最关键的变量，还是俄罗斯的选择最后带来的结果。对于这一点，也有各式各样的

认识。我的基本观点是，只要俄罗斯把它在乌克兰的目标定得比较适当，而不是一个无限目标的话，那么这场战争还是可以收拾的。战争怎么结束存在各式各样的变量，但是如果采取有限的目标，和俄罗斯现有的能力基本匹配的话，总体是可控的。俄罗斯战后的地位不是十分确定，但是并不是不可收拾。从这一意义上来理解这场冲突，对西方占主导的国际体系的冲击和影响，应该是我们考察的一个重要角度。

俄罗斯的做法未必代表世界未来的方向，大多数人可能不同意，甚至是持批评的态度。美国目前霸权所表现的一些极端做法，也不代表未来世界的方向。我们中国怎么办？这场冲突中，我们目前对世界的认识，我们采取的立场，我们能够做的一些事情，能够代表未来世界的发展吗？我们能够站到历史正确的一方吗？从这个角度来理解，从世界变局角度来理解这场冲突，我们可能会把问题看得更清楚。我就汇报这么多，请大家批评指正。

乔依德：谢谢唐将军，他的观点值得我们考虑。如果俄罗斯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见好就收，它还是可

以达到有限目标的。最后的发言有请张宇燕老师，他是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世经政所所长。

张宇燕（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国家全球战略智库理事长）：听了各位的发言，我收益良多。我在这里用5分钟时间，谈一点我的想法。

第一点，我记得总书记在三年前，在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讲到，理解国际局势，要把握好三观，第一个是历史观，第二个是大局观，第三个是角色观。历史观是指要拿起历史的望远镜，不能光看现在，要总结历史规律，然后展望未来。我觉得这个历史观有助于今天我们来了解这次俄乌冲突。这让我想起了法国历史学家布罗代尔，他在著作中谈到，历史可以分成三个时段，长时段、中时段、短时段。长时段可能持续几百年，涉及到地理、气候、生态、社会组织、思想观念这些东西，几百年的时间基本是不变的。中时段大概几十年，甚至可能上百年，这个时段形成了周期和节奏，对历史进程产生了重要作用，比如人口、产出、工资、制度等。短时段，就是事件突发的事变、变革、战争、

条约、地震。

我们怎么看待这个事，300年以后的历史学家怎么看待今天这个事？总体来讲，从历史角度看，确实有影响，但是影响在哪里呢？我觉得它是一个事件，可以成为一个标志性的事件。今天的世界是几个时段变化的重叠。从长时段看，几百年的变化，今天到了临界点，比如说气候、生态、环境，人类必须面对这么一个阶段。从中时段看，人口变化有老龄化，有人口爆炸，产出力量对比，包括全球的体系都在发生变化。从短时段看，这个事件，特别是这场战争，它的影响不能改变历史进程，但是至少在边际上加速了历史进程。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是大局观，就是指抓主要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今天我们看世界格局，主要矛盾是什么，谁是当今世界真正的玩家？这个还是看得清楚的。如果我们把国家的力量、玩家的力量高度抽象化，实际上就是两个，一个是创造的能力，另一个是毁灭的能力。原来讲创造的能力，竞争、分工、专业化这些讲的多。这次事件让我们突然意识到，能力要分两种，决定人类命运最核心是创造的能力

和毁灭的能力。创造能力美国还是第一。毁灭能力，如果按照金融分级的话，美国和俄罗斯两个都是 3A。俄罗斯的创造能力恐怕在 C 这个位置，当然它在大宗商品这一块有它的位置。今天的世界，俄罗斯的力量在毁灭，这个凸显出来了。当然也有争议。但是核武器这块是没有争议的，可以毁灭人类。那么中国在什么位置呢？在创造能力上，中国迅速上升，真正成为美国的竞争对手。毁灭能力，我们是两个 A+。今天我们看大的玩家，恐怕还是美国。美国感受到的真正威胁，从中长期来看还是中国，刚才不少发言者讲到了这一点。中国现在成为美国完美的敌人，满足了三个完美敌人的条件：对立的意识形态，非我族类，能够对我形成可置信的全面威胁。从大的格局看，这个是清楚的。

第三点，所谓角色观就是把我们自己摆进去。我再提一本书——基辛格写的《世界秩序》，在书的最后，他谈到 21 世纪美国要发挥作用必须回答五个问题，这五个问题是基辛格给美国人提的。今天这个世界三期叠加，中国慢慢成为美国主要的全面的竞争对手，我们也应该好好考虑这五个问题。

基辛格谈的都是美国，我现在把它全部转换成中国。第一个，中国必须明确要努力防止什么东西，在国际上，在周边，无论是经济、政治、安全，我们必须防止的东西是什么，这个要明确。第二个，即使得不到任何多边体系的支持，我们也要干成一件什么事。第三个，只有在有盟国支持下，我们才能做到什么事，这个也要想清楚，一旦孤立了，就非常难办。第四个，即使是多边集团或盟国、友好国家强烈期待我们去做、敦促我们去做，我们也不能做的事是什么。第五个，我们努力要促进的价值观的本质是什么。这就是基辛格给美国提的五个问题。到了今天这么一种迅速变化的三期叠加的时代，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些是我们中国把我们自己放进去，应该认真思考的问题。我就讲这么多，谢谢。

乔依德：好，非常感谢，张宇燕老师在最后的发言提纲挈领地把我们今后要关注的问题提出来。特别是最后把基辛格对美国提的五个问题，换成对中国提的，我觉得这个非常好，可以是我们进一步要研究的。这些问题非常重要，处理得好不好，在

某种程度上对我们国家的命运有重大的影响，也可以说是对我们每个人都会有重大的影响。再次感谢讨论嘉宾，感谢各位参会者，今天研讨会就到这里结束，谢谢大家。

（以上内容根据录音整理，未经本人审阅）

各国和地区疫情现状及防御措施

金冬雁 香港大学李嘉诚医学院生物医学学院教授

陈 茁 美国佐治亚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卫生政策与管理副教授、

宁波诺丁汉大学健康经济学教授暨健康经济学中心学术主任

系列座谈会第 67 期 2022 年 4 月 12 日

乔依德（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我们今天讨论如何防止当前的奥密克戎疫情。大家最关注的热点问题是如何防止疫情，如何在抗击疫情与保持经济增长之间取得一个很好的平衡。我们非常高兴邀请地到了两位重量级的嘉宾，请他们从各自所在的国家和地区——美国和香港，来看一看这两个地方对付疫情的政策变化，演变过程是怎么样的，有哪些经验教训值得我们借鉴。首先，请陈茁老师给我们演讲。陈茁老师是美国佐治亚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卫生政策与管理副教授，兼任宁波诺丁汉大学健康经济学客座教授。陈茁老师主要从美国公共政策这个角度谈美国现在疫情的状况，最

后提出一些建议意见，下面首先请陈茁先生做主旨演讲。

陈茁（美国佐治亚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卫生政策与管理副教授、宁波诺丁汉大学健康经济学客座教授暨健康经济中心学术主任）：非常感谢乔老师的邀请。我主要从卫生政策和卫生经济的角度来讨论可能存在一些问题，还要向金老师以及各位前辈老师请教，一起探讨。一方面，通过前一段时间美国疫情控制的经验教训，来剖析美国的公共卫生体系是怎么运作，怎么应对新冠疫情的。其中的一些局限是短时间内无法改变的，但是有一些可以让我们借鉴的地方。

第一，有一个非常大的局限是，因为美国的联邦和地方的分工非常明确，界限相当明显，有一些地方是联邦疾控中心无法兼顾的。大家可能认为，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CDC），可以调查美国任何疾病的爆发，事实上不是的。公共卫生是州的主权，只有收到州卫生局的邀请后，联邦 CDC 才可以派人进行流行病调查。这个过程也发生了一些变化。2007 年时，Andrew Speaker 在亚特兰大，当

时他有抗药性肺结核，具有传染性，当地县卫生局建议他不要旅行但是没有强制。CDC 认为，他在出美国之前是在县卫生局的管辖范畴之内，所以 CDC 没有作出任何限制。但是他在罗马的时候，被 CDC 告知他有抗药性肺结核，要求他联系意大利卫生当局，但是，这位 Andrew Speaker 担心意大利当局无法应对，随后经布拉格飞往蒙特利尔，并开车进入美国。在他开车进入美国时，CDC 有权力介入，为什么呢？因为 CDC 的联邦权力，主要是针对从国外来的或者跨州的事务。各个州的公共卫生非常不一样，有的是州卫生局派出的，有的是各个县有自己的卫生局，还有混合型的。

公共卫生系统是由联邦的一系列部门来做的，包括提供医疗卫生服务的各个方面。公共卫生教育和公共安全都是各个州自行管理的，各个城市也有一系列的法律。这些法律可能有一些可以借鉴的地方，比如对于认定重大传染病的过程，美国做了很多的预案。在公共卫生紧急状况的时候，如果是联邦的医疗卫生服务人员到地方上去提供医疗救助，在这个过程中发生了医疗事故，联邦的医护人员自

己不用负这个责任，法律责任另外再考虑，因为这是紧急状况。另外，美国各州有各州的行医执照，在重大紧急状况的情况下，可以跨州行医。国土安全部在 911 之后，逐渐把这些应急功能集中在美国国土安全部。卫生部下面有一个应急反应副部长办公室，协调农业部、司法部、联邦调查局等部门来参与这个过程。美国这方面的法律特别多，包括在军队中可以强制接种天花疫苗，医疗应急的专职副部长可以制订应急计划，应急医疗物质的储备，医疗人员的储备等。美国有一个专门的公共卫生服务部队，大概有六七千人的规模，可以在紧急状况下去调动到需要人员的地区。公共卫生紧急状态也可以让卫生部提供一些专项基金，美国是根据预算来执行的，国会批准多少，就用多少，但是在紧急状况下可以做调整。另外，远程医疗在紧急状况下有一些弹性。我们国家从长期来看，可以考虑借鉴的地方，就是把这些做法梳理得更清楚一些，对于一些紧急情况，在医疗事故责任、异地行医、隐私保护、信息收集等方面可以有借鉴的地方。

CDC 的测试盒和应急测试能力，早期是有问

题的。一个原因是 CDC 的实验室受到了污染。另外，FDI 的审批和 CMS 的认证在应急状况下确实有一些冲突。新冠的接种要求当时有一些变化。这对我们国家也有一些可以借鉴的地方，比如联邦政府对于联邦的雇员和合同工，必须要有新冠疫苗接种。加州就特别要求接种，纽约市也是这样的，要求比较严格。相对来说，我觉得美国疫情的可取之处，在于打疫苗非常的努力，联邦政府用行政命令要求联邦政府雇员和合同工，包括一些跟它有合同的单位的雇员，一定要求打疫苗。各个州政府，比如加州政府也有要求。三藩市就曾经要求一定要出示疫苗卡，才可以在餐馆里就餐。很多私营企业也对打疫苗要求。因为美国联邦和地方政府在权力上有差异，所以地方上对戴口罩和集会规模的要求，随着疫情的严重会有一定的变化。当然，这和意识形态，和具体是哪一个政党在当地政府有优势，是有关系的。在 2020 年初疫情最高峰的时期，美国对养老院的探访是非常严格的，对老人有非常强烈的保护，随着疫情的变化也出现了一些调整。

简单聊一下分区诊疗的问题，我们国家和美国

有一些差异。相对来说，美国疫情的传播模式和中国的不太一样。美国人做核酸，大部分是自己在家测，准确性可能有一些问题。他去外面测核酸，一般是开车到一些点去测。感染的可能性相对较小。另外，美国人去治疗不会都去一个大医院去排队。他一般会打电话给私人医生，或者到诊所里去看，诊所有一套流程来应对发烧的人，各个诊所在流程上有一些差异，但是总体来说，不会有大的人群聚集。这在早期，尤其在武汉的时候，可能是一个相当严重的问题。我们国家早期提出来要做分区诊疗，要有家庭医生，但是后来发现家庭医生没有真正落实，这的确非常可惜。如果有家庭医生或社区卫生中心的首诊要求的话，可能会降低人群聚集在这个过程中的传染。

美国到底是不是躺平了？不能说美国真的是躺平，或者其他国家是躺平，有些国家可能资源有限。美国一方面是疫苗，另一方面还是有一些社会政策的，包括戴口罩。现在美国的政策是根据当地疫情的情况，去决定是不是要求戴口罩。如果所处的这个县没什么病例，他们的要求是不需强制戴口

罩，员工可能会戴。也有大型集会方面的管控。当然，美国各州不一样。美国和中国都有对公共集会的限制，美国的这个限制在各地方、各州有一些差异。美国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躺平，只是它对人员流动，对经济活动的限制，没有像我们国家那么严格地来执行。

图 1 是现在奥密克戎的情形，2021 年年底到 2022 年年初，有一个奥密克戎的大波峰，甚至有一日 100 多万的情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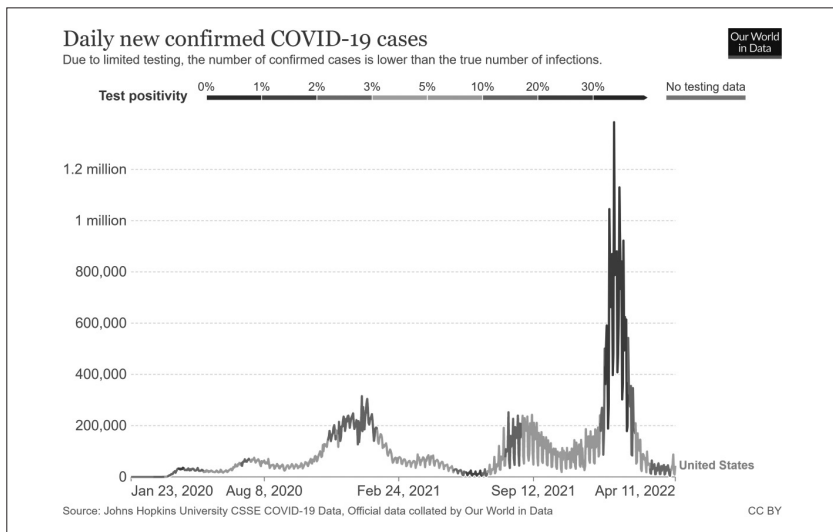


图 1：美国每日新增确诊病例

相对来说，死亡病例并没有那么高（图 2），因

为奥密克戎的毒力不太一样，现在死亡率基本上已经降下来。现在只要去医院，就一定要检查是不是有新冠阳性。在早期统计中，有新冠阳性的病人的死亡都会归因为新冠导致的。奥密克戎的占比从去年年底开始上升非常快，传播能力非常强，一个月不到就从不到 4% 到现在几乎是 100%，现在都是奥密克戎，但是相对来说死亡率低了不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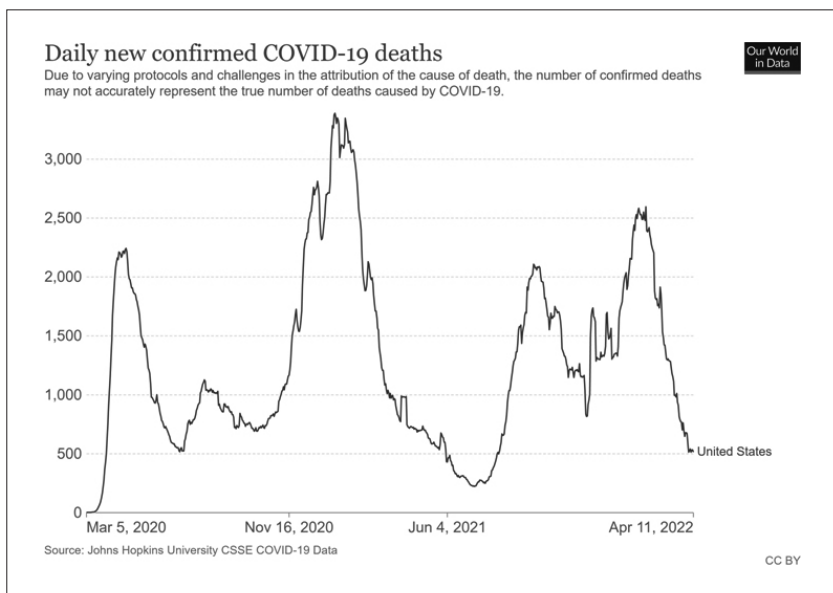


图 2：美国每日新确认的 COVID-19 死亡人数

美国公共卫生应急体系在 911 空袭，炭疽邮件恐慌，卡特琳娜飓风等事件之后逐步完善。但存在

体系条文僵化导致在紧急情况下无法灵活应对的情形，政治干预也影响了卫生部门的应急决策。新冠疫情对美国的应急体系提出了新的挑战。早期，CDC 有人讨论在法律体系进行变动，但是在美国更改法律是非常困难的，要水到渠成之时才可以做一些更改。总体来说，美国的经验对中国进一步完善应急体系有一定的借鉴作用，我们没有必要踩别人已经踩过的坑。中国目前可以考虑的点是什么呢？比如，促进老年人的疫苗接种率应该尽快提上日程。在上海为疫情做出这么多牺牲，争取了这么多时间的情况下，更要在老年人群中尽快加强疫苗接种，这是一个非常紧急的任务。有一些国家，比如新加坡，没有正当理由不接种疫苗的人群，其保险赔付就会受到影响。美国各个州的疫苗接种不一样，加州有非常大的奖励。俄罗斯年轻人的接种的比例比较低，所以针对年轻人有大学入免费入学的奖励。推进分期诊疗也是一个契机，要强调社区卫生中心的首诊作用，加强健康教育。另外，可以考虑一下新冠应急包，美国前一段时间通过邮局发了三个新冠测试盒。我们国家的生产能力非常强，可

以在新冠应急包方面有所借鉴。现在国家对退烧药进行管控，但是在一些紧急情况下需要的药品，是不是可以考虑变通？

我就讲这么多，非常感谢乔老师给这个机会能跟大家交流。

乔依德：非常感谢陈茁给我们做了一个比较全面，又很到位的演讲，他主要是从美国的医疗体系，结合我国的情况。提出很好的建议。

接下来有请香港大学医学教授金冬雁先生，他现在兼任我们国家卫生部医学病毒重点实验室学术委员，专门对这个病毒进行过深入研究，将从病毒的原理、机制，然后结合香港的情况，给我们做一个介绍。下面欢迎金教授给我们演讲。

金冬雁（香港大学李嘉诚医学院生物医学学院教授）：我主要讲一下香港第五波新冠疫情的教训和启示。我过去在中国 CDC（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受训练，后来到了美国，现在在香港。

首先，新冠病毒有一些学术性的一般问题。新冠病毒的突变率，现在所说的奥密克戎还会有什么样的突变？它的突变率比流感、艾滋病毒、2003

年 SARS 病毒的突变率都要低。为什么突变率比较低呢？有一些学者认为，这个病毒已经比较适应人类，在继续适应人类的过程中，致病性总是要变弱的。有一些科学家说，要提防新冠病毒会变得更加凶恶，致病性更高，杀更多人。我认为这是杞人忧天。人类有四种冠状病毒，有一种是香港大学的袁国永教授发现的。这四种病毒在人体里长期存在，只引起普通感冒。当它在几百年前，第一次从动物到人的时候也引起过世界大流行，致病性比较高，现在致病性变低了。是什么原因呢？是它的适应性比较强，它在人体里已经高度适应，高度适应以后致病性就会弱，这是规律。绝大多数的呼吸道病毒都是这样的。流感病毒的天然宿主在哪里呢？在水禽、飞鸟里是不致病的。新冠病毒和 SARS 病毒在人里面是很凶恶的，但是它在蝙蝠里是不致病的。所以，只要它高度适应了人体，致病性就是要变弱的，这是不可违反的自然规律。它变到一定程度就不会再变，而且越来越适应，致病性是一定会减弱的。

奥密克戎到底是怎么来的，成了一个疑问，它

不但变异特别多，而且在很多重要的部位都有突变，所以奥密克戎是变得比较厉害的。它为什么变得这么厉害，到底是从哪里来的，是一个谜，并不是从以前有优势的毒株里变出来的，是从另外一个地方出现的，不知道什么原因。有三种可能，一种是免疫缺陷的病人，一种是其他的动物，一种是它在一些未知的地区进化了，进化了以后再引入到人类，就成了这样。

最初，奥密克戎在南非、博茨瓦纳被发现，还有香港，香港是世界上第一个发现这个病毒的。很快，它变成了 VOC (variants of concern)，就是值得关注的毒株。它很重要的特点是免疫逃逸特性，就是说过去的综合抗体、疫苗对它是部分失效的。它的传染性比较高，已经接近麻疹，但是致命性显著降低。我们自己的研究可能很快要在科学杂志上发表了，我们发现它在没有接种疫苗或没有感染过的人群里，适合度其实比不过 Delta；但是它在已经有新冠抗体的群体里，适合度高于 Delta，所以它的再感染和突破性感染的占比特别高。从香港的数据来看，没有接种的老人和小孩，感染率相对高

一些。

它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呢？可能在免疫缺陷病人、动物或未知地区经历独立的进化筛选。我举个例子，一个有免疫缺陷的病人，比如说病人有艾滋病或者癌症等，会造成免疫缺损，不但是这些病毒，其他的病毒也可能造成持续感染，这个人感染了新冠病毒，一直都在那里排病毒。然后我们就发现，很多不同的病都在同一个个体中出现。这也支持了新冠病毒在一些免疫缺损的病人里，如果持续性感染，就可能造成新的变种，这经常外面进化的一个缩影。我们通过自然感染或者疫苗接种，有了抗体。病毒的传染性不同，麻疹病毒一个人能传 18 个人，腮腺炎病毒 12 个，武汉的毒株大概是 2.4 个。现在的奥密克戎基本上是 6，数字倍增的时间呢大概是 1.2 天，比以前各种都快。

现在在上海，也是在香港流行的，是 BA.2 亚变异毒株。在很快的时间内，它也成为了全世界优势毒株。它有什么特点呢？就是传染性更强，其免疫逃逸性还是保持和原来的奥密克戎一样。它比 BA.1 的传染性更强，所以它能够把 BA.1 比

下去。病毒变异的规律都是传染性更强。我们看到新冠病毒出了这么多的突变体，现在到了奥密克戎 BA.2，从来没有致病性显著增高，最多是致病性不变，而奥密克戎是致病性显著下降的。这也说明了这个病毒进化的规律。所以我刚才说有些人杞人忧天，成天担忧这个病毒会变成一个更强的病毒，这个可能性是非常小的。病毒突然变成致病性非常高，又特别能传播的这种例子，是没有的。致病性比较强的病毒，例如说 SARS，它不怎么能传播。如果它能够传起来的话，致病性都是要减弱的。

有一个比较好的消息是，我们发现 BA.2 毒株大多数第一细胞表位不变。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虽然打过疫苗还能够被再感染，但是疫苗还是有很强的保护作用，我们就靠这个保护。所以，你以前得过新冠或打过疫苗，无论是打的灭活疫苗或 mRNA 疫苗，还是有相当的保护作用。

奥密克戎 BA.2，是不是将来大流行以后的毒株的雏形？有可能。但是，非常重要的是，疫苗加强针能够显著提高对于奥密克戎 BA.2 的保护，而且，现在比较新的疫苗其实已经做好了，只是等待监管

机构的批准，将来几个月内应该就可以投入使用。奥密克戎的突破性很强，在 50% 以上，但是只要打过第三针，这个保护就起作用了，能够将突破性重新降到 25% 左右，也就是说有四分之三的人不受感染，所以疫苗的加强针还是非常重要的。是不是以后每年都要打加强针呢？这个问题我们不知道，但是它的效果比自然感染还要好。自然感染有一些 T 细胞的保护，所以自然感染也有很好的保护作用。

“抗体亲和力成熟”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抗体接触抗原后，能与抗原结合的抗体的产生细胞会扩增，并经过体细胞突变产生变异，越变结合的亲和力就越高，中和能力也越强。用浅白的话来讲，如果一个人被感染，他第一次有这个抗原的时候，和病毒斗智斗勇；下一次病毒在变，抗体也在变，第二次有这个抗原的时候会变得更好，就是说结合的更好，中和的能力更强。所以说打疫苗，打第二针，第三针，加强针以后，不会越打越差，只会越打越好，因为抗体是有智慧的，这是自然进化的一个结果。造成免疫缺陷的原因有很多，包括慢性疾病、营养不良等。在美国，全面接种计划实现了。

给老年人打了以后，发现有些人即使到最后感染了，这是应该打针，而且应该多打，打到他们抗体好了为止，等到他们的抗体都非常好了，才是最安全的。所以，应该在医生的指导下，接种多次，不但是三次，可能要四次、五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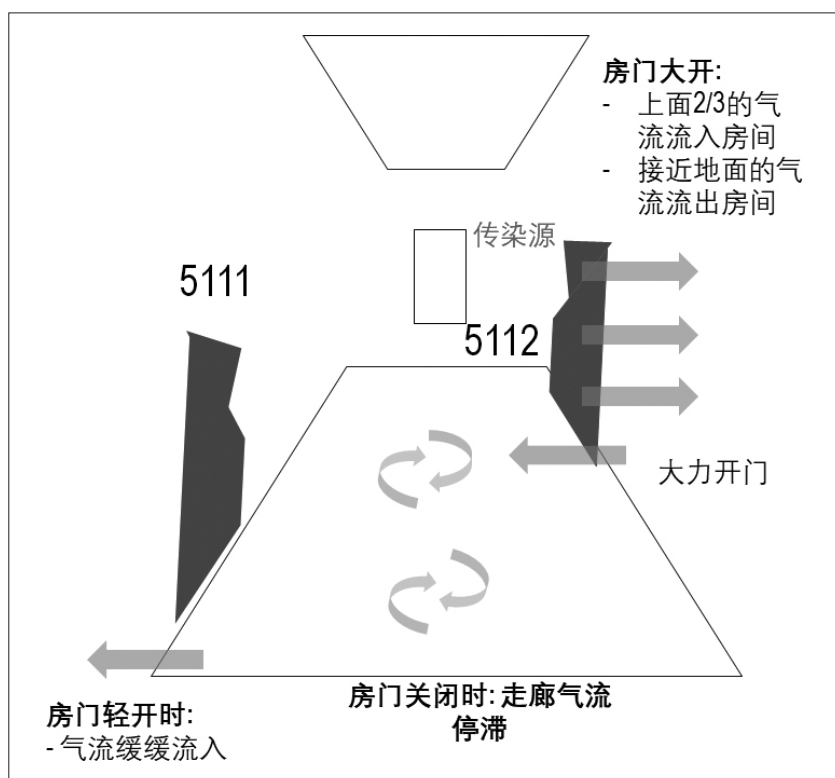


图 1：香港疫情的源头：防疫酒店的交叉传染事故

香港疫情的源头是怎么来的呢？感染了几百万

人的第五轮疫情，就是从一个人开始的。这个人当时在五星级酒店里，这次我们调查得非常清楚，没有让这个受感染的人流到社区。但是我们疏忽了，下次在四星级酒店里一个类似的人就出事了。

当时这个传染源在 5112 室，房门打开以后，走廊里的气流跑进去，把 5111 室的人感染了。当时比较幸运，把这两个人找出来了，及早隔离。但是下一次就没有这么幸运了，这一拨共有四个来源，一个是国泰空姐；一个是空少；一个是仓鼠，仓鼠受了感染以后，传染给了买宠物的人；第四个是一个巴基斯坦妇女。结果就是由这个巴基斯坦妇女，一个人现在传了几百万。酒店关着门，也还会发生传播，从一个房间跑到另一个房间感染别人。21 天隔离时间确实是太长了。后来发生的传播是这样的，就在隔离的第 18 天受了感染，离开隔离酒店的时候还是阴性的，我们采取追查机制，让她交样品来查，查出来已经感染了，就把她隔离了。但是她回家已经传给了她的医生，医生又带着奥密克戎传给清洁女工，清洁女工是超级传播者，楼上楼下跑。但是做核酸检测时只检出了一例，就觉得没

什么大事，和以前一样把大家都放走了。可是第二天发现有 7 例，怎么办？是不是全部放到隔离中心？犹豫了一天，没有放，他们又跑到了社区，结果传遍了全村整个社区。后来把这个社区的疫情扑灭了，但是它已经传播了全香港。所以整个第五轮的疫情就是由一个人引起的，在密切监测下发生的事故，有它的偶然性，也有它的必然性。

第五轮疫情里，香港最大的教训是什么呢？很多学者提出来，要实行动态清零。很多人说香港躺平，其实香港从来没有躺平，一直是奉行动态清零的。我们觉得很有信心，我们能做到，所以我们没有预案，整个就没有大规模爆发的预案。但是后来传到了整个社区，这是一个教训。奥密克戎最高的时候，一个人能传 6 个人。香港在疫情开始前，已经有一定的社交距离措施，比如晚上不许吃饭，一开始只能四个人一桌，后面是只能两个人一桌，中午也只能两个人一桌。现在香港疫情已经走向受控了，它的例数已经从 3 月初每天有 5 万多，将近 6 万例，现在变成 1000 多例了。当时我们在全港 18 个行政分区，随机找 1 万人测抗原，结果发现 3 月

初有 10.75% 的人是阳性的，也就是说，当时全香港可能有 70 万人受了感染，到现在已经只有零头了，现在估计还有两三万人受感染。

在香港由 70 万到 30 万，到后来几万，到现在两三万，这些人其实是居家隔离的。虽然香港政府接受内地的建议，一直都没有允许轻症者和无症状者居家隔离，但是事实上受了感染以后还是待在家里。这 70 万人在家里，并没有影响疫情从每天 6 万多例走到现在每天 1 千多例，也就是说受控了。这个疫情有自己发展的规律。短期内迅速扩散，疫情升温，也在短期消退，下来得也很快。而且这段时间里，我们既没有封城，也没有禁足，也没有搞全员核酸的，这是我们非常自豪的。绝大多数病例，99% 以上是轻症无症状。我们最惨痛的，是在多家养老院发生了聚集性传播，大批不打疫苗的老人死亡。当然没有打疫苗的小朋友受感染的人数也是相对多的，也出现了一些重症死亡。但是总体来讲，从数据来看，他们的死亡率还是非常低的。在这里面，抗原检测发挥了关键性作用，对核酸检测形成了重要的补充。我们的医疗资源面临了前所

未有的压力，面对这么一个疫情，虽然我们没有一个全面的预案，但是医疗资源基本没有崩溃。对于非新冠的其他疾病的服务，我们还是能够维持正常的。对新冠，我们也是采取了比较有效的分流措施。当然，在疫情里面很重要的是接种疫苗，这可以大大降低重症率死亡。疫情中的医患关系和人文关怀也非常重要。

我们香港是全世界死亡率最高的，比英国、美国、新加坡都要高。针对这次 BA.2 毒株疫情，80% 多的人都是突破性感染，即打过疫苗再受感染。我的同事杜教授（Kelvin Kai-Wang To）是世界上第一个发现新冠病毒重复感染的，重复感染有什么特点呢？我们来看图 2。

对于感染，一般来说患者在第五天才出来很高的抗体，可是对于突破性的感染的患者，第一天确诊了以后，第二天第三天第四天，抗体就起来了，综合活性就起来了。这是什么意思？这些突破性感染的病程是更短的，因为很快出来抗体，他自己身体里制造了一个超强的特效药，比你所有的特效药都要强，他出来这个抗体，打这个病毒，把这个病

毒击退，同时这个病毒对于其他人的传染性就会大大降低。这和以前有很大的不同，以前是五天以后才有抗体，现在第二天第三天就已经出来了，第四天已经很高了。这是非常大的特点，而且也说明了为什么大部分的感染都是无症状轻症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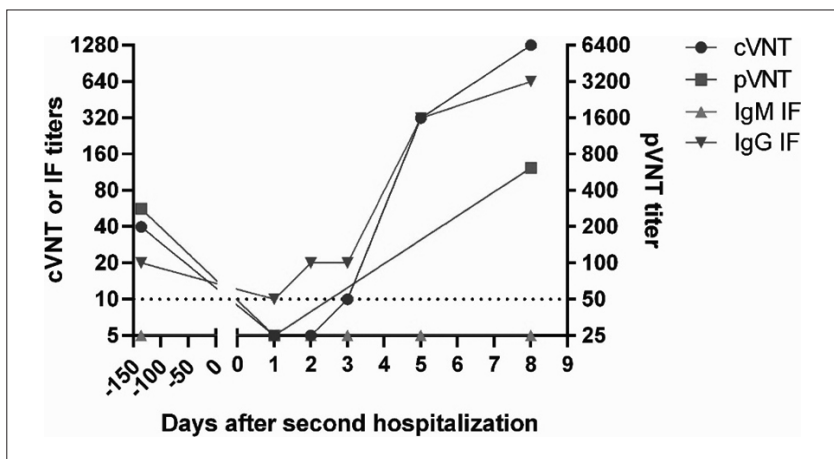


图 2：再感染及突破性感染的特点

我们看图 3，不打疫苗的老人的死亡是非常痛苦的，我们的老年人在人口里的比例，80 岁以上的只有 5.4%，但是在死亡病例里占了 71%，60 岁的死亡病例占了 8.4%，70 岁的占了 16.7%，合起来占了 96%。在这些不幸去世的人里面，现在有 8000 多人了，96% 都是 60 岁以上的人。在中央工

作组和特区政府的领导下，香港采取了应急措施，由专家给他们紧急接种，到老人院实行了闭环管理，给他们处方口服药，搞了定点医院，而且给老人做了常规性的抗原检测。这些都起了一些作用，所以老人的死亡率也下降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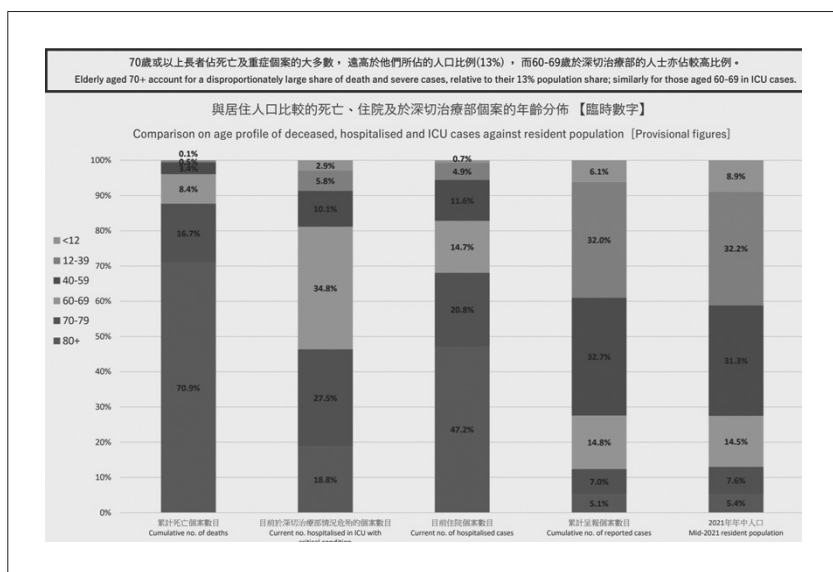


图 3：香港的悲剧：不打疫苗老人的死亡

香港疫苗接种的基本情况是，第一针的接种率现在是 92.3%，第二针达到 85.7%。可惜，对于老人的疫苗接种，2 月初疫情爆发时，老人的接种率只有 20%，现在是 56%，而且这些老人七八成打

科兴，其他组别打复必泰的多一些。整体大概 6 成打复必泰，4 成打科兴的。我们的老人确实是非常不幸。但是老人的去世，也是有很多特殊情况。首先，这些人的六成送到医院急诊以后，家属就要求不再抢救了，这也造成了他们的死亡。还有，这些死亡的人里面 90% 是有长期病患的，有已知的慢性病，其中 55% 住在老人院，45% 在家。他们大部分没有打疫苗，74% 一针都没有打，14% 打了一针，打了两针以上的只有 11%。他们为什么不打疫苗呢？我们苦口婆心劝说了很久，但是都没有成效。从家人来说，从老人来说，他们是怕副作用。而且香港控制得很好，有 10 个月没有疫情，有 100 多天是零感染零确诊，所以政府的态度也比较软。还有就是误导的信息很多，有些人说科兴疫苗不行，有些人说复必泰疫苗不行，结果都受到了影响。死亡的病人的年龄中位数是 86 岁，所以真是非常高龄的。

再看小孩的死亡，其实是很少的。0 到 19 岁的孩子一共有 11.5 万受感染，只有 12 个人死亡，其中 9 个是有慢性病的。所以小孩的死亡率是非常非

常低的，也是各个年龄组别里致死率最低的。最高的还是老人，80岁最高，其次是70，其次是60。在死亡率上，不打疫苗的是打一针疫苗的4.9倍，80岁以上是1.9倍；不打疫苗是打两三针疫苗的41倍，80岁以上是6.6倍，作用是很明显的。

这次的新冠致死率，不打疫苗的是4.3%，打一针的是0.8%，打两针以上的是0.11%，相比之下流感可以到0.1%。我讲一下第三针的重要性，结合香港的情况就更清楚了。如果没有打疫苗，80岁以上老人的死亡率是15.68%，打了一针呢的是6.11%，打了两针的是3.47%，三针的是1.07%，下降得很明显。

这次的病死率，总计是0.71%；打一针科兴的是1.28%，保护率差一点；如果打两针，感染了以后死的是0.14%，打两针科兴是0.31%，打两针复必泰是0.04%；打三针的话，都很低，三针科兴是0.04%，三针复必泰是0.02%，二针科兴加复必泰是0.03%，所以大家一定要打疫苗。没有复必泰打，就打科兴，科兴肯定也是有作用的，针比两针的效果好，两针也比一针的效果要好。

在第五轮里面，82%是突破性感染，第三针很重要。不管你打不打疫苗，总体统计的感染率是15.8%。如果不打疫苗，感染率是24.6%，有四分之一的机会会受感染。如果打了三针疫苗，感染率就只有6.3%。如果打了三针科兴，感染率是9%；如果打了三针复必泰，感染率是3.4%，所以，你打疫苗以后，即使是打科兴，都能够保护你，感染率也是大大下降的。

我们讲了抗原检测和核酸检测。刚刚过去的13天，全民自愿抗原检测找到了不少感染者。我们建立了抗原申报平台，政府安排隔离，抽查，找到很多感染者。抗原检测对Ct值25以上的感染者（病毒量比较高的人）灵敏度接近100%，而特异性也接近100%。抗原检测相比核酸检测，减少了聚集。我们在疫情拐点之前做了几件事，第一是我们大大减少了核酸检测。曾经有一段时间，我们心急如焚，就是大批民众排队四五个小时检测核酸，三五天才能出结果，这样怎么搞？不行，再怎么八方支援也不行。后来专家组听了我们的意见，把核酸检测大大减少了，多做抗原检测，少做核酸检测，核

核酸检测要好钢用在刀刃上，用来决定病毒量，用来决定它有没有可能造成超级传播。我们大大减少了核酸检测，建立了抗原检测平台，这是拐点之前做的。然后，每天上班都要做抗原检测。我们要做抗原检测，要把我们的工作证、时间和结果，一块上报，有了这个结果才能上班。它的成本低，如果我们连续测三天抗原，肯定比三天只测一次核酸灵敏度高，而且我们快速取得结果，实现了早确诊、早隔离。它当然有一些问题了，比如质控、监管、假阳性等，全标准还是要核酸检测。现在我们每天通过抗原检测找到的确诊者都多于核酸检测，而且我们对抗原检测进行个别抽查，大部分承认它的结果，因为它是特异性非常高的。

我简单讲一下香港的医疗体系有没有崩溃。其实如果我们实现好的分流，病人进行分层，还是能够不让医疗体系崩溃的。我们用呼吸机的危殆病人，任何时间都在 300 个以下，所以并没有那么多需要医院救治的病人。我们只要把分流做好，绝对不能愿收尽收，愿收尽收就造成严重的问题了。很多病人说，你不收我，我就在这里等着。我们只能

劝说他们回去。我们在一开始的时候，为了要实现和内地的通关，把出院的标准定成了 CT40。结果疫情一来，这造成了严重的问题，因为大批无症和轻症的病人占了负压病房，所以我们很快把出院的标准改变了。现在，CT30 由医师做判断，就可以出院。

关于集中隔离和居家隔离，事实上从 3 月初到 4 月初，整个香港有 3 万到 70 万感染者留在了家中。这轮疫情从 3 月初的顶峰走到现在，已经受控了。3 万到 70 万感染者待在家里，并没有影响疫情受控。虽然政府从未正式允许无症轻症者居家隔离，但是政府提出了指引，这点还是做对了。我们内部统计，根据医管局及香港大学内部统计，仅 1/3 至 1/2 感染者可能受家庭成员传染。估计其中相当一部分有共同接触其他感染来源或在不知不觉中已受感染。感染后认真实施居家隔离者传染其他同住家人的情况较少。在我们医学院的这些员工里，居家隔离的感染者绝大多数都没有发生一人传一家的情况。政府对于居家隔离，基本上采取容忍的态度，根据感染者意愿和居住条件决定是否集中

隔离，并正式作出口头承诺。前三天，就是4月8、9、10三天，全民自愿抗原检测，阳性的也不一定要你到隔离中心去。因为现在有一个问题，很多市民怕隔离胜于怕感染，结果一部分感染者没有做呈报，这是我们需要解决的问题。

最后小结一下，这个变异株传染性很强，致病性很弱，主要在不打疫苗和没有未完成接种的老人中出现了重症和死亡。虽然它有免疫逃逸性，但是打加强针还是能够提供更强、更持久的免疫力。香港出现的绝大多数病例是无症和轻症的，它的高传染期很短，就三天时间，不超过五天。在少儿中的感染比较多见，大概有11万人，占10%左右，其实在儿童里是极少出现死亡的，儿童的重症和死亡率是所有年龄组里最低的。并不是这个病毒特别能在少年儿童中造成的后果，这是有数据的。我们以抗原检测为主，核酸检测作为重要补充。我们的医疗虽然受了很大的压力，也发生过很多人入不了院，愿住尽住肯定是不可以的，但是我们还是提供比较好的服务。居家隔离在疫情防护里没有造成明显的负面效果，也没有逆转疫情走向受控。当然，

最重要的是。不打疫苗的老人导致死亡的教训，一定要记取。

乔依德：非常感谢上面两位专家给我们做了精彩的演讲。陈茁从政府的公共卫生体系来切入，介绍了美国疫情的变化，他也联系了中国的情况提出了建议。金教授从病理学，特别是奥密克戎的特点，作为一个切入点，然后介绍香港的情况。我听下来有一个比较强的感触，这些对我们国内来说都是有启示的。你们两位都强调了打疫苗的重要性，美国也好，香港也好。这一点我们国内好象强调得不够。我们也看到报道，在发达国家甚至必须要打了疫苗才能去饭店吃饭，我们国家完全有力量做到这个事情。另外，金教授也讲到了居家隔离在香港的情况，对我们也是有启示的。下面我提一两个问题，然后其他人也来提一些问题。根据你们两位，对国内和国外情况的了解，你们觉得国内防治疫情应该进一步采取哪方面的措施？哪些是现在可以做的？

陈茁：我先简单说。我非常同意乔老师的意见。我和金老师所得到的结论，其实是非常相似的，一

个是一定要打疫苗，另一个是我们一方面要利用医疗系统，同时也要保护好医疗系统。接下来要做什么？一方面，我想是继续推进打疫苗。我觉得咱们国家在打疫苗上进度缓慢，可能有一些长期以来的原因，可能是对疫苗的不信任，对医疗系统的不信任可能也是原因之一。在美国，大部分人对家庭医生是非常信任的，如果家庭医生推荐他们去疫苗，他们肯定会去打疫苗。国内就没有这么一个医疗体系，让病人和医生之间有一个非常强的信赖关系，这就导致疫苗推进存在问题。短期内，要通过政府，通过咱们发展基金会，还有各位专家的呼吁，来推进疫苗的进一步接种。长期来看，我觉得医疗体系也要做一些思考。另外，金老师刚才已经提到了，居家隔离可能是对医疗系统的保护。一方面，居家隔离从实践的可能性上或许会更好一些，对咱们经济生活的影响可能要小一些。另一方面，居家隔离对整个医疗系统的冲击可能会小一些。现在我们虽然没有看到医院里有很多新冠病人，但是由于集中隔离所导致的一些次生医疗问题，大家已经看到很多例子了。比如因为没有办法及时就诊，

110、120 都有几百个号在等，对其他慢性疾病、对要做透析的病人，影响是非常大的。所以我觉得居家隔离可能是一个应该考虑的方向。我就说这么多。谢谢。

乔依德：下面请金教授谈谈看法。

金冬雁：我完全同意陈老师讲的这些观点。然后我也再简单讲一下，我们香港这次一个巨大的教训是什么？第一是没有预案。我们其实是要对发生在吉林或上海这样的情况，做一个预案。其他城市现在就要做好预案，不能疫情来到了以后现再建方舱，那已经是不行了。而且你要解决人家的生活问题、医疗问题、社会问题，这些不是轻而易举的，所以一定要有一个周全的预案。将来在我们内地这么多城市里面，再发生像上海和吉林这样疫情的机会，相对而言是比较大的。虽然这一切是有偶然性，我们香港就是非常偶然，在我们眼皮底下看见的一个人出了一个事，搞得全港变成这样了。第二，就是些疫苗的措施，香港现在就采取了疫苗通行证。首先实行第一针，以后要实行第二针，第三针。你要不打完三针，不能到餐馆吃饭，不能到游

乐场所，不能去政府的医院，不能到政府的任何场所。其实内地应该有很多的办法提高老人的接种率和全民的接种率，特别是加强针。我们现在清清楚楚地看出来，这个加强针是一定要打的话。

乔依德：谢谢。对金教授的回答，我再进一步提一个问题。你刚才举了香港居家隔离的例子，虽然香港政府没有公开允许，但是实际上也默认了。从你们的数据看，居家隔离没有造成大的感染。你也提到，香港政府对于居家隔离有一个指引或指南。国内也有这些讨论，担心国内的居住条件不如美国，也举了 SARS 时期香港淘大花园下水道的例子。这次奥密克戎和 SARS 恐怕还是不一样吧，它会不会通过下水道或别的渠道扩大感染？想听听你的看法。

金冬雁：首先，这种下水道的传播是香港这个特殊的环境下发生的一个特殊情况，并不是说所有的楼房都会发生。在中国内地，从来没有见到过明确的在高层住宅区、高楼大厦里发生了由下水道造成传播的报道。香港发生这个传播是在一个旧式的屋村，就是 70 年代盖的屋村，它有一个特殊的建

筑结构，把厕所取风的那个地方放到了厕所排污管里。像我们住的楼房，绝对不会有这个问题。它是在当时建的一部分公屋，还是经过改建的里头才会发生这个问题。而且对这个问题，如果你紧张的话，用很简单的方法就可以对付，就是往下水道地漏里，每天放几勺漂白水，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在高楼大厦里发生因为下水道造成的超级传播，这是一个特例。在这次第五波疫情里，绝大多数的超级传播是人传人，而不是物传人。唯一的一个是仓鼠传人，那是他从河南买的仓鼠，仓鼠自然感染这个病毒以后传染给人，那个我们也处理过了。内地担心因为居家造成下水道传播，我觉得是没有太大根据的。

乔依德：谢谢金教授。我们的听众也有提出问题来，我总结一下。对于新冠病毒死亡的认定，是不是有一个统一的标准？比如说内地和香港死亡率的数据，现在差异很大，是不是跟认定标准有关？

金冬雁：你讲的太对了。不单是诊断的标准不一样，死亡的标准也不一样。所以，上海是绝对不会发生像香港死亡率这么高的情况，绝对不会发生

的。就算是发生了，它也不会算是因为新冠。我刚才讲过了，这些人里面 90% 是有其他病的。在内地的计算里，多数情况下会归入原来的那个病，不会归入新冠。

乔依德：你的意思是说，香港会把它归到新冠的死亡率中去？

金冬雁：对，是这样的。因为我们有 8000 多死亡病例，香港的病案管理现在是世界上第一流的了，马上做了研究。我们现在的 8000 多的死亡病例里，只有四成的死因跟新冠病毒是直接相关的，其他没有看出有直接相关，有可能是因为受了感染以后，发生了什么情况，最后他心脏停跳了。甚至有一些根本是已经好了，新冠已经阴性了，这时候他死了，这也是有的。我们的死亡病例里，60% 应该不是死于新冠，而是死的时候有新冠感染。我们的标准定得很清楚，他在 24 小时内是阳性的就报告。

乔依德：还有一个问题请金教授谈谈，灭活疫苗和 mRNA 疫苗在对奥密克戎防范上有什么差异？是不是建议内地可以考虑尽快引进 mRNA 疫苗作

为年长者的加强针？

金冬雁：我们一贯是这样主张和呼吁的，但现在还没有听我们的意见。我们呼吁了很多事情，从武汉疫情结束以后我就讲，要把抗原检测抓起来，特别是要把抗原检测作为核酸检测的补充，结果一直都没有听。到这次香港，我们做了探索，也呼吁政府采取措施，后来他们改了一点，进了一步。我一直呼吁应该马上批准复必泰疫苗。而且香港也有很明确的数据，做了临床实验。第一，如果你打两针科兴，再加一针复必泰，它的综合抗体浓度是高很多的。第二，是它的安全性和有效性。当初接受科兴、国药援助的国家很多是南美洲的，他们在后期看到了我们的灭活疫苗保护不够强时，包括香港特区政府，都公开建议给市民的第三针打复必泰。智利、巴西、印度尼西亚等很多国家，也是这个建议，而且也是这么实施的，这是有充分数据的。虽然现在的数据表明科兴对死亡和重症有一定的保护作用，但是它还是略差于复必泰。所以我还是主张，应该尽快引入复必泰疫苗，特别是给年长者的加强针，这样的效果肯定是比第三针还是科兴

要好。

我看到下面一个问题是，美国或香港有没有区分确诊和无症状感染？一会陈老师可以再答一下美国的情况。香港所有的统计都是把无症和有症统统包括在内。而且我们的无症和上海现在报告的无症是不太一样的，我们的无症是真真正正没有症状的，这个病人连流感的症状都一点没有。如果它有一点点喉咙疼，或者有一点点发烧过，这些都是有症，是轻症。我们的无症就是感染了以后完全没有症状。我们都把它归纳在受感染的数据里，没有把它另列。

陈茁：美国的做法可能也是一样，比如现在佩洛西被测出阳性，她也是一个无症状感染者。当然，在美国很多无症状感染者可能没有被统计到数据中去。

金冬雁：在香港也是一样。

提问者：我想问金教授关于老年人接种的问题。我们国产的科兴疫苗，好象对某些基础疾病的要求会比较高，所以国内的老年人就比较担心，有一些甚至去咨询了医生，如果有基础疾病的话，他害怕

有副作用。

金冬雁：我跟你解释一下吧。科兴在发表数据方面做得差，而且一开始的策略就搞错了。这些商家，科兴和国药，也是根据过去的做法胡来，它们列入了大批的禁忌症，这是完全违反科学和医学证据的。它把什么病都列入疫苗接种禁忌症，但是实际上科兴疫苗的副作用在所有的疫苗里是很低很弱的，是所有疫苗里副作用最少的。科兴和国药都是灭活疫苗，老年人，包括有高血压或者过敏的（我自己也高血压，也有过敏），其实都是可以打的。不幸的是，疫苗制造厂商把它定成禁忌症，很多医师也有错误的观念，让他们以此作为不打疫苗的借口。香港也有这种情况，香港一开始给的指引也是按照这个厂商来的，后来发现这样不行，搞得太严了，以致很多人都不能打疫苗，就改了。而且我们香港大学对复必泰疫苗做了研究，它对基础病没有影响，没有加重基础病，这个基础病也没有影响疫苗抗体的产生，当然美国的数据就更多了。科兴我们没有做，但是科兴从道理上应该也是这样的。所以是可以打科兴疫苗的，而且科兴疫苗实际上是副

作用最小的。不幸的是，我们遇上了这么一个问题，确实是白纸黑字的写着，这些都是禁忌症。香港政府也面临这个问题，我们用了很大的精力去向接种者解释。其实从美国或全世界来说，这些人都是可以打的。

提问者：我的第二个问题是，后来香港老年人可以接种了以后，你好像说 80 岁以上接种科兴的比例反而比较高。我有一个疑惑，应该怎么说服这些老年人呢？

金冬雁：你说副作用吗？

提问者：你刚才介绍说，目前香港老年人接种科兴的比例是高的，说明他们其实没有这个疑虑。你怀疑厂商列出来的禁忌症有问题，是不科学的，但是我们也没有实际做过实验。

金冬雁：关于科兴和国药疫苗，灭活疫苗的副作用小这一点是有证据的。国药和科兴，包括我们卫生部，就是中国疾控中心，都有疫苗副作用报告机制的，肯定能说明科兴和国药灭活疫苗的副作用比复必泰等其他疫苗要小。这是有证据的，也有一些发表的文章，问题是大家不一定那么相信。

提问者：听你的介绍，觉得科兴这个疫苗好像还满好的，当然我们也呼吁能进复必泰，中国公司在投资中也占有很大的比重。问题是在这种情况下，国家没有相关的数据能披露得更清楚一点。

金冬雁：我刚才拿出来那些数据，也是在我们的再三施压下。包括卫生官员说，你们怎么搞的，到现在都不把数据拿出来？所以最近一个星期才拿出来的，原来我们都是在私底下推算，现在才整个拿出来了。我们也看到，科兴的表现其实是比预期好的，但是它还是不如复必泰。而且它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在打科兴疫苗以后不久，可能刚刚是过了两个星期，在很多人接种科兴不久后仍然发生了这个疫情。所以，它可能是一个很近的效果，长期或者三个月以后是不是抗体的保护会下降，这点是有疑问的。但是，如果看两针的保护率，应该还是比较可靠的，因为两针是隔了比较长的时间。

提问者：国内现在有一个很大的反对理由，就是觉得中国的人口基数比较高，如果乘以致死率这个比例，这个结果就变得是不可接受。如果不引进复必泰，这个理由还是会卡在那里。

金冬雁：你说的完全对。

提问者：金教授，你刚才讲到感染率的概念，这个感染率是什么意思？是指在我们完全不做防控的情况下，大概 25% 会感染，还是说在有一些措施的情况下会感染？

金冬雁：我们有比较严格的社交距离措施，大家都戴口罩，包括只能两个人吃饭等等社交距离措施，并且在这拨疫情还没有出现的时候，就已经实施了。在看到国泰的两个空姐空少传播的时候，政府就紧急采取了这个社交距离的措施。当然，有社交距离控制措施的同时，我们也是能够保持这个社会的基本运作，就是我们能够正常吃饭，正常上班，正常出行。

提问者：金教授，我有一个简单的问题，上海现在基本上处于封闭的状态，大家都是靠快递，拿快递会不会传染病毒？

金冬雁：我历来主张，经过快递传播的几率是非常低的。这也是有一定根据的，有人也做过实验，把病毒放在快递包装纸上，肯定不可能造成大的传播，可能有个别人可能会中，但是这种可能性

是很低很低的，有人说是 10 个人里面有一个，也可能比这个更低。现在中国的防控，对于快递这一块实在是太夸大了。你想，如果说我们快递有问题，我们每天都收快递，包括世界各地的快递，但是在香港感染率高的不得了的时候，从来没有报道过有一例是因为快递或快递包装纸传染的。我们的同行们也从来没有过硬的证据，这也是核酸检测的一个问题，核酸检测放大了这么多倍，那个核酸到底是死的还是活的，你也不知道。通过快递来感染人，这种情况我们不能把它说死说一定没有，但是这个可能性肯定是很低的，应该是非常不可能的。

提问者：很多国家与地区采取与病毒共存的模式，你认为是出于什么考虑？

金冬雁：这个问题这么说吧，长久来说是一定要与病毒共存的。为什么要与病毒共存？因为在短期内，你不可能把这个病毒消灭，除非以后有技术进步，能够让疫苗完全清除病毒，但是现在疫苗没有清除性免疫，不能让大家完全不受感染。关于这一点，在人类历史上，能够被完全清除的病毒，第一个是天花，第二个是脊髓灰质炎，也就是小儿麻

痹，当然清除小儿麻痹还没有完全实现，现在部分的非洲国家还有一点。基本上，亚洲包括中国大陆和香港，这些病毒都已经被消灭了，美国也都消灭了。但是，这两个都是用一个非常好的疫苗来实现的。现在，新冠疫苗做不到清除性免疫，这种情况下唯一的选择，就是与它共存，因为当前不可能消灭它。有人说，这个是你死我活，不但要在中国消灭它，还要在全世界包括非洲等所有地方都消灭它，要不然它还是会来。我们人类这么多年，都是与流感病毒共存，还有另外四种感染人类的冠状病毒，我们也是与它们共存。你不与它共存，是违反自然规律的。如果讲马克思主义，这也是违反马克思主义的，绝对是胡来的，不能与病毒共存，怎么可能呢？这

但是，你说很多国家处于什么考虑呢？他们并不是完全躺平。我举个例子，过去大家都骂新加坡，说新加坡怎么不顾人命，一下子开放，死了这么多人？但是实际上，新加坡比香港做得更好。香港这一次不是要躺平，还是要动态清零，但是它一下子爆发出来了，也是我们不想发生的情况，因为

没有做预案，所以造成了很不好的效果。新加坡是主动开放的，新加坡的人口比香港少一点，差不多 600 万左右，香港是 700 万。新加坡感染的人口是一百万，现在香港是 120 万左右。但是新加坡的死亡率只有我们的五分之一，新加坡采取了什么措施？就是打疫苗。他们 80 岁以上的人疫苗接种率达到 94%-95%，60 岁 -70 岁的达到 98%，而且他们打了三针 mRNA 疫苗，所以死亡率比香港低很多。并且，新加坡有整套的社区措施，强制大家打疫苗，如果你不打疫苗，一旦被感染，政府就不给你付医疗费了，你要自费。现在新加坡全社会疫苗接种率达到 90% 多，第三针接种率达到 70% 多。在这次疫情里，我们还是要向新加坡学习，学习他们社区管理的经验，包括动员私家医生参加抗疫等。我历来主张，应该以博大的胸怀借鉴全世界的好东西，当然我们自己也有好的东西。也不能说香港就是糟透了，香港其实是坚决搞动态清零的，从来没有躺平，我们也有好的经验，不能说新加坡就不行，香港就不行，这样的态度不太好。

提问者：现在上海封闭了 14 天，有些老人特别

是瘫痪老人从来也不下去，核酸也没有下去做，怎么还会出现阳性呢？

金冬雁：应该说，这些老人还是有接触的，很可能是一些照顾他们的人。我们老人院里面，本来这些老人院的职工全都打疫苗了，但是他们还是有一些有突破性感染，传给了不打疫苗的老人，老人就出事了。我们也有很多你刚才说的这种情况，因为我们现在在进行补测，而且每天上班都要测。很多同事说他们哪里也没有去，家跟学校两点一线，开着车谁也没有接触，也没有上公共汽车，到哪里都戴口罩，有一段时间还戴两个口罩，但就是中招了，这种情况还是挺多的。通过快测我们找出来很多这样的情况，他们都不知道传染源在哪里。当时我们比较果断地停了核酸检测，香港在2月下旬有一段时间的上升。现在我们推测，当然没有证据，可能跟核酸检测的人流聚集有关，那个时候大批人聚集在寒风中，等四五个小时去做核酸检测，可能是因为这个造成传播的。上海现在是因为什么原因传播，到底是因为居家，还是因为送菜，还是因为核酸检测，现在不知道。希望我们做公共卫

同行能够把它查出来。而且，虽然说现在 R_0 等于 9，但也不是任何一个人都是要 1 传 9 的，现在我们 R_0 就是 0 点几，通过一些其他措施，总要走向受控的，这个病毒找到了所有的易感者以后就会停止的。

提问者：打了疫苗的人能完全免疫，不感染病毒？

金冬雁：数据显示打了三针以后感染率很低，只有 0.002、0.003 和 0.004，就是说万分之几了。

提问者：感谢陈老师和金老师给我们讲了了很多专业的知识，让我们学习。我们比较关心的是国内防疫模式切换。从现在动态清零，要切换到宽松一点，至少对经济活动、人民生活影响小一些的模式，但是现在公开讨论还很少。我相信抗疫后面都有政治，美国是两党政治，中国也有政治的考虑，应该说抗疫是一个政治。我的问题是说，在美国，是各个州，在香港当然是香港特区政府了，香港 4 月 1 号已经开放了。这个切换当中，政治是不是有阻力啊，或者说怎么来从政治上平滑这个转换，是不是有很困难的事情？

金冬雁：非常困难，在香港也很困难。但是中央派的专家组，还有特区政府，最后还是在很多方面吸收专家的意见，把全民核酸检测停下来了。然后，也听取了我们的意见，提早制订复查计划，走向回归正常。还有是把对世界八个地区的停飞，现在都给恢复了。其中的道理是什么？现在在香港社区受到感染的机会，比被飞机来的客人感染的机会还大，所以我们只要坚持给他们隔离七天，入境给他们测抗原，在抗原是阴性的情况下，通过再隔离，就可以让他们来我们社区，这样没有额外增加多大的风险，政府最后也是赞同的。我们就是逐步走向开放。比较失望的是，其实我们有 10 个月没什么病例，大概有 100 多天是零确诊，可是内地也没有给我们通关。结果，为了通关，我们搞了很多谈判，很多轮对接，到最后就发生了疫情。我们一般的老百姓大概想，和内地通关估计是没什么希望了，除非内地防疫的理念改变，如果我们对外再跟全世界隔绝，香港就没有活路了，就完蛋了。所以，我们现在是逐步开放，把对外的开放打通一些，这个方向我们觉得还是对的。就如你刚才所

说，这里头也有政治。当然我是绝对铁杆爱国爱港的，但是香港爱国爱港的人士疫情开始以后就一直在闹，说香港是躺平，然后在特区政府闹，到北京去闹。好在最后还是听了这些专家的意见，特区政府最后做了一个比较科学的决定。所以，我们觉得很庆幸，实在无法预想如果我们进行全民核酸检测和部分封城，会有什么后果。反正现在，我们看到的是，在3月初达到顶峰以后，从每天5万多例到现在1千多例，我们走向受控了，我们没有做那些事也走向受控。我们爱国爱港阵营里相当一部分人的理论是，长痛不如痛，你封五天就行了。实际上是不行，你看上海现在封完五天，能清零吗？不能啊。

提问者：我怀疑上海做核酸也是一个传播的渠道，否则为什么上海封了这么多天照样还有？

金冬雁：这和武汉当初是相似的，有这个可能。一个是好多人早就受感染但没有发现，又是无症状的。现在不断地核酸检测，每次发现一些。因为每次都发现不全，这些人在潜伏期的两天用什么方法都找不到，抗原检测、核酸检测、核酸加抗原都找

不到，这些人没有办法的。你要搞很多次的全民检测，才能筛出来一些人，这样是非常事倍功半的。

提问者：陈老师，美国公共卫生是州一级在管，但是州有 CDC，有州长，州长和 CDC 是什么关系？

陈茁：美国是这样的，州一级有卫生局，不一定有 CDC。每个州有不同的情形，有的州把权利更下放一些，下放到各个县，各个市。比如佐治亚州和亚特兰大市的市长曾经有过一次交锋，亚特兰大市要求公共场必须要戴口罩，但是佐治亚州长比较保守一些，是共和党的，他就认为这是违反佐治亚州宪法的。当时有一段争执的时间，最后说实话，也就是不了了之，没有继续下去。美国的情形的确比较复杂一些，到底谁来做这个决定，可能还是根据各个州的具体情况。当然，联邦能够主导资金，能够提供这个方便给州、县，所以会有一些发言权。比如，如果你不去做核酸检测或不戴口罩或不打疫苗的话，包括公司和机构人员，联邦政府有可能就不给他提供相应的方便，我们佐治亚大学有一时间就是这样的。至于这个过程，还真的是一个

各方角力的过程。我和我的学生也在做研究，观察到在美国州县当中，真正有医学背景的县卫生局去做相对会好一些，这是挺有意思的发现。我的一个学生做了佐治亚州的一个县，看到不同的政党背景对疫苗接种率也会有一些影响。我不是说有什么确定的好或坏，这个不好说，但是我觉得，政治与疫苗接种率是有一些相关性的，因为背后可能有一些政治决策的过程。

我觉得可能有一个经验教训，就是越公开越透明化可能更好一些。在美国，联邦层次如果有决定要通过，就必须要有有一个规制效果分析，要算括经济成本，包括对弱势群体的保护，是不是会影响到农村的医院，国际上的一些影响，所有的影响都要列出来，是这样一个过程。然后把它放到网上，其他人会来看，并提出一些批评。这个过程不一定符合政府的预期。比如 FDA（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早期就提出来要在纸盒上印一个标志，但是在美国没有通过。这个过当中，很多人提出了问题，会有一些意想不到的看法。所以我觉得如果过程透明，如果能有更多争论的话，能够把决策做得更全

面一些。

提问者：请问深圳为什么能够做到清零？

金冬雁：我认为深圳的做法，现在我们国家还给它表扬，这是非常荒唐的。深圳的全民检测和封城，其实就达到了一个目的，他们其实知道深圳并没有广泛的疫情，疫情是很轻的。你把一个本来没有疫情的城市，比如南京，现在把南京封9天，还是清零。深圳本来就是两位数字，就封城。你不封城，两位数字也是上不来的。所以说，深圳的情况跟上海、吉林、香港没有办法比。我们香港很多朋友也说，你看深圳多好啊，长痛不如短痛，一下子雷厉风行就封了。其实你问深圳真正搞公共卫生的朋友就知道了，他们一测就已经知道，深圳什么事都没有，因为深圳疫情的规模很小，其实封城是完全不必要的。上海封城能搞成它这样吗？现在深圳一表扬了，不得了，其他地区两三个案例就开始封城了，当然也能清零了，但是你得算算代价。而且，深圳本来没有疫情，封完城以后也没有疫情，实际上它也没有马上完全清零。唯一达到的目标，就是发现深圳没有真正的传播感染。所以绝对不能

够和上海比，和吉林比，和香港比。香港要搞全民检测的时候，已经好几万了。而且当时我们的判断也是说，在香港封城以后会面临人道灾难，还有核酸检测结果根本就没有这么快出来，是在做无用功。因为等到了三天以后，那个人已经从感染性很高变成感染性很低了，再把他封几天其实对疫情没帮助。就是像上海也有这种情况，如果你等了三天五天再把他隔离，那隔离也没用了。

提问者：有一种声音说，奥密克戎和之前的新冠相比，在某种程度上不是一种疾病，这个说法对吗？

金冬雁：它们是同一种病毒，但是临床症状很不同。之前的新冠主要侵犯下呼吸道，奥密克戎主要侵犯上呼吸道。还有朋友问，美国因为病毒死的老人很多，所以中国为了保护老人就不放开，这样做有效吗？陈老师一会可以讲美国的情况。香港死的老人比较多，主要是因为老人不打疫苗。美国在打了疫苗的老人里，死的也是很少的。陈老师可以补充。

陈茜：说实话，主要是美国在早期，一个是疫

苗还没有跟上，一个也是美国的政治纷争，有些州没有强有力的保护措施。此外，也是有一些比较偶然的事件。早期养老院确实有好些感染，所以美国在早期老人因感染新冠死亡的确比较多一些。

提问者：现在实际上没有事了？

陈茁：现在的情况大家也可以看到，死亡率已经降到比较低了。在报告新冠死亡案例的时候，有测到个奥密克戎，但是不一定是因为奥密克戎而死亡的。

乔依德：由于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会就开到这里。再次感谢两位老师给我们做了精彩的演讲。很多问题我们可以再好好消化，希望这个疫情过去之后，我们有机会可以采取线下的方式把这个事情再讨论得比较深一点。我们今天的视频会议就到此结束，谢谢大家。

（以上内容根据录音整理，未经本人审阅）